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4月15日第8期 总第218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18期

地方文革专辑（二）

目 录

编者按：纪念“新内人党”冤案平反四十周年

【专稿】

钱理群 从内蒙看文革中的民族问题

——读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

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一个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

和图门、祝东力《康生和“内人党”冤案》

【评论】

阿尔楞 《滕海清谈“内人党”》读后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访谈】

滕海清谈“内人党”（王端阳采访 整理 阿尔楞 评注）

【述往】

陈晓庄 关于挖“内人党”的片断

【封面】

邹行 折翼

【编读往来】

1. 周家琮正误 2. 赵晖谈“红色文化”

【本刊声明】

编者按：

今年是“新内人党”冤案平反四十周年。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内蒙古党委书记呈递的《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的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华国锋对这一报告做了批示：“同意，并望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指出，所谓“新内人党”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决定挖“新内人党”是错误的，是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主观臆断，盲目蛮干，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错案。因此，应该完全予以否定。同时，中央委托胡耀邦通知有同类问题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五省、区党委各派一负责人到京，向他们传达了这一文件。

根据“4·20批示”，内蒙古开始了第四次落实政策，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新内人党”三大冤案平反。与这三大冤案有关的，如几十个“内人党”外围组织、“206案件”等十大案件及无数冤假错案亦相继平反。内蒙军区“二·五”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开枪打死师院学生韩桐，“已被判处徒刑的杀人犯柳青”也在平反之列，他“从监狱中被迎接出来，恢复党籍、军籍和原职，送到河北军人高级干部休养所颐养天年。”（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一个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页258）

在内蒙三大冤案中，所谓“新内人党”（习惯称“内人党”）是文革中造成的死伤最多的特大冤案之一。”据官方统计，在此案中，有346,220遭到诬陷，16,222被迫害致死，87,188人严重伤残。

1978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会议进一步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落实政策的工作。自建国以来积累下的成千上万的冤案被推翻，所有的政治运动被重新审理。内蒙古的民族右派和四清运动也被纳入落实政策的范围。1978年至1980年是内蒙古的“平反年”，是内蒙人民的“翻案年”，它标志着中国的少数民族再一次获得理论上的“新生”。

本期刊发了滕海清的访谈，滕的秘书陈晓庄的回忆，以及钱理群和阿尔楞的评论文章，可以互参。

【专稿】

从内蒙看文革中的民族问题

——读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

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一个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

和图门、祝东力《康生和“内人党”冤案》¹

钱理群

少数民族地区的文革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中的民族问题”是文革研究不可忽略与回避的课题。但我对此毫无研究，也缺乏必要的知识和史料储备，只能依据接触到的有限研究成果，以内蒙为例，作一个简要的复述与梳理。我看到的内蒙文革研究成果，主要是启之、高树华、程铁军、图门、祝东力五位所著的三本书，其中启之的《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材料尤其详尽、全面，并且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与深度，已经很难超越：我只能作真正的“文抄公”了。这是需要首先说明的。

启之在他的著作一开始就指出：构成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内容及贯穿线索的，有三大案件，即“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案，“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新内人党’）”案，以及“二月逆流”案。²其中，后果最为严重、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乌兰夫案”与“新内人党案”，都是所谓“反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物。可以说，“文革在内蒙就是‘革’

¹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出版。图门、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本文作者依据的启之先生的著作是其电子版，因此，在文中的引述，都无法标明具体页码，请读者注意与原谅。

² 所谓“二月逆流”案，包括三个阶段。1967年2月内蒙省军区介入文革后，即支一派（以“工农兵”、“红卫军”、“无产者”为代表的保守派）打一派（以“呼三司”、“河西公司818造反团”、“红旗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制造了全国第一起枪杀学生（内蒙师范学院学生韩桐）事件；在4月《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议》（红八条），指出军区“犯了方向性路线错误”以后，省军区领导又在中央几位老帅支持下，指使官兵火烧党委大楼，静坐中南海，大闹人民大会堂，并痛殴中央新派的军区政委吴涛；此为镇压群众，对抗中央文革的第一阶段。5月16日中央军委下令，将省军区几位主要负责人打成参与“二月逆流”的“反党集团”。以后又开始了军区与他们支持的保守派群众的打压：此为“反二月逆流”的第二阶段。于是，又有了1978年4月的“平反”，当年枪杀学生的凶手也从监狱里放出。几番反复，极大伤害了包括蒙、汉两族的内蒙两派群众和军区广大官兵。

‘民族分裂主义’的‘命’”，民族问题无疑是内蒙文革的核心和关键，而且在全国颇具代表性。¹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一一道来。

一、关于“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1966年5月4日至26日，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前的“介绍情况的座谈会”，揭发了彭真的问题；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对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由毛泽东亲笔加上一段点题之文：“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组织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应该说，这是正式发出了“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接着，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又发出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的警告。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6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华北局就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华北局会议，史称“前门饭店会议”。内蒙古参加会议的除奎璧、王鐸、王再天、高锦明、权星桓等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还有自治区有关部门、部分盟市、旗县和“四清”工作团干部143人。会议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在传达了《五一六通知》和林彪讲话以后，内蒙小组就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时为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乌兰夫。²最后华北局通过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给乌兰夫定了五大罪名：“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安插

¹ 见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一章《背景》。

²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第74页，第80页，第84页，第102—103页，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出版。

亲信，篡夺领导权”。最后，给乌兰夫安上“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最大走资派，埋在党内定时炸弹”五顶帽子，撤销一切职务，软禁在北京。据说“全国省、自治区第一书记中，乌兰夫是最早被打倒，最早受批判，定性上纲最高的一位”。研究者分析说，这是因为“内蒙边境四千余里，与苏、蒙接壤。呼和浩特离北京只有六百多公里”，毛泽东“无法放心”。在清除了眼皮下首善之区的北京市委这一隐患之后，就要向最近的边境地区内蒙下手。¹

乌兰夫的主要罪行，让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最不放心的，就是“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他的主要对手刘少奇、邓小平之间，他既要防备、又要利用的周恩来，以致林彪之间，都是高度一致的。乌兰夫问题就是由刘少奇、邓小平直接过问、处理的。1966年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和乌兰夫谈话时，邓小平就直言不讳地点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与乌兰夫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你长期是思想右倾，站在李维汉一边。1953年就开始了。1952年平叛，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平叛，你都是右倾。1953年开始，我们就觉得你有些不对头”。²这背后显然有一场围绕民族问题的党内两种意见、方针、政策，以致两条路线的长期斗争。

建国以后，乌兰夫掌握了内蒙的党政大权，作为一个忠诚的老党员，他当然是代表了党的理想、信念、意志与利益来治理内蒙，对此他是十分明确与自觉的；但他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成吉思汗的子孙”，对于本民族的父老乡亲的责任与权利维护。这在乌兰夫看来，是十分自然，理所当然的。但在党的一元化思维与立场看，他的要同时维护党的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双重代表”身份却是可疑的，很可能发展到与党对抗。但在建国初期，这样的矛盾还处于潜伏的状态。乌兰夫提出的“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民族特色办事”的治蒙方针，提出一系列“慎重稳进”的政策，都是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的：因为建国伊始，维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是符合稳定全国秩序的大局需要的。即使到

¹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二章《发轫》。

² 刘少奇、邓小平同乌兰夫谈话记录（1966年7月2日），收《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转引自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二章《发轫》。

了土地改革时期，乌兰夫提出要实行“三不两利”的政策，即“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和牧主两利”，以比较缓和的方式解决牧区的牧工与牧主的矛盾，也得到中央的认可：土改属于民主革命范畴，照顾少数民族利益是党所允许的。乌兰夫领导下的内蒙也确实因为政策的“慎重”而获得了“稳进”的发展，成为民族地区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¹

但正如邓小平所说，从中央对少数民族的所谓“叛乱”实行“武装平叛”时起，乌兰夫的态度与表现，就引起中央的不满与警惕。1955年清剿“川藏叛乱”，乌兰夫就泼了冷水，提出“对少数民族打仗，是下策”的警告。以后，1958年青海部分蒙藏民提出“为民族，保宗教”的口号进行反抗，遭到镇压，当地寺庙全部摧毁，5万人被杀；1959年西藏平叛，滥杀滥捕，乌兰夫都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当然不会赞同“叛乱”，但出于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性格、传统的感同身受的理解，他更深知用镇压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只会将他们推向对立面。这些平叛之举的后果实际上也证明了乌兰夫的忧虑。但越是这样，毛泽东和党中央越感到乌兰夫与党不是一条心，这倒是乌兰夫所难以理解的。²

到了1956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乌兰夫按照他的一贯思路，又提出畜牧业改造“政策要稳，办法要宽，时间要长”的方针，强调“蒙古族的畜牧是否入社，完全自愿，要给畜主合理报酬”，“对牧主经济改造，采取类似国家资本主义的办合营牧场的办法”。³但这回，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看来，就是一种“右倾”的表现。刘少奇在1966年5月和乌兰夫的谈话里，说得很清楚：“民族问题在一定时期有革命性”，但“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就应该划阶级”，强调阶级斗争。⁴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更直截了当提醒乌兰夫：“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民族，要；地方，好。但不要主义。反正应该吃共产主义的饭”。⁵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民族主义，特别是地方民族主义，就不再具有进步性，必须坚决抛弃。如果继续坚持民族主义，就会走向危险的歧途。

¹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一章《背景》。

²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一章《背景》。

³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一章《背景》。

⁴ 转引自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二章《发轫》。

⁵ 转引自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二章《发轫》。

按刘少奇的解释就是“内蒙古就是要被压迫者团结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靠共产主义吃饭，不能靠民族主义吃饭，不搞内蒙古阶级斗争，团结就没有基础”。

这里，实际包含两层意思：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内蒙古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对内，应该实行“被压迫者”的团结和专政，搞“内蒙古的阶级斗争”（刘少奇说：“牧区不建立贫苦牧民专政，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对外，应该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追求与利益，而不能再谈“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与利益”，强调“国家认同”，而不是“民族认同”，强调具有“国家主义”内涵的“爱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¹这就十分尖锐地提出了一个理论与实践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到底存不存在民族问题？还需不需要民族主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意思是明确的：社会主义时期所有的问题都是“阶级问题”，不存在“民族问题”，即使有，也要按阶级问题处理；民族主义只有在与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关系中有意义，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就是“民族分裂主义”。而在乌兰夫看来，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就是对宪法规定的“民族自治，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原则的放弃与背离，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表现。

应该说，这样的分歧，是带有根本性的：不仅是处理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上的完全不同的思想、理论、路线，而且形成了乌兰夫为首的地方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关系的紧张，同时更深刻影响了蒙、汉两个民族的关系，为此后的运动——从“四清”到“文革”——的发展埋下了伏笔，种下了祸根。

但这样的发展还需要一个过程。据启之的研究，此后，乌兰夫与党中央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1958——1961年，无论是大跃进，还是人民公社运动，乌兰夫都是紧跟毛泽东与党中央的；乌兰夫晚年回忆里，总结说是因为太急于改变内蒙的落后面貌而犯了“左”的错误。1962——1963年，开始有了怀疑。到1964——1966年就有了自觉的抵制。在这其间，乌兰夫的一些作为，都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与警惕。其一是“文字改革”，乌兰夫提出采用外蒙使用的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新蒙文，因此与外蒙语言、学术界进行了多次交流，

¹ 以上刘少奇讲话，转引自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二章《发轫》。

这都成了文革中指责乌兰夫集团“里通外国”的罪证。其二是反对在牧区开荒，并封闭了大量新开垦地，文革中就被指责为“大搞独立王国”。其三是针对临省对内蒙地界的蚕食而在边界划分上，与邻争地。这都是对内蒙地方与民族利益的维护，却因此有了“制造民族分裂”的嫌疑。

乌兰夫真正“露峥嵘”，是在1962年4、5月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他和李维汉等提出，民族工作出现严重问题，“主要是不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忽视民族特点，忽视宗教问题的民族性、群众性和由此带来的长期性，忽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特点，忽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对上层工作也大大放松。大汉族主义在一些地方有了滋长”。¹乌兰夫郁结多年的心里话终于一吐为快，而全都击中要害。但也因此公开了他与毛泽东、党中央的分歧，又是和李维汉一起提出，更犯了党内斗争的大忌。1966年5月谈话里，邓小平说他“站在李维汉一边”，就是抓住了这一点。²

而且国内政治形势又陡然大变：半年以后，毛泽东在10月、11月召开的十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实际上提出了一条“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路线。1963年8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明确论断。³这就把问题挑明：从此，再谈民族问题，就是挑战党的阶级斗争路线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3年中央提出，要“在牧区开展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颠覆活动和内部民族分裂分子破坏活动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且提出要进行“重划阶级”的补课。乌兰夫毫不隐晦地表示不满：“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什么非划阶级不可？牧民里脑子里是没有阶级的，硬给人家划阶级，是主观主义”。

于是，就有了1964年10月至11月自治区三级干部会上的交锋。乌兰夫坚持要批判大汉族主义，维护民族自治权利；中央特地派来的工作组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大谈乌兰

¹ 转引自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一章《背景》。

²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1962年至1964年对时任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进行了持续两年的批判，印发了他“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主要言论”，毛泽东专门写有批语，要求与李维汉划清界限，“坚持阶级立场”，“千万不要动摇”（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

³ 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9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出版。

夫的家乡土旗的问题，并暗示说上面“有根子”。在这种情况下，内蒙古自治区领导班子里就出现了反对派（主要是汉族干部，也包括蒙古族干部），乌兰夫陷入了上下夹攻的困境。

乌兰夫横下心来，最后摊牌：在1965年11月13日自治区党委二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他提出了“受毛泽东、周恩来启发下”的“新理论”，即“巩固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基础”：“政治基础，核心是民族平等，（领导班子）一视同仁”，“经济基础是实行农牧结合，谋求（汉、蒙族）共同利益”，“文化基础，核心是情感的沟通，特别是学习和使用对方的语言，形成共同的心理状态”。他最后总结说：

“民族问题就是人民问题”，“毛泽东思想是民族团结”，“突出民族问题，就是突出政治”。可以说，这是乌兰夫将他的民族问题观和盘托出。而在党中央看来，却是一次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路线的全面对抗。刘少奇在1966年7月谈话里，就给予了明确否定，指出：“政治基础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应该是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阶级斗争，提三个基础，就把方向、阶级模糊起来了”。而在乌兰夫看来，否认他的三个基础论，本身就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其要害是“不承认少数民族特点，以及他们和汉族之间事实上存在的差别”，“无视少数民族的权利，损害少数民族人民切身利益”。他坚定地表示：“我和大汉族主义已经战斗了14年。今年60多岁了，还能斗争20年，非把大汉族主义斗倒不可”。他是决心一条道走到头了。¹

在摊牌的同时，乌兰夫还下令将1935年12月20日毛泽东签署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人民宣言》（简称《三五宣言》）重新印发，要求全区干部学习，这就成了文化大革命中他的主要罪证；本文一开始引述的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的报告，就是指控乌兰夫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问题是，乌兰夫在1965年重申《三五宣言》，引发他的强烈共鸣的，究竟是什么呢？看来，主要有两点。一方面强调，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与内蒙民族的生命与共的关系：“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民族共同奋斗，

¹ 以上均见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一章《背景》。

才能很快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另一面又强调：

“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家庭道德以及其它一切权利”，“内蒙古人民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和其它民族结成联邦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总之，民族是自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¹

乌兰夫显然是以“共产党人”和“成吉思汗子孙”的双重身份、立场去看待和解释《三五宣言》：他当然要坚持“在共产党领导下，谋求自己民族的解放”的基本信念，但他又不能不面对在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蒙古族正面对逐渐丧失自己的自治权利、平等地位和自尊的危险的现实。在他看来，党不能认真兑现自己当初对蒙古民族的承诺，失信于民，也会造成党自身的统治危机。因此，无论于党还是于本民族，他都必须据理力争，希望回到毛泽东在建国前自己制定的关于内蒙问题正确路线上来。但他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坚持“成吉思汗子孙”立场，就会被党看作是不忠诚的表现；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重申民主革命时期的党的民族政策，²更是对党的阶级斗争路线的对抗，在挑战党的领导，这本身就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心腹大患，必除之而后安。

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为首党中央就将乌兰夫抛出，他成为文革最早的牺牲者之一的原因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前门饭店会议上，对乌兰夫的批判，主要集中在

¹ 《三五宣言》见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一章《背景》附录。

² 其实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本身，也是在发展变化的。最早吸引乌兰夫这一批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内蒙革命青年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提出的“民主”与“自治”的双重理想，实行“自由联邦制”的制度设计。按照这一设计，少数民族有权脱离汉族，建立独立国家。因此在前引《三五宣言》里，还谈到“内蒙古民族有权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民族结成联邦关系”。但到了1946年制定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主要决议》，就将“自治”原则作了新的解释：“是平等自治，不是独立自治”，收回了独立权，而变成了在汉族主导下统一国家内享有平等权利的区域自治，这才有了建国后的“民族分裂”罪。在1946年的决议里，还提出“只有接受中共领导和帮助，才能获得民族解放”的理念与原则，引人注目地强调了中共的“领导”。到1947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对内蒙人民革命党的对策给东北局的指示》里，就更明确地提出：“内蒙古问题的中心，在其武装须掌握在我党手中，其自治政权须由我党领导”。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事实上新中国就是按照这样的民族政策，实行“党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党的领导”与“民族自治”两个方面，后者是服从前者的。现在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党的领导提出要突出阶级斗争，淡化（实质是逐步取消）民族自治。在这样的情况下，乌兰夫还要突出民族自治，坚持自己入党当初的民主、自治理想，反对大汉族主义，就“罪该万死”了。以上引文均见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一章《背景》。

在两个方面。一是刘少奇所指出的，“在民族问题、阶级斗争这两个根本问题上，乌兰夫犯了错误。用民族问题取代阶级问题，是资产阶级路线，是代表蒙古大地主、牧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是代表蒙古工人、农民、贫苦牧民的利益”。邓小平则点出了另一个要害：“去年下半年，正是我们揭露苏修，揭得很厉害，泽登巴尔（按，时任蒙古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反华的时候，你们不整反修，把反修旗帜降下来了”。¹

我们知道，“阶级斗争”与“反修防修”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两大主题；把乌兰夫安上这两大罪名，就把解决乌兰夫为代表的地方民族势力的问题纳入了文革斗争的轨道上。乌兰夫的问题也就集中表现在“反对大汉族主义”（实质是对抗党中央的集中领导）和“大搞民族分裂主义”（对内，以要求民族自治对抗党的阶级斗争路线；对外，迎合、勾结蒙修、苏修，以致美特、日特、国特，破坏国家统一）这两个根本问题上，这构成了内蒙（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文革的主要内容。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讨论的挖肃“内人党”的两大目标：“在蒙古族中大搞阶级斗争，大揪‘叛国集团’”，实际上在批判乌兰夫时，就已经埋下伏笔了。

毫无疑问，以解决乌兰夫的“民族分裂问题”为中心的内蒙古的文革，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精心策划，一手炮制的；但不可否认和忽视的，是这场文革风暴最终能够席卷内蒙全区，全民参与，除了极权体制本身的组织力与动员力之外，它的发动，也确实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这是我们必须正视与讨论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这就说到了启之在他的书中强调的“先在性矛盾”，即在地民族（蒙古族）与外来民族（汉族）的矛盾。蒙古族作为世代养育、生长在蒙古草原的土著居民，自然构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主体”；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出现越来越多的，以汉族为主的外来移民，并最后成为草原的“多数人口”。这样的“土地”与“人口”问题引发的生存空间的争夺，必然导致民族利益的矛盾，一方面是蒙古族对垦荒与移民的疑惧与拒斥，另

¹刘少奇、邓小平和乌兰夫的讲话（1966年8月），转引自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二章《发轫》。

一面汉族移民也为这样的拒斥，特别是蒙族上层对他们的压迫感到不满，由此而发生的蒙、汉民族冲突可以说从晚清到民国从来没有中断过。建国以后，尽管实行区域民族自治政策，极大地强化了蒙族的主体地位；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大规模的垦荒和移民，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这就必然带来内蒙人口结构上的进一步的变化。到文革前（1965年）全蒙近1300万人口中，汉族高达1130万，蒙族仅有144.5万，其它少数民族20万。这样的所谓“社会主体”与“人口多数”的矛盾，就达到十分尖锐的地步。更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建设的发展导致的文化冲突。像五六十年代的包钢为中心的现代工业建设，既给内蒙地区的社会发展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新机遇，也让内蒙民族知识分子感到某种民族文化的危机。这样的生存空间的争夺和民族文化的渗透必然激化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汉两族“先天性矛盾”，应该说到文革前已经积累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将前文讨论的乌兰夫反对大汉族主义、突显民族自治的思想与政策，置于这样的背景下来考察，就不难看出其问题的另一面：潜伏着某种矛盾与危机。乌兰夫强调蒙古民族的民主、自治权利，主体地位，要求在干部选用上要以蒙族为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都给予蒙族以特殊照顾，无疑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如果将其发展到极端，特别是不能同时注意发展汉族的民主、自治权利，照顾其经济利益，就可能形成对占人口多数，为内蒙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汉族的利益损害，造成新的不平等。

启之的书里，就特地引述了一位汉族干部的回忆中谈到的文革前就已经孕育的种种不满。如当时自治区的厅局级第一把手，基本上都是蒙族干部，但他们大多是在1945年参加革命，有的还是1949年参加工作的；而担任副职多半是从延安派来的抗战时期的汉族老干部，甚至是老红军。这就产生了汉族领导干部的不平之感：“我们是来自治区当副官的”。一般汉族干部则说，“我们在自治区都是孙子辈，好事没有我的”。入党、入团、提干都是蒙族优先；发布票，蒙族是双份；农村分自留地蒙族也是汉族的两倍。这位干部自己的女儿在学校班级里一直名列前茅，高考时差一分没有录取；而蒙族学生因为照顾几十分，成绩最差的，也全部录取，这就引发了巨大的不满。在这位汉族干部看来，正是自治区“蒙

族、汉族方方面面造成的差别，形成的种种矛盾，日积月累，在文革中就一下爆发出来”。¹而文革强调“社会平等”的意识形态，也正好为这样的发泄和反抗，提供了最充分的正当性。

乌兰夫作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内蒙最高领导人，他在对上对外努力维护地方与民族利益的同时，也有对下对内强调集中统一，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力的一面。也就是说，他所在意的，不仅有路线斗争，更有权力之争。特别是前文提到在1962年以后，乌兰夫陷入了上下夹击的困境时，更在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将现有的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的权力虚化，由亲信另立“新常委”，13人中有9名为蒙人，其中6人是其家乡土默特旗人，还包括长子布赫；同时又取消了原来的厅局，另组五大委员会，主管日常行政工作。乌兰夫的初衷可能在借此把领导权牢牢掌控在一人之手，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更好实现自己的以维护民族自治权力为核心的“三基础”的新思想、新路线；但他这样的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就事实上走向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到了只信乡党、倚重妻儿的地步。就像论者所说，乌兰夫家族事实上成了自治区的统治者：“乌兰夫是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主席、军区政委；妹夫孔飞也是政府主席（按，应是军区副司令员）；女婿石光华和女儿云曙碧是政府副主席；儿子布赫是原文化局副局长，文教委员会主任，又是自治区新常委成员；布赫妻子乌兰其其格是广播局长，文联主任；妻子云丽文又是自治区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仅“一家子都是高干”，而且“土默特旗干部产出之多，就像隔韭菜一茬接一茬”：这样不加掩饰的家族统治，是典型的权力腐败，自然引起汉族干部与非嫡系的蒙族干部的强烈不满，引发了无休止的权力斗争，更引起民众的公愤和反抗。²这又和“反对资产阶级独立王国，反对特权阶级”的文革主题正相符合：毛泽东与党中央登高一呼，许多内蒙干部与群众纷纷响应，起来造乌兰夫的反，打倒“当代王爷”、“云家店”、“土家村”，是自有缘由的。

¹ 以上材料与分析，均见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前言：千秋易过，文革罪恶难消》。

²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二章《发轫》。

统治内蒙几十年的乌兰夫一旦倒台，引起的震动，是可以想见的。

首先是他的乡亲、远房侄子，时任昭乌达军分区副参谋长云成烈闻讯赶到北京，托人给乌兰夫捎信：“一定要顶住！”还说：“革命是有反复的，上大青山大游击也要革命！”这自然是一时之气话，却也引起了“内蒙有人要政变”的流言和恐慌。¹

更有许多小道消息迅速在民间传开，而且汉、蒙族的传言各不相同。汉人的说法是：乌兰夫要搞民族分裂，和外蒙合并，建立大蒙古帝国，怕汉人不服，下令蒙人杀尽汉人，杀老不杀小，杀男本杀女，杀丑不杀俊，留下有用的汉人。蒙人则纷纷传说：汉人要杀蒙人。这次运动就是整蒙族。先联合东部蒙人整西部蒙人，整下土旗蒙，整完西部再整东部。²这可以说是蒙、汉两族普通民众的文革理解与想象。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将是一场蒙、汉两民族之间的大厮杀，而且不幸而言中。

首当其冲的是蒙古族干部和百姓：在“批判乌兰夫民族分裂主义路线”的旗号下，大批蒙族干部被斗，军区蒙族干部也受到怀疑、打击，甚至规定“作战部、机要局等要害部门一律不用蒙族人”；在群众中则重新划分所谓被乌兰夫包庇的蒙古人的成分，抄蒙人家，没收蒙人自留地、自留畜，强迫退还“在修正主义民族政策”保护下的多吃多占部分，破产还债，等等：人为制造、强化的民族矛盾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下迅速蔓延全蒙地区。³

由此激发的，是从自发到逐渐自觉的蒙古族反民族迫害的反抗运动。

1966年12月23日，“土旗联盟”（全名为“内蒙古东方红革命造反联盟”）成立，自称有五、六千人，活动范围主要在呼和浩特市，以土默特左、右两旗为主，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把矛头指向北京前门饭店会议，认为是李雪峰背着毛主席搞的，乌兰夫是“前门饭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他们曾散发《也谈野牛》的传单，寓言式的把人群分为奴隶主，奴才和野牛，自比“好斗的野牛”，准备向奴隶主的统治发动冲击。据介绍，“联社的组织过程颇具农民特色：结社方式呈秘密、半秘密状态（张三拉李四，李四保举

¹ 图门、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第17页。

²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二章《发轫》。

³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二章《发轫》。

王五)”;宣传中也有某种故弄玄虚的神秘色彩,如扬言“联社总部设在北京中南海,总理、江青给俺们开了介绍信”等等。他们以农民的方式传达了蒙古族的民意,因此也得到一些干部、教师、工人,甚至厅、局、县、旗级蒙族领导干部的支持。¹

以后还陆续发生所谓“黑信事件”。例如1967年1月内蒙古党委斯荣发表致党中央的公开信,指责“内蒙古是以乌兰夫问题冲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同样把矛头指向前门饭店会议,认为会议“不像党内斗争”,即违反了党内斗争的原则整人,后果也很严重:“搞蒙古干部太多了”,并辩解说:“反大汉族主义也不一定是反党”。²在1968年反右倾运动中这封信被重翻出来,斯荣等因此被打成“黑帮翻案集团”。尽管一再镇压,蒙古干部中支持乌兰夫民族路线的依然大有人在,成为内蒙文革的一股潜流。

而且一有机会,就会喷涌而出。1973年8月中共十大经过周恩来的多方努力,乌兰夫重入中央委员会,当上主管民族事务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这自然给他的支持者以巨大鼓舞。在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原内蒙大学副校长、民族理论家和宗教学者,内蒙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牙含章,于1974年4月25日发表了《狠批林彪死党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在内蒙地区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的长篇演讲,旗帜鲜明地提出:“内蒙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民族问题在这里具有特殊重要性”,而“林彪死党”的要害就在“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还有民族问题”。这显然是借批林之名,在文革开始八年以后,第一次重提乌兰夫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

牙含章在演说中,借批判郑维山的“征服者”论指出,大汉族主义才是“制造民族分裂的罪魁祸首”:他们就是“要征服内蒙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剥夺毛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实行区域自治、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取消区域自治”。演说还抓住郑维山所谓“走遍四盟二市,没有发现一个好干部”的言论,着重指出了“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不能当家作主”,“在内蒙党政军高级领导职务的蒙族干部只剩下吴涛一

¹ 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第333—334页。

²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五章《挖肃》(二)。

人”，“盟市旗县和各级部门第一把手无一蒙人”的问题，并对盛行一时的“谁讲民族问题就认为谁是民族主义者，就是搞民族分裂，反大汉族主义就是修正主义”的怪论提出质疑：这都是文革中蒙族干部淤积于心的不满终于一吐为快。牙含章的演讲，更对文革中以“将民族问题归结为阶级问题”为特点的大汉族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揭示了其深厚的思想文化传统：“一曰‘严华夷之防’，就是对少数民族不信任，不以平等态度对待；二曰‘尊王攘夷’，主张对少数民族实行武装镇压，就是要征服少数民族；三曰‘用夏变夷’，就是以汉族的文明去同化少数民族”。这都击中了要害，可以说是自治区知识分子第一次对“文革中的民族问题”进行了独立的批判。¹尽管牙含章后来被中央定性为“反动民族理论家”，遭到迫害；但他的讲话依然在全蒙不胫而走，成为重要的历史证词和文革民族问题的民间总结。²

二、关于“新内人党”冤案

1967年11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立即以“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为首要任务。这是根据康生的指示：“他（指乌兰夫）这条线是很粗的，上下（都有）基础，很不简单”。“挖黑线”就要追溯到历史；“肃流毒”则要联系现实，注意现行活动。

早在1967年1月毛泽东就发出要清查混进“党、政、军、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的“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的号召，在全国立即掀起揪叛徒、特务之风。内蒙革委会成立后的1968年2月，《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报告〉》更明确提出：“坚持群众路线，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以根除隐患”。

就是在这样的“挖乌兰夫黑线”与“揪隐藏敌人”的双重背景下，“内蒙古人民革命

¹ 牙含章本人是汉族，对民族问题有深切理解；他的批判反映了蒙族知识分子和理解蒙族的汉族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²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九章《残局》。

党”问题就引起了注意。¹早在前门饭店会议上，就有人提出了“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夫当年为何不按反动党团处理”的问题。²现在，清查内人党（包括乌兰夫与内人党的关系）就成了内蒙文化大革命的新的突破口。

这里，需要对内蒙民族解放运动和党派政治作一个简要的历史回顾。其起端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启蒙主义思潮影响下，以北京蒙藏学校为中心，培养和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自觉民族意识，又有现代民主思想的蒙族青年，他们就成为内蒙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与骨干，并逐渐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力量。

1925年10月，在国民党、共产党、冯玉祥以及外蒙、苏联、共产国际支持下，成立了第一个内蒙现代政党：“内蒙古国民（人民）革命党”（简称“内蒙古国民党”），其主要领导人白云梯深受孙中山影响，成为国民党党员，在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就将内蒙古国民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地方支部。与此同时，以乌兰夫为代表的第二代蒙古革命青年都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入内蒙地区进行地下活动。在白云梯公开投靠国民党以后，内蒙古国民党中的左翼，就于1927年将内蒙古国民党改名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其最早的领导人是特木尔巴根（他也是苏共党员）和朋斯克，他们主持下的内人党，是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的。1932年他们的学生哈丰阿入党并接班，内人党就逐渐成为内蒙民族革命运动中的第三种政治势力。在日军占领下，内人党一度停止活动。到抗战胜利以后，1945年哈丰阿重建内人党东蒙支部，并同时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青年团”。在其公布的党的纲领中宣称“本党接受苏维埃联邦、外蒙古人民共和国之指导，以解放内蒙古人民，确立民主主义政体为目的”，“和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络，互相帮助”。内人党东盟支部成立以后，就积极筹建“东盟自治政府”，宣称最后要实现“内外蒙合并”。

1946年4月，乌兰夫受党中央之命，“单刀赴会”，对哈丰阿为首的内人党进行艰难

¹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四章《挖肃》（一）。

²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第103页。

的说服工作，终于在同月召开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上，宣布停止内人党活动，哈丰阿等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1947年，哈丰阿等曾一度试图恢复内人党；但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大趋向、大形势的推动下，又在5月放弃了独立成党的努力，在“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乌兰夫任政府主席，哈丰阿被选为副主席，内人党也从此成为历史名词。在当时看来，这是乌兰夫忠实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果。¹

但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成了乌兰夫的一大罪状。把内人党重新从历史的尘埃里挖掘出来，无非是先把内人党定性为“民族分裂主义的政治势力”，再将乌兰夫定为内人党的“黑后台”，以便证明乌兰夫现行的民族分裂行为，是“内蒙在现代史上多次出现的分裂、独立活动的延续”。²这样的按照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任意解释和篡改历史，已经成为文革的“新常态”。

但这毕竟是历史，并不能成为文革阶级斗争的直接推动力。于是又要按照现实政治的需要，炮制（想象）出一个“新内人党”。据说，在1947年以后，内人党转入了地下，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更成了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组织。1968年2月6日，成立不久的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碰头会上正式宣布“新内人党”的存在：一个服从于内蒙文革需要的反革命组织就这样被制造出来，这算是文革的新创造。

开始时，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的领导还有几分谨慎与犹豫，再三强调要区分内人党发展的三个阶段。据说，1925年——1936年的内人党（包括其前身内蒙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1945——1947年的内人党是“地方民族主义政党”，只有1947年以后，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组织”。因此，前两个阶段的内人党不属于清查范围；“只有第三阶段加入内人党的旗县以上干部才算反革命，旗以下普通党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³这样的政策限制，显然不能适应现实阶级斗争的需要，随着清

¹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一章《背景》。

²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一章《背景》。

³ 图门、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第137页，第138页，第144页。

查运动的推进，就完全被突破：凡和内人党有牵连，甚至毫无关系的蒙族干部和群众都成为清查与打击对象，从而显露出这场“清查内人党运动”的本质：这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有计划的在蒙族人民中开展阶级斗争，即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的典范，是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治蒙路线，来取代乌兰夫的以民族自治为核心的治蒙路线的一场生死较量：后来成为“新内人党冤案”的重要性与严重性即在于此。

那么，什么是毛泽东竭力在文革中大张旗鼓地推行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呢？其前提是对所谓“阶级斗争形势”的两个估计：一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亡我之心不死，中国处于世界反华势力包围之中，战争不可避免；二是国内传统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以及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与新生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新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下勾结，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¹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据，不仅是夸大敌情，背后更内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敌对思维，即把国内外一切不同于自己的力量，都看作是隐藏的敌人，必除之而后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的文革阶级斗争，就是在敌对思维引导下的向国内外的假想敌的一场人为搏杀，是毛泽东说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巩固国内绝对统治地位与谋取世界领袖地位）的有意识地“设置对立面”。²

由此产生的文革时期达到极致的毛式阶级斗争，有两大特点。首先是整个斗争建立在阶级斗争想象即假想敌的设置之上。具体到我们这里讨论的内蒙古文革中的新内人党冤案，就是建立在三大想象的基础上的。

第一，按照“关心民族问题，要求民族自治就是搞民族分裂”的逻辑，将所有的蒙古族干部与群众都视为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独立王国的社会基础，因而也是文革阶级斗争的基本对象。正是这样的“所有的蒙族人都是公开或隐蔽的阶级敌人”的想象，将清查新内人党变成了围剿蒙古族的种族屠杀。为此而大造舆论，把蒙古族描述成汉人的“不

¹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转引自逢先知、金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13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

²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7页。

共戴天的敌人”。最典型的说法就是下文我们还会详加讨论的“揪叛国集团联络站”的头头乌兰巴干编造的耸人听闻的蒙人屠杀汉人的“历史”：“历史上的匈奴就是蒙古人。蒙古人经常侵犯中原，烧杀抢掠。蒙古人攻下南京，（汉族的）尸体把河道都堵塞了。到了满清，蒙古人依然统治着汉人，鲜血染红了科尔沁草原”，还高呼口号：“为中原避难的汉族兄弟报仇”。同时还制造谣言：“内人党的自治军把辽河两岸的汉人全杀光了”，其结论是指向现实的：“蒙古人过去蹂躏汉人同胞，今天又搞民族分裂”。这样露骨的挑拨汉、蒙两族关系，在文革的气氛里，是十分有效的：乌兰巴干演说所到之处，都引发了残酷的武斗。¹

这样，蒙族人就成了“新内人党”冤案的主要受害者。这是锡盟西苏旗1969年6月写给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的“情况报告”：全旗挖出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成员，占全旗总人数的13.45%，其中蒙族占挖出总数的87.4%。在一些基层单位，像敖干希里大队，14岁以上的蒙族，全部登记，作为清查对象。²还有材料，谈到哲里木盟南湾子公社韩山皋生产队只剩下三、四户“好人”，其余诸户从三、四岁孩子到六七十岁老人，都被打成新内人党。³土左旗有些纯蒙村，更被污蔑成“小台湾”，强迫拆迁。如兵州乡的马群大队、三间房大队都被拆散了。还有蒙、汉族杂居村，强迫搞“三红夹一黑”（按，“红”指汉族，“黑”指蒙族），把蒙族社员当敌人，当成反革命监视起来。在挖新内人党运动中，当时死的，以后死的，有260人，残1000多人，被“挖”成新内人党的竟达一万一千人。⁴

作为清查新内人党运动的主要依据的“四个演变论”，则是第二个耸人听闻的想象，即所谓“内蒙共产党是内人党演变过来的；共青团是内人团演变过来的；军队是由内人党自治军演变过来的；内蒙干部也都是内人党演变过来”。⁵这样的想象其实是自中央文革，在1969年2月，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接见滕海清时，谢富治就指出：“内人党明里是共产

¹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四章《挖肃（一）》。

² 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第369—370页。

³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六章。

⁴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五章《挖肃（二）》。

⁵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四章《挖肃（一）》。

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坚决搞掉”。康生也指明“内蒙军队里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成了内人党的军队，对这个部队要改造”。¹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蒙古自治区的党组织、军队，特别是蒙族的党的领导、干部、党员、团员都成为运动的清查与打击重点，这是建国以来的内蒙的政治运动从未有过的，也算是文革阶级斗争的特点。

1968年10月内蒙革委会《关于‘内人党’问题汇报提纲》里，就列举了一个名单，几乎把所有的内蒙古自治区中共党委和人委厅局长以上的蒙族领导都打成了新内人党的领导与骨干：中共内蒙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即新内人党主席，党委书记奎璧、王再天是新内人党副主席，党委书记兼公安厅长毕力格巴图尔、组织部长李振华、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内蒙人委副主席吉雅泰、副主席哈丰阿、副主席朋斯克、高级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财政厅厅长金墨言、建设厅厅长乌力吉敖其尔、内蒙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戈瓦、对外办事处副主任德力格尔、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巴图、副校长哲博、内蒙古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特木尔巴根——等等，都是新内人党的执行委员、中央委员或骨干分子：这样，以乌兰夫为首的内蒙自治区党委、政府就被想象成了新内人党的领导班子。²

自治区以下的盟市旗县以致公社、生产队，也如法炮制：前文提到的锡盟西苏旗，全旗共产党组织都被打成新内党组织，85%的共产党员都被打成新内人党人，85%的国家干部定为阶级敌人。旗委副部（副科）级以上干部，全部被打；公社一级干部中，只剩下1人不是新内人党；生产队一级干部，除25名属怀疑目标外，其余全部被打成新内人党成员。³东马珠穆沁旗公检法系统97.3%的蒙族、97.7%的党员、70%的干部、96.3%的警察、97.7%的贫苦牧民、95.5%的转业军人，都被打成新内人党。⁴另一个打击重点，是军队的蒙族干部与军人。内蒙古自治区军区三大部中，司令部被打成新内人党160多人，后勤部217人，政治部只有200多人，被定为新内人党的竟有195人。⁵可以说，文革中内蒙的清查新内人

¹ 转引自图门、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第219页。

² 图门、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第161—167页。

³ 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第370页。

⁴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七章《成果》。

⁵ 图门、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第178页。

党，是对内蒙古党、政、军部门的蒙族领导、干部、党员的全面、彻底的大清洗、大迫害。

第三个大胆想象，是苏修、蒙修特务，美、蒋、日特务已经渗透到内蒙党、政、军内部，在全蒙遍布情报网，随时准备进行颠覆、叛国活动。这完全是迎合前文提到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的形势分析、主观臆断。乌兰巴托的“揪叛国集团联络站”就编制过一个《苏蒙修情报系统及叛国集团分布图》，划定了“民族统一党武装暴动地区，新内人党、民族统一党、内外蒙合并委员会等反动组织活动地区，逃蒙叛国集团案件发生区，地下电台、越境方向等198处标记”，还有一个《内外蒙合并图》、《苏修情报系统在北京活动简图》，都弄得煞有介事，其实全是捕风捉影，胡编乱造。¹但因为符合文革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就成为内蒙革委会发动清查内人党运动的依据。

1968年12月滕海清主持起草的《关于“内人党”的汇报提纲》里，就斩钉截铁地宣布：新内人党“不仅是一个以分裂祖国，妄图实现‘内外蒙合并’的反革命组织，而且是一个与苏、蒙修特务，美、蒋、日特务有着密切勾结的，以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庞大的特务情报组织”。²因此，在给蒙族党、政、军领导定罪时，不仅戴上“民族分裂主义者”的帽子，还指认其为“国特”、“日特”、“苏蒙修特”、“蒙修情报员”等等。³这样，内蒙的清查新内人党运动也就纳入了毛泽东在文革中发动的“反对帝、修、反的国际斗争”的轨道，成为其中的一枚棋子和牺牲品。

这样的敌人无所不在的超级想象，就把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变成了围剿新内人党的杀场，如当时风传的民谚所说，“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内人党，内人党比大青山的石头还多”。⁴经历漫长的17个月（1967年11月——1969年4月）的打打杀杀，最后才承认，所谓“新内人党”完全子虚乌有，这就成了历史的大笑话。但在当事人的记忆里，却是无法磨灭的永远的疼痛：这也将毛式阶级斗争的荒诞性与残酷性永远铭刻在历史上了。

¹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四章《挖肃（一）》。

² 转引自图门、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第209页、

³ 图门、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第161——167页。

⁴ 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暴：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第338页。

文革中发展到极致的毛式阶级斗争的第二个特点，是将阶级斗争绝对化，自身就是目的，为了打倒假想敌，可以牺牲一切，不惜一切代价。在自治区常委班子里，就有人公开鼓吹：“即使冤枉好人，伤害自己人，也绝不手软”，而且说得理直气壮：“我个人绝不怕因为打击敌人而失去准头儿，误伤自己同志这种错误。犯这种错误，起码在我心里可以自慰的是，我没有放过敌人。我主观上是积极革命，勇于战斗的，我起码对得起共产党员这个称号”，还有“被误伤也是贡献”的高论：“被误伤的同志阶级斗争的觉悟是高的，他会理解革命的复杂性，他们会理解被误伤实际上也是一种对革命的贡献，是另一种更加伟大、光荣的贡献。没有他们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隐藏的敌人会继续得逞，被误伤的同志终究会原谅我们的”。¹问题是这样的走火入魔的极端观念，竟然成为自治区清查内人党运动的指导思想：“只要有线索就挖下去，边挖边找证据，再定性”，²“只要有百分之三十是真的就继续挖，挖十个有七个是假的，三个是真的；挖十个一个是真的，九个是假的，也是了不起的成绩”，“把锡盟 56 万人全打死，在全国也是一小撮”，“我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成绩永远是主要的”。³把“不怕冤枉人，不怕死人”地搞阶级斗争，说成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看似荒唐，实际却是以一种粗俗的方式道破了毛式阶级斗争的某些本质的，即在阶级斗争的需要面前，人的尊严、生命都无足轻重，微不足道；只要阶级斗争需要，可以不择手段，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这是很能显示毛式阶级斗争的反人道、反法治的根本特质的。

在这方面，文革中内蒙清查新内人党运动，也是一个典范。其所采取的手段，主要有三，都极具文革特色。

一曰“发动群众”，即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阶级斗争。江青就有一个明确指示：“群众专政指挥部是个好形式”。⁴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群众专政指挥部在 1968 年 1 月成

¹ 高树华、程铁军：《内蒙革命风暴：一个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第 301——302 页。

² 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第 302 页。

³ 图门、祝东力：《康生和“内人党”冤案》，第 143 页，第 214 页，第 216 页。

⁴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四章《挖肃（一）》。

立以后，就在全市厂矿、学校、机关、居民点进行多次大搜捕，抓了一大批所谓国民党残余势力，地富反坏右，乌兰夫黑帮分子。这实际上就是绕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以群众的名义，放开手脚，以违法的方式，搞阶级斗争。很短的时间内，群众专政指挥部就遍布全区，从各盟市旗县到公社、生产队，到处私设刑讯室，学习班，拘押所，任意侵犯人权，大搞逼供信，强迫“妻子检举丈夫，儿子控告老子”。¹这样的群众专政指挥部在清查内人党运动中更是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具体有三。一是提供情报。前文提到的乌兰巴托的“揪叛国集团联络站”就属于这样的群众专政指挥部系统，其任务就是“内查（档案）外调（调查有关当事人）”，用合法与非法手段获取、编造所谓证据，自称“发现了上百个反动集团，破获无数重大案件”，实际是“制造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二是“口诛笔伐”，制造舆论。三是大打出手，伤残几十万无辜群众。²

这样的阶级斗争中的群众路线，实质上就是利用前文所提到的汉、蒙两族群众之间的矛盾，将本非对抗性的不同文化、信仰、习惯、利益分歧，人为的绝对化，激化，政治化，变成有我无你、你死我活，一个吃掉一个的生死搏斗。同时，这也是在蒙族内部挑动群众斗群众。这就是康生所说的，“蒙古族的坏人，发动蒙古族群众揪斗”。在清查内人党的运动中，就树立了乌兰巴托这样的“大义灭亲”的典型，影响是十分恶劣的。启之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的“以汉制夷”与“以夷制夷”的现代版，这是有道理的。³

二曰“动用军队”。军队在内蒙文革的全过程，特别是几个关键时刻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一月革命夺权开始，内蒙古军区就深度介入了文革中央上层和自治区的两派斗争，成了对抗文革中央和镇压群众的急先锋，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而在清查新内人党运动中，军队派驻各地、各单位的军宣队，都是第一线的指挥者。最后，在1969年5月，毛泽东和中央发布24号文件，承认内蒙清查运动“扩大化”，宣布“立即停止挖‘内人党’”以后，围绕如何处理新内人党案件，全区上下分裂为两大派，局势大乱，以毛泽东为首的

¹ 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第299——300页。

²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四章《挖肃（一）》。

³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五章《挖肃（二）》。

党中央，一方面使出“肢解内蒙”的杀手锏，将全区七盟中划出三蒙三旗，一面于1969年12月6日宣布由北京军区对内蒙实施全面军管。而当郑维山带领北京军区的部队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内蒙以后，又深度介入两派斗争，扮演了“全面镇压和全面庇护”者的角色：一方面，把新内入党受害者视为破坏战备、破坏民族团结的捣乱分子，重者重新系狱，轻则以“有民族情绪”的罪名打入冷宫；另一面把在清查新内入党运动中有大量血案，民愤极大的干部调出内蒙，逃避法律制裁。同时，军管部队还在牧区大量开荒，无偿拿走公私合营牧场的牲畜，进一步激化了与蒙族的矛盾。¹可以说，军队是把毛泽东“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问题”的路线坚持到底的。在执行毛泽东的治蒙路线中，军队一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曰“暴力治蒙”。前面讨论的“发动群众”、“利用军队”最后都落实为“暴力”，这是毛式阶级斗争的实质。启之分析，文革中发展到极端，在清查新内入党运动中发展得最为完备的暴力，是“结构性暴力”、“文化暴力”与“直接性暴力”三种形式的结合。新内入党冤案的责任主体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内蒙地方革委会——由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群众专政指挥部构成的基层专政组织”，它们的行为构成了“结构性暴力”。而所谓“文化暴力”则是文革中最为盛行的“舆论先行，大批判开路”，铺天盖地的讨伐所施加的思想暴力、语言暴力，对人的心理的压力，情感的伤害，是极具杀伤力的。²“文化暴力”的另一面，是对少数民族教育的摧残和文化同化，伤害就更为深远。

最触目惊心的，是直接性暴力。在大挖新内入党的疯潮中，出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肉刑。乌兰察布盟计委主任比力格图的牙齿被人用老虎钳一个个拔掉，又把舌头和鼻子割掉而死。四子王旗白音鄂博公社秘书敖日布扎木夫妇，被凶手用刮胡刀片将身上的肉一道道隔开，用食盐糝进去，再用烧红的烙铁烙伤口，名曰“发肉条”。两口子被虐杀后，刚刚五个月的孩子被活活饿死。达茂旗期委书记包国良的妻子被打成新内入党后，凶手们用绳

¹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八章《戡乱》。

²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四章《挖肃（一）》。

子拉大锯，将其阴道和肛门拉通，终身残废——¹在托克托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档案里，记载着清查新内人党使用的36种刑罚：“爬肉条”（用烧红的炉钩子烫犯人），“烙油饼”（将烧红的炉盖按在犯人身）， “金钩吊鱼”（鼻上穿孔）， “拧麻花”（吊两臂旋转打）， “戴拉东”（将打场和平地用的中间带孔的圆柱形石块——“拉东”，用铁丝栓住，挂在病人脖子上）， “挂火炉”（将生着火的花炉用铁丝吊在犯人脖子上）， “炒库伦”（库伦音译，内蒙农村的一种食品。这里意指几个人将犯人围在中间，你打过来，我踢过去），等等。²

这样的暴行，绝非个别，而是遍布全蒙，贯穿于清查新内人党全过程并成为其标志的。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施暴的凶手并非天生的恶人，是清查运动背后的鼓励暴行的机制和意识形态，将人性中最残暴的嗜杀性诱发出来，导致人的动物化的结果。而且，这样的暴行是得到国家保护的，前文谈到的军队对凶手的有意放纵，绝非偶然。有研究者因此强调，清查新内人党运动对蒙族的暴力围剿，是“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的国家行为”，占支配性地位的始终是国家暴力，群众暴力是受其倡导、鼓励、指挥并受到庇护的。³

三、结局与后患

1978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新内人党问题的报告》里，明确指出：“所谓新内人党是根本不存在的，应该完全予以否定”。⁴在此之前的1973年8月，中共十大上乌兰夫重入中央委员会，当上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这自然也意味着，“乌兰夫民族分裂集团”也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样的结局是出乎所有人的意外的。它表明，内蒙文革是向“根本不存在”的敌人发动的一场“空战”，却为之付出了数以万计的人的生命。这是按照意识形态的需要，用暴力来解决党内分歧和民族矛盾的人为制造

¹ 图门、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第201——202页。

²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三章《挖肃（二）》，

³ 程惕洁：《四十余年回首，再看内蒙文革》，收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第744页，田园书屋，2007年出版。

⁴ 转引自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十章《善后》。

的全面内战。

但所有的参与者都付出了血的代价。人们注意到，在乌兰夫重掌大权的同时，前门会议上将他打倒在地地的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也被夺权下台；新内人党冤案不仅自始至终伤害了广大蒙族干部群众和同情者，它的策划者、指挥者，从滕海清到高锦明、吴涛、谢振华，以及从自治区到各盟市旗县到最基层的各级执行者，最后也都在运动的不同阶段成为清理和打击对象：可以说无一幸免，整人与被整者同归于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毛式阶级斗争的“绞肉机效应”。

历史将记下这血腥的数字：在新内人党冤案中，有三十四万六千二百二十人遭到诬陷，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严重伤残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八人。¹

更要追问的是，这历史的血腥重负，最后由谁承担？

于是，就注意到两个事实。乌兰夫复出以后，他的家族也恢复了昔日权势，还更上层楼：大儿子布赫最后当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小儿子力沙克也历任赤峰市副市长、包头市长、山西省副省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²在内人党平反、落实政策时，政府拨出大批款项，抚恤受害者，不想却成了一些干部以权谋利、荫庇子女的机会，在补助赔偿和子女工作安排上均抢占先机，吃亏的还是无权无势的基层干部和普通蒙族百姓。呼和浩特市郊区的一位老实巴交的蒙族干部在清查中本人致残，家人被整死4人，落实政策只给了几百元。他对来访者说：“我们这儿，有门路的人，受了轻伤，甚至在运动中只过问了一下，都把子女安排了国营（单位），而挨整重的伤残者，因为没有关系，多数安排在集体，经济上更是寥寥无几。这就是落实政策的甜头和果实，你吃也罢，不吃也罢”。他总结说：

“从文革开始到落实政策，给人的感觉是：整死你，算你倒霉；活下来的还是拣个便宜。如果有机会再整你，你也干挨着。整人有人管，到解决问题就没人管了。表面上算是落实

¹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给中央的报告》（1980年6月25日），转引自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七章《“成果”》。关于内人党的受害者人数民间有不同说法：流亡海外的蒙古族学者巴赫认为，逮捕了80万人，50万人致残，5万人被拷打迫害而死；内蒙古大学编写的《内蒙古自治区史》记载，有2万7千900余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多人伤残。有人说，被关押者有50万以上。见程惕洁：《四十余年回首，再看内蒙文革》，收《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第745—746页。

² 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第569页。

了政策，实际就是那么回事，直到现在，谁在管你呢？”这是一语道破了真相：“谁管你呢？”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老百姓的死活是没有人管的，文革民族灾难的承受者只能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基层干部与广大民众”。¹

而且受伤的心灵是很难平息的，侮辱与损害只能激起不停息的反抗。新内人党的冤案平反了，但后患无穷。于是，就有了1974年以来蒙人的不断“闹事”。

1978年5月17日，内蒙高级法院对面的影壁上，出现了一篇署名“内入党死难者家属达楞哈日”（汉译“大青山”）的长文，公开批判林彪、四人帮奉行“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路线”犯了“屠杀少数民族共产党人”的“滔天罪行”：在经济上，由于“农牧民干部多数被打击迫害，夺了他们的生产指挥权”，导致农牧业生产“年年下降”；在文化教育上“大力推行以强制同化为主的法西斯文化科学专制主义，使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科研事业走进死胡同”；在政治上“保护那些镇压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者和双手沾满鲜血的屠杀少数民族的反革命杀人犯”。接着又贴出1940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政策在蒙古民族中的影响》的旧文，以此对照当下现实：“大汉族主义者在蒙古实行殖民、屯垦、建省、设治，使广大蒙人从原来保存不多、土地较肥沃的地区排挤到了荒凉沙漠地带”，“在黑暗专制统治下没有任何民主权利”，“窒息了蒙古民族自救更生的积极性”，“造成了广大内蒙人对汉族深刻的仇恨与成见。由于这种仇恨与成见又造成某些地方蒙人压迫汉人的现象、大汉族主义者激起某些蒙古族热中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使蒙汉矛盾加深”。这自然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当年共产党批判、拒绝的“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现在又被自己继承与发展了。而这里谈到的“汉蒙矛盾加深”，可能是文革中制造的新内入党冤案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这是内蒙知识分子在文革后对文革中的民族问题，所作的第一个批判性的发言，因此，当时与以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紧接着，1979年初，又有200余名蒙人，包括教师，学生，党政干部，联名上书中共中央，要求将十年前划出的三盟三旗还给内蒙，恢复内蒙原来区域。

¹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十章《善后》。

1980年冬，内蒙古大学、师院、医学院、蒙专等校数千名学生发起签名运动，要求惩办滕海清。两个月后，又有6万蒙人签署上告信，寄国务院、人大常委和党中央。

1981年发生了建国后最大的蒙族反抗运动。事情是由1981年8月发布的28号文件（《中央书记处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问题工作纪要》）引起的。文件的一些提法引发了蒙族学生、干部与知识分子的不满，内蒙党校立即贴出了“保卫民族自治权利”、“争取民族生存”的大标语，随即又出现了《评因周惠（按：当时的内蒙党委书记）汇报产生的29号文件八条》等大字报。

从这些大字报看，他们的不满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文件肯定内蒙党委对“民族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各民族比较满意”；而蒙族干部与群众却认为，这“纯属强奸民意”，有意掩盖由于文革中的新内人党冤案而导致的汉蒙两族的紧张关系。他们尤为不满的是，党和政府始终拒绝依法惩治新内人党冤案的主要策划者滕海清，质问道：“如果蒙人上万条生命顶不上一个汉人，我们这个主体民族还有什么权利可言？”

第二，文件虽然谈到要控制流入人口，但又强调“人口从外省自然流到内蒙古去内蒙古也不要采取堵的方针”。在蒙族看来，这无异鼓励人口流入，“内蒙人才二百万，汉人是蒙人的9倍，流进来的都是汉人，其结果必然使我们这个主体民族有名无实。内蒙是我们蒙族自治区，我们有权利保卫自己土地，保卫自己的生存空间”。

第三，文件规定：“要搞双照顾，既要照顾二百万人口的主体民族蒙古族方面，又要照顾一千六百万人口的汉族和其他民族”，要实行“双依靠，汉人离不开蒙人，蒙人也离不开汉人”，“干部比例要双为主。在汉族聚居区域以汉族为主，在少数民族地区以少数民族干部为主”。蒙族则反驳说，在蒙族各方面都处于劣势的现实情况下，“双照顾，双依靠，双为主”看似公平，实施的结果必然是汉族强势地位的不断扩张，最后导致对蒙族的“吞噬”，即“用强迫同化来解决民族问题”。有的蒙人从文革经验出发，对汉蒙相互“离不开”的说法特别反感：“我们蒙人凭什么离不开汉人！离开你们，我们会少死多少

人，少吃多少苦，少受多少气！”

以上三方面的分歧，其中第二、三方面其实就是我们前文分析的汉、蒙两族的“先在性矛盾”。在文革前就存在，文革中执政者就是利用这些矛盾，挑动汉族参与对蒙族的围剿，因而极大加剧了汉蒙两个民族之间的不信任，以致相互仇恨。蒙族对28号文件的强烈反应，从根本上说，是为维护自身的生存空间，政治文化上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也确实夹杂着某些民族情绪，其内含的正是文革中的民族围剿带来的心灵创伤。这就是启之所分析的，“挖肃留下的悲惨记忆，被侮辱、被歧视的民族心理，受摆布、受愚弄的感受，弱小民族自我保护意识与狭窄过激的民族情绪混杂在一起，触发了内蒙民族民主运动的导火线，形成文革后第一次大型学潮，第一次少数民族抗议运动”。

如在这次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的蒙族大学生所说：“我们这一代是在文革中长大的，父母被抓被杀，我们亲眼目睹，刻骨铭心。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民族问题。这关系我们这一代，关系整个民族前途，蒙古人对28号文件中的人口政策，干部政策，滕海清问题有看法，根源就在内人党。在十年文革，毛泽东提出‘民族问题，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问题’。蒙古人只要说一句维护民族利益的话，就成了阶级敌人，是搞民族分裂，就是反党。”这清楚地表明了，1981年的民族抗议运动和文革中的清理新内人党冤案的内在联系，应该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后患”。

问题是，面对蒙族大学生代表的抗议运动，八十年代的执政者依然按照毛泽东的“民族问题就是阶级斗争问题”的思维和方式来处理。他们很快就把抗议运动定性为“闹事”，并且断言：“学生后面有后台。内蒙历来有一股势力，以民族利益代表者为幌子，反对共产党领导”，进而给表达不同意见的学生戴上“利用民族问题，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现在的党中央”的帽子，这与文革中对民族问题的处理方式同出一辙，只是按照形势的变化，将其纳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轨道。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学生被迫宣布罢课，并派出代表到北京上访。当局依然采取高压态势，经过反复较量，学生最后被迫复课，随即是毫不手软的“秋后算账”，学生领袖受到惩罚不说，还有二、三百斤局盟市级

的蒙族干部因同情、支持学生而去职。这样的高压，就使得1981年蒙族学生运动，除了要求自治的民族抗争意义，还是一个争取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的民主运动。如学生们所说，“镇压的结果，只能是离心离德。你最不愿意看到的，都被压出来了”。这就真正的“后患无穷”了。

蒙古族的抗争也并未就此结束。1984年，四千多蒙人签名，要求惩办新内人党冤案的策划者滕海清。1985年，又有蒙族学生、知识分子继续要求“惩办”。1989年，内蒙各界齐声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加入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就是一个自然的结果。

在此前后，执政者又使出“安抚”的一手，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对蒙古族实行优惠政策，也一定程度缓解了蒙族的不满，但却又引发了汉族的不满。启之在他的书里引述了一位汉族网民的文章，批评“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与照顾”，“其实质是对少数民族地区汉族进行歧视”，“蒙族以很少的人口比例，占有了内蒙大部分机会和财产。蒙古族是内蒙的主体民族，少数民族和汉族是法律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在他和他所代表的一部分汉族人看来，“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失败的”。

我们所面对的，正是民族问题的复杂性。看来，蒙、汉两族对民族关系的现状都是不满意的，要真正实现人们理想的“民族和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新的理论创新和试验实践。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而如启之先生所说，要总结历史，最终达到民族和谐，关键是要最大限度地恢复“历史真相”。这也是我们今天通过内蒙这一个案，来研究和讨论“文革中的民族问题”，其目的与意义所在。¹■

¹ 以上关于清查内人党冤案“后患”的讨论，均见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11章《影响》。

【评论】

《滕海清谈内人党》的读后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阿尔楞

细读端阳先生的访谈录《滕海清谈内人党》后，相当吃惊！此访谈未注明年份，估计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即内蒙挖“内人党”结束的近三十年后。第一个吃惊处：当年身为内蒙古党政军第一把手的滕海清，在近三十年后，对文革的产生和后果，对文革给中国人民及“内人党”冤案给内蒙古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不仅丝毫没有从历史、党史和政治角度的反思及认识、对他在内蒙古挖“内人党”的严重错误，不仅没有丝毫的悔过和愧疚之心，反而罔顾历史事实，在访谈中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的人，甚至是受到康生和谢富治等人迫害的人，怎能不令人大为吃惊！滕海清在访谈中说：“内蒙挖‘内人党’，党委提的要破案，那是你搞出来的，与我根本无关。”事实上，在挖“内人党”的错误上，滕海清应该是担负责任的第一人。这一点，不是文革中还是文革后的党中央，都是如此定性的，这也是内蒙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共识。几十年后，滕海清却将这些历史事实一概推翻，利用访谈者的不知情，采用一种似乎在暴露“内幕”的手法，“讲述”了另外一个挖“内人党”的“历史故事”，来掩盖和否认自己当年的错误，似乎相信“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以在他身上重演。对于一个1931年入党的高级干部来说，滕的谈话没有一点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工作负责的态度，号称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初心哪里去了？

华国锋时代平反“内人党”冤案时，查明的受害人数为34万6千多人，死亡人数为1万6千多人，中央将此案定性为建国以来死亡人数最多、伤残人数最多、受害人数最多的特大集团冤案。面对这个事实，滕海清在访谈中说：“审四人帮的起诉书，内蒙死了一万六千人。开始三十万，后二十万，十几万……搞不清楚，他说多少就是多少。死是死

人了，不光是‘内人党’，地富反坏右都有。”“扩大了，讲不清楚啊！死在哪里了？。。。。。。以后什么病死的、好几年前死的、以后死的都算在这里面了，反正搞不清了。。。。。。67年夺权时杀的人，都算在里面了”“死多少人，现在没法去整这个事情了。内蒙XXX死了，什么时候死的，你搞不清。他打死人的人，他不会报告的。那个糊涂账。”这些话中，哪里还有一点儿人民的干部、高级干部的味道？与草菅人命何异？滕是军人出身，应知即便是战争年代的混战之后，双方都可清点伤亡人数。那么，在文革时代那样严格的户籍制度和严密的组织制度下的中国，怎么可能死多少人和怎么死的成了“搞不清楚了”“现在没法去整了”呢？这么重大的历史冤案，怎么可以用一句“糊涂账”就交代过去了呢？这种的政治水平和品质的人，当年却被委以掌管内蒙古一千三百万人口之政治生命的重任，这是第二个令人吃惊之处。

第三个吃惊之处：此篇谈话，表面看去，似一个很漫不经心的回忆，很口语化，有时还用“他妈的”和哈哈大笑来显示轻松。仔细读读，可以发现，这是一个经过非常仔细的思考和精心策划过的回忆，在许多重要节点和关键之处，滕海清要么是通过颠倒前因后果、要么是通过变换时空等办法来嫁祸于人和洗脱责任。滕海清本人早年在苏区时代就参与过打改组派、在鄂豫皖打AB团的错误运动，文革中又在内蒙古犯了那么大的错误，造成死伤几十万人的冤案，被内蒙古群众送与“左滕中将”的绰号。对几十万受害者，滕海清在通篇谈话中，没有一句同情和愧疚之言，对自身的错误毫无检讨之心。不要说党性，滕将军的人性何在？！

第四个令人吃惊之处，便是滕海清的谎言和假话之多！用“假话连篇”来形容，已远远不够，可以说是“假话连句”。对于当年众人皆知的事件，对于当年中央白纸黑字的文件，甚至对于当年他自己写过的文件和说过话，他居然都能篡改、否认和撒谎！最明显的例子是，1969年4月在中共召开九大期间，毛泽东指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这是滕海清及内蒙革委会当年停止挖“内人党”的最根本的原因。毛泽东的这个话（当年叫最高指示），九大闭幕后，中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传达到全内蒙古，路人

皆知。滕海清竟然对来访者说，九大没提“扩大化”，没有这个词。什么是弥天大谎，这就是弥天大谎！“左滕中将”是真敢篡改历史啊！

读了滕海清的回忆，气愤与感慨不由而生！过去觉得滕海清是大老粗军人，由于文化低和政治水平低，加上思想极左和急于立大功等因素，使他在内蒙古酿成大错。读了此篇访谈，不得不加上：此人的人品和素质也太低了！靠造反翻身而当官的农村草莽，绝对不怕死、敢打仗，历朝历代不乏此类人。滕海清其人，尽管参加了共产党，并且成为了高级干部，但他在内蒙古的所作所为和此番谈话中所暴露的思想，与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崇高目标毫不沾边！文革之恶，素有渊源，“左滕中将”，亦非个案，值得沉思。■

【访谈】

滕海清谈“内人党”

王端阳采访 整理 阿尔楞 评注

说明

文革期间发生在内蒙的挖新内人党的事，曾震惊过全国。当时我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0团，就在紧邻内蒙东北部的拉哈，经常赶大车途径内蒙，曾听在这里插队的北京知青谈过此事，有过一点亲身感受，但对整个事情的过程并不了解。以后听说有人写过一些专著，我也没读过。但一个偶然的机遇，我采访了滕海清，留下了4盘录音。

那是1993年8月21日下午，我小学同学王战生带我去拜访了滕海清，他答应把“内人党”的事详细告诉我。他讲审查期间他写了厚厚一叠子，那都是假的，让我“包”下来，逼供信，真实情况全在我脑子里。他明天要去济南搬家，回来后再和我详谈。（日记）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未再提及此事，我也不好追问，估计他是在慎重考虑，毕竟此事非同小可。直到一年后的10月6日，滕海清又表示同意我去采访。上午去他家谈了谈，滕老很健谈，

而且记性令人吃惊。我没带录音机，约好明天再来详谈。（日记）之后便开始了采访。

由于各种原因吧，录音始终没有整理出来。一晃二十多年过去，现在不是讲“口述历史”吗，便将其整理出来。

时间：1994年10月7日

地点：滕海清于北京西直门内的家

主访人：王端阳

受访人：滕海清

王：昨天没带录音机，很抱歉。今天还是从你接受去内蒙的任务开始好吗？

滕：好。1967年4月12日晚上12点以后，周总理的秘书打电话叫我赶快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那时中央有个规定，开会不准带秘书，什么都不带，总理也不带秘书。【阿尔楞注：中央从来没有这种规定。有的会议会通知来人不带秘书，但总理身边一直有秘书。滕的这个说法是个伏笔，见后面】

王：当时你的职务是什么？

滕：北京军区副司令。【阿尔楞注：滕海清1955年被授衔中将。1961年，从解放军石家庄高级步校校长调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分管训练和院校】

王：那时你有没有介入地方工作？

滕：我从来没有搞过地方工作，这是第一次。我住在新街口的家里，总理叫我到北大厅，当时街上没什么车，几分钟就到了。到了以后，门口站岗的也不问，有个参谋接。一进门就是北大厅。我进去，总理正在那里讲话。内蒙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在那里，谈判嘛，内蒙不是开枪打死人了嘛。这是打死人以后。【阿尔楞注：打死人指1967年2月5日内蒙古军区干部柳青在军区门口开枪打死了群众组织中喊话的大学生韩桐，这是文革中全国范围内解放军开枪打死人的第一枪，震惊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要求内蒙古党委、内蒙

古军区和两派群众组织等四方派代表到北京开会，解决内蒙问题。中央领导先后接见了八次内蒙的代表，滕海清这次参加的是4月12日-13日凌晨的第五次接见】

我一去，向总理报告我来了。总理说好好，你坐下。他没讲什么，就说：“同志们，这是滕海清同志，北京军区副司令，到内蒙去当司令，主持内蒙工作。你们表示欢迎。”

【阿尔楞注：此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口头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即“4·13”决定），要点为：1、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2、内蒙军区党委某些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3、任命刘贤权为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并成立以刘贤权为首的内蒙古革委会筹备小组。周并宣布，在刘贤权到任之前，先由北京军区一名副司令员代理一段工作（即滕海清）】两派都鼓掌欢迎。（笑）鼓掌之后我就坐在那里，他们一直在讲话。

王：两派都在，有多少人？

滕：有500多人。这是两派谈判之后的讲话，总理讲后，陈伯达讲，康生讲，杨成武讲，肖华讲，都讲了，讲完快天亮了。讲话之后“4·13”决定就出来了。

散会后，我拉着总理问：“总理，怎么搞的，让我到内蒙去？”总理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你去代替刘贤权同志。”刘贤权已经下命令了，当内蒙军区司令。命令我没看到。刘贤权在青海开枪打死人了，【阿尔楞注：滕的说法不对，在青海指挥开枪的是副司令员赵永夫（与刘是对立派），不是刘贤权（青海军区司令员），此事即青海“2·23”事件，伤亡群众为二百多人。】以后回青海，问题没解决，就来不了了。让我到内蒙去，代替刘贤权。【阿尔楞注：当时说是代理，不是代替，见后面滕与周恩来的对话。当时中央军委任命刘贤权为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吴涛为政委，刘华香、肖应棠、刘彬为副司令员。因刘未能到任，又任命滕海清为内蒙古军区代理司令员。实际上，刘贤权一直未到内蒙古就任（后

调至军委办事组工作），滕后来由代理司令员变为司令员】我说：“总理，我从来没搞过地方工作，另外我没有到过内蒙，第三，内蒙的人我一个也不熟，怎么好搞啊！”“不熟，你到了不就熟了吗？内蒙是反修前线，很乱，军队、地方全都瘫痪了。内蒙乱不得，反修前线，北京的北大门，你在北京工作还不知道吗？中央已经决定了。”出门时站在那里讲的。

王：事前你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滕：没有。那时我们军队有个习惯，叫你到哪里去，从来不讲价钱。……红军长征后就到陕北……（注：以下谈他的经历，略。）

总理讲中央决定了，我就不能再讲话了。

内蒙的造反派我都不认识，还有领导干部，有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吴涛、李质，5个人，原来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处的书记，【阿尔楞注：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为原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吴涛和李质是原省委常委】他们都站在造反派一边。【阿尔楞注：在1966年10月以前，内蒙古党委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哪一派。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25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表扬“全国只有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写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华北局在会后批评了内蒙古党委，之后内蒙古党委集体决定支持反对“刘、邓”路线的“呼三司”，当时叫少数派。中央在1967年4月13日的决定中，将“呼三司”定为革命组织，将其对立面定为保守组织，引起对立面的强烈不满。对立面原准备在1967年3月18日成立内蒙古革委会，未得到中央批准】。他们住在西苑宾馆，领导干部都住在那里。我们都不认识。头天晚上康生已经把原书记王逸伦和王铎打倒了，王逸伦是苏修特务，王铎是走资派。他们都是很老的干部。【阿尔楞注：王逸伦，1904年生人，1932年入党；王铎，1912年生人，1937年入党】宣布时我没在。【阿尔楞注：这是同一次会议，滕海清到会较晚】

第二天我找了高锦明、吴涛。14日、15日准备了两天的，16日我就到内蒙去了。那些地方干部都不敢回去，包括吴涛，都没回去。

肖应棠，副司令【阿尔楞注：1955年少将，时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他站错了队，康生已经把他骂得不行了。他那时很难过，他和我很熟，他原是65军军长，在政治学院学习时，我在他那个班当班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我一个人不好去，就找他：“老肖，我到内蒙去，你跟我去。”他说行啊。

我们坐飞机去，伊尔14，我、肖应棠，五六个人吧。

我们是4月16日下午两点到的。一下飞机，就把我带到离机场20公里的军区办公大楼。门口已站满了人。党委会在三楼，几层楼包括楼梯都站满了人，都是军队的，还有护校的，男女都有。我一去大家就鼓掌，我也搞不清楚。肖应棠放下我就走了。

滕海清夫人插话：你怎么从后面讲，应该从前面讲。（注：她说的“前面”是指滕海清参加革命的经历，滕海清只简单地说了几句，就直入我们约好的主题，即他主持内蒙的那段历史。我当时的感觉是她不想让滕海清讲这段“后面”发生的事，毕竟是他人生中的“走麦城”，而且和中央的文件“唱反调”。）

滕：人家叫我怎么讲我就怎么讲。

他们不是造反派，是保守派。到了四、五点钟了，有人说：“滕司令，你来了，好啊！你是跟毛主席几十年的老同志，我们非常拥护。现在啊，你要知道，他们（指造反派）是牛鬼蛇神，【阿尔楞注：指对方组织中有出身和家庭成分不好的，以及文革初期被工作组打成坏分子的】我们才真正是拥护毛主席的。你来了，为我们撑腰啊！”

“司令，你给我们讲话吧！”我就听着吧，我说我刚到这里，我对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我怎么讲话呢？讲什么呢？我说就讲“4·13”吧，他们说不听这个，不听这个，非要我讲话，我就没想这事呀。

他们是保守派，中央指示的决定是让支持内蒙呼三司造反派，你让我怎么讲？

最后他说那好，你不讲话，你跟我们到街上走一下，坐汽车。保守派在外面站成队了。讲话的人我也不认识。这些人基本上是干部，战士比较少，机关的干部，护校、步校的学生，没有军区的大干部。

他们说坐上汽车转一圈。我说我还没吃饭呢，以后再说吧。好不好呀！

走一圈的意思是什么呢？表示站在他们那一边。我那时也想这一问题，我怎么能去见呢？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从来没有怀疑过，是叫支持造反派。

我说，把肖司令叫来。肖应棠来了，我说：“老肖，你这是怎么搞的？我还没吃饭呢！”他是保守派，保守派听他的。他希望我支持他们，他自己不好讲，就出去了，这时把他叫回来。他对保守派说：“吃了饭以后再讲。”就把我带出去了。

军区有一栋栋房子，我就住军区，我是司令啊。吃了饭，天黑了。参谋、秘书没住我那个地方，他们住市里的新城宾馆。

我带来北京军区组织部长，叫刘树春，【阿尔楞注：刘是北京军区政治部副部长，不是北京军区组织部长】这个同志很好，很有脑子。晚饭以后，他打来电话：你是不是住宾馆来？你住的那个地方不保险。我说我没考虑这个事情。他说你别讲话，你讲话，造反派都听得见，有录音。你最好住到新城宾馆来。我说那好吧。

以后他开车把我接到新城宾馆。其实电话都通着，你到哪里都知道。

到了新城宾馆，我住4号楼，是个两层楼。我到那里，天就黑了。

分区政委郭如廷（音），他就带了内蒙呼市分区几十辆大汽车来，当然都是保守派了，宾馆也不能不让他们进来，就进来了，一下子就开到4号楼，高音喇叭对着楼叫。没敢进楼。其实我和郭非常熟，那时造反派眼睛都红了，不认人了。（笑）

他知道我是支持造反派的，他是保守派的。他是示威，意思是让我同情他们。

后来一个宾馆的公安员，叫张文之（音），他是造反派，他说：起来，快走！在这里不行。我说怎么走？他们都在门口围着。他说走后门。什么都没带，在他的带领下从后门走了。出去以后，保守派就把围墙围住了，晚一步就被兜住了。

送完我，那个公安员又回去了。

宾馆后面是一个很大的操场，我还带着几个参谋，站在那里，这到哪去呀？

待了不到20分钟，看到一辆吉普车，开得很快，一直开到我站的那个地方，大约晚上

8点多钟。司机年纪很大了，他一下来就说：“司令，赶快上车！”他是内蒙党委的，机关上都是造反派，新城宾馆也是造反派，可能他回去打电话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开车来接我，他们是有联系的。（笑）

我们几个就上了车，我说：“同志，到哪去呀？”他说：“你说到哪去就到哪去。”我想想，说：“你把我开到铁路局好不好？”他说：“好。”

开到呼和浩特铁路局。铁路局有我们69军一个连在那军管，有个副军长在那负责。他们住三楼，我就上了三楼。他们那个地方军管，保守派不敢冲。

到了以后，铁道部的造反派在一楼、二楼坐满了，干什么呢？保护我，不准保守派上来。

我对造反派说：“你们回去，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说：“司令，我们保护你，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你不要管。”就这样，从4月17日的晚上蹲起，一蹲就蹲了一个礼拜。

第二天，造反派在外面一个场子里集合，让我去讲话，不到两万人，就几个大学。怎么讲，我就讲毛主席批示的“4·13”决定。他们知道我是支持他们的。那是18日下午，讲完就回来了。

那以后，保守派每天早上8点钟开始游行，坐着汽车，军队走在前面，群众在后面。有一天走到我那里，大喇叭对着喊呀。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在我门口喊。都是保守派。都停产、停课，那干什么去？每天有十几万人，【阿尔楞注：此说法太夸张，当时呼和浩特市的人口为23万，不可能每天有十几万人到大门口。况且新城宾馆门口也没有广场，无法容下十几万人】他们就是要求我见面，没别的。

我下去见面，一个呢，造反派不准我去，天天游行。一个呢，我去讲什么？我没办法讲啊！我也没办法给军委打电话，打电话他们都录下来了。

造反派可以打电话和总理联系，我打不了电话。造反派不用军线，用地方线。总理每天都知道情况。我没办法出去。

一个礼拜后，他们几个地方干部，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都回去了，吴涛还

没回去，他们是造反派，也住在铁路局，也不敢回家。他们住四楼。他们很尊重我，我也尊重他们。我老问他们，这怎么办呢？他们也没办法，也不敢出去。

大家研究后，叫我回北京给总理汇报，看怎么办。

5月15日左右，我就坐飞机回到北京。回北京之后，我就直接到军委办事组。大约是19日晚上就找总理，把这情况就汇报了一下。总理说：“你看你不能工作，大概你这个代司令不行了，要当司令了。”我说当不当司令……现在也没办法。（笑）

我说：“总理，你看怎么办？保守派要我表态支持他，中央的4·13决定要支持呼三司造反派，我怎么表态和中央唱对台戏？”

总理说：“你讲话是可以讲的，你讲大联合起来嘛。”我说你讲联合，你首先要表态他是革命的，支持他的，对保守派连革命两个字都不提的。

从我现在讲，我并不反对保守派的，都是军队，老工人。

之前【阿尔楞注：指5月15日之前】内蒙军区三千干部到北京上访，住招待所嘛，在海运仓有个礼堂，【阿尔楞注：指北京军区的一个礼堂】政治学院礼堂，后勤学院礼堂，所有地方都住满了，吃饭不要钱，那时规定都要接待呀！我们也知道他们来了。

总理、康生他们研究以后，把杨成武、肖华都找来了，做上访军人的工作，动员他们都回去。他们属保守派。

15日，16日，回来以后，我和吴涛两人就跟着他们到处去，其他副司令都不敢去。杨成武讲话，肖华讲话，根本就讲不下去，一讲话他们就喊口号，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万岁，他喊这个东西，你讲话讲不下去。

开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在京西宾馆，向总理汇报。总理讲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把他们动员回去。他们都是干部，解放军都是执行命令的，你们怎么不能动员他们回去。

第二天又去做工作，连做了两三天工作。杨成武是代总长，肖华是总政主任啊，到那里也讲不通，怎么都不听。你讲你的，他喊他的口号。他提他的问题，他提的问题，杨成武、肖华也没办法答复。

到了5月29日晚上，还是28日，内蒙保守派围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大楼【阿尔楞注：此事发生在5月10日，不是5月28日或29日】，党委都是造反派【阿尔楞注：滕的说法不对，党委机关工作人员不都是造反派，也有个保守派组织叫“无产者”】，他们不敢回家，都住在大楼里，四层楼，有个地下电缆，可直接通北京。

保守派好几万人就把大楼给围住了，往上攻。

王：动武器了吗？

滕：这会儿还没有动武器，拿着棍子。

造反派把桌椅堵到楼道，保守派就放火烧，这一烧了以后，有个叫白双喜的蒙族同志，也是造反派，就直接打电话到京西宾馆报告情况，说现在楼火已经烧到第二层了。总理一听特别着急，把吴法宪也找来，叫准备好飞机。当时吴涛、我、总理在一块呢，就在京西宾馆一楼，礼堂后面。电话通了，烧到二楼，总理急得没办法。总理问我：“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说：“我去了后根本就没工作。只是给独立第三团做了一点工作，他们现在听不听我的还不知道。”总理说：“你打电话试试嘛！”

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团长，我说：“保守派攻党委大楼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说：“楼梯已经烧着了，你有什么办法吗？”他是军人，很简单：“司令下命令，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说：“那好。政委呢？”“政委也在。”“叫政委接电话。”政委接电话：“司令，你讲，我照办。”我说：“你带你们第三团好好增援一下，把党委大楼内的几百名造反派接出来，不然他们就被烧死了。”

我问有没有办法？他说有办法。什么办法呢？他没具体讲。我下命令时总理就站在我旁边，没说话。吴法宪也在场。必要时总理要坐飞机去呢，几百人烧死了怎么得了啊！总理真是啊！

我打电话时已到夜里12点了，总理还在。打电话以后，部队就出发了，电话也就不通了。党委大楼的电话还通着，白双喜，党委的基层干部。

以后，天还没亮的时候，三团搞了几个拖拉机，开上拖拉机把围墙撞倒了，一个团一

千多人呢，一下子冲进去，保守派也是害怕，就撤了。

大楼安全了，这时天也亮了。

天亮以后我们就打电话，大楼上就讲，保守派已经退了。

我就打电话给三团，问怎么样。三团说：“报告司令，我们完成任务了，已经抓了十几个头头。”我也不认识那些头头，我说：“没打他吧？”“没打。”

到了7点多钟了吧，我就打电话给总理，那时总理不在我们那里。

王：总理几点离开的京西宾馆？

滕：大概3点多钟。早上打的电话，总理的电话还是好打的，我不知道电话号码，是通过京西宾馆的工作人员打的。我说：“总理，昨天那个大楼已经完全拿了下来，三团起了作用，把保守派冲垮了，他们就退了，没有伤亡人。三团报过来，抓了十几个保守派的头头。”总理说：“那就好了，你告诉他们，对那些抓来的保守派头头，不要虐待他们，做他们的工作。”我说：“好，做他们的工作。”总理说：“那好，问题解决了，我就睡觉了。”【阿尔楞注：此事是由内蒙古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刘华香带部队去解围的，其中有没有滕说的三团不清楚，但肯定不是一个团长能解决的事情】

王：攻大楼的保守派里有没有军人？

滕：有啊！军队已经控制不住了，他跟保守派，他要搞什么，控制不住了。他的一部分上访了嘛，一部分留下，攻大楼。也有地方的，地方的都是干部。【阿尔楞注：围攻党委大楼的军人很少，主力是工人和农民的群众组织（名称是“红卫军”和“工农兵”），不是干部，不知滕在此为何说成都是干部】

北京上访的人还没解决。大概是5月28日还是29日【阿尔楞注：实际是5月25日，中央军委接见军区上访人员】，那天晚上，在政协礼堂，做不通了，保守派冲到台上去，把吴涛的眼睛打坏了【阿尔楞注：同时被打的还有军委办公厅主任路扬（1961年少将）】，晚上就抓人了。

那天晚上我没去，我上301医院，什么病，晚上回新街口的家里。秘书讲在政协礼堂

开会，吴涛被打了。我也没问。

第二天早上吃了饭去上班，到京西宾馆，总理还没到，我就去看吴涛。吴涛住六楼。吴涛也没讲什么，就说昨天眼睛被打了怎么怎么……一会儿总理就到了。

总理到了以后，陈伯达打电话说，傅崇碧讲已经抓完了，陈伯达说：好，庆祝你们昨晚的胜利。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的司令。来北京上访的有三千多军人，卫戍区出了五千人抓他们。中央布置的，没通知我。

以后总理讲了，昨晚把上访的人都抓了，已经送到高碑店 38 军。高碑店是个小镇，那晚火车都准备好了，我就知道了。总理讲，把人都送到 38 军去了。具体的总理没讲，我也不好问啊。事前他也没通知我，以后我问吴涛，抓人跟你讲了没有？吴涛讲，我昨晚眼睛疼，睡都睡不着，也没跟我讲。

抓了以后总理讲了，我问那几个干部呢？有副政委刘昌、副司令黄厚、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参谋长王良太，都是老同志，他们是老早来上访的，站在保守派一边，一块抓了【阿尔楞注：5月25日路扬和吴涛在军委接见时被打，在场的副总参谋长李天佑和总政副主任徐立清进行制止无效，令中央和中央军委震怒。第二天，5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67）12号文件，即《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决定对黄厚、王良太实行隔离反省，对刘昌、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对来京上访人员宣布禁止外出，准备集中到外地整训。此文件并宣布将内蒙古军区降为省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这些人没送 38 军。

第二天就把郑维山找来，总理指示，北京军区派一个师进驻呼市。派的是驻大同的 69 军 28 师。还有铁道兵 52 团，施工的，三千多人。他们怎么住，总理说海清同志你负责一下。这样我才知道。

我问那几个副司令怎么样？总理说都抓起来了，等你们回去后就把他们送回去。

我就跟军管的电台通电，把通知告诉他们，肖先建（音）副军长【阿尔楞注：肖选进，1964 年少将，时任 69 军副军长】，高锦明在家里，同时把内蒙到北京的两条电话，一条从内蒙直到北京，一条从兰州、西安转北京，把两条电话线都掐了，这是中央掐的。这两

条线都是军队的电话，保守派可以用，造反派也可以用。一方面抓了人，一方面今晚要派部队去，不能让他们知道。

造反派、保守派打电话到北京打不通了，非常着急。我写的电报用电台发的，很容易，他们接到电报，下边的干部就非常高兴了，也非常兴奋。

部队晚上12点钟连夜出发，坐了三列火车先到。一个师一万多人，一列火车只能装两千多人，也就一个团，一个师就要好几列火车。当时我还没回去，我是发电报进行安排的。

【阿尔楞注：此次入城的支左部队人员全部胸前悬挂毛主席正面像（不是像章，是照片），以示区别】

王：一万多人有地方住吗？住过去的营房？

滕：就住市里，呼市里面有很多大楼，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还有什么……大楼多得很，那时都不上课了，保守派把大楼都占了。我就知道这些，你有什么办法？部队去占了，保守派就没办法。

部队进去住下，第二天我们还没到。我们起草了个《十条》，有我、吴涛，包括总理。

【阿尔楞注：总理没有参加起草，也不可能参加起草内蒙古的军区文件，文件是报给了总理和毛泽东】最后毛主席批示：照办。在北京印成大布告，用飞机送到内蒙，全都贴了出去。保守派一看，完蛋了！大局已定。他们看到一是部队入驻，一是毛主席批示：照办。保守派对毛主席那是没二话的，那就散了吧。人是散了，心并没散。

第三天吧，总理怕我回去解决不了问题，派郑维山去坐镇。我们是坐两架飞机回呼市的。那时局面已经稳定了。呼市一平静，整个就平静了。

回去还要抓内蒙军区的几个部长，五、六个吧，这是中央的决定。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吴涛定的。【阿尔楞注：滕的说法矛盾。不是吴涛定的，是中央军委定的，吴涛没有这样的权力】吴涛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的。

上午到的，下午肖应棠副司令在新城宾馆开了个会，抓那几个人。

王：肖应棠是同情保守派的吧？

滕：（笑）是呀！肖应棠看不行了，思想不一定转过来，他得执行命令呀！肖应棠宣布了《十条》，之后，叫那几个部长留下，其他散会。就抓起来、关起来了。

我和郑维山都没出面。之后郑维山就没事了，住了两天就回北京了。

这些人被抓了以后，过了几个月就都放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是思想问题。

（此时医生来给滕海清量血压，服药。）

滕：部队进去后，很快的保守派就散了，组织上都散了，【阿尔楞注：滕海清当时对镇压保守派组织是非常坚决的，下令抓了一些保守组织的头头】思想并没散。散了就没什么事了，就召集造反派头头开了个会，不要搞武斗，就做他们的工作。那造反派呀心急的很，那时候没有成立革委会，有个决定可以成立革委会的筹备小组。造反派就急了，要马上成立筹备小组。我就不同意，现在还没准备好，什么情况不清楚。造反派就沉不住气了，一帮一帮的跑到我那屋里，又吵又闹的。筹备小组也是个权力机构啊！要他们参加嘛，要权嘛，那就闹得不行了。

我就想过一段时间，筹备小组应当有造反派，有保守派，有领导干部。不行，做不通，造反派不同意有保守派。

那时总理直接管我们，就报告总理。

造反派也可以直接给总理打电话，不是总理本人，是总理办公室。

一直吵了好几天，吵到6月10日，成立筹备小组，18个人，我提议吴涛、高锦明当组长。【阿尔楞注：应是副组长】发了个电报给总理。很快，上午发出去，第二天早晨就批复：同意你们成立筹备小组，滕海清当组长，副组长你们自定。

批了，就开个会，我当组长，吴涛、高锦明当副组长。高锦明是乌兰夫时代的常务副书记，【阿尔楞注：应为书记处书记，文革前各地省委没有副书记的设置】满族，北京的大学生，他跟乌兰夫干仗，二十多年。【阿尔楞注：滕在瞎编，如果干仗二十多年，乌兰夫不可能让高当常务书记】打倒乌兰夫，当然不是他的本事，是中央定的。华北局，李雪峰是第一书记，乌兰夫是第二书记，打倒乌兰夫中央不点头是打不倒的。高锦明是打倒乌

兰夫的积极分子，是要取而代之的。【阿尔楞注：滕的说法是完全不懂地方工作，高锦明与乌兰夫地位相差悬殊，不可能取而代之】

王：你当时清楚不清楚？

滕：不明白。他们在前门饭店开会，开了一个多月，【阿尔楞注：前面饭店会议日期是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我们还在军队里，根本不管那个事。乌兰夫是66年5月被打倒的，【阿尔楞注：前面饭店会议期间乌兰夫还没有被打倒。会后的8月16日，中央撤销乌兰夫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和华北局第二书记的职务，并任命解学恭（文革前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为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从未到任）】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没公开。我是67年4月去的内蒙，将近一年之后。我去时内蒙干部，除了站出来的，全部打倒了，打的面太大了。汉族也打了不少，蒙族基本都打倒了。蒙族有一部分没打倒，包括乌兰夫的秘书，【阿尔楞注：指沃宝田，乌兰夫的秘书之一】他站在造反派那边，他反对乌兰夫。在内蒙，凡是反对乌兰夫的都成了造反派。【阿尔楞注：滕的说法不对，内蒙的两派不是以乌兰夫划线的。在当时中央决定打倒乌兰夫的政治形势下，两派都须跟着打倒乌兰夫】

那时候主要问题是造反派中间有矛盾了，分摊不均，那些家伙野心大得很哪，有的进了常委，有的进了核心小组，有的没进，又要干……我知道了，在招待所开了十天会。那些人都是年轻人啊。开了会，很长时间，他们自己坦白了，准备搞武斗。最后他们做检讨。哎，很有效嘛！就稳定下来，造反派稳定下来，保守派就提不出什么问题了。搞联合，主席不是到南方走了一圈，提出要搞大联合嘛。

到了67年的11月、12月间，筹备小组就集合起来了，【阿尔楞注：此处说法不对，滕在前面说筹备小组在6月10日就成立了】那个时候不是到处成立革委会吗？内蒙也要成立革委会。我也思想准备不足，成立革委会是不是早了一点，那时东三盟还没划出去，都没成立革委会，我们成立不好呀！地方干部的同志、筹备小组非要成立革委会不成。那好吧，成立革委会吧。【阿尔楞注：滕又在瞎说，他在此处是想将自己表白成对文革是不积极的，但是实际上，滕是非常积极推进成立革委会的，这也是他的工作任务。筹备小组

就是“革委会筹备小组”，滕是组长，怎么能说成“筹备小组非要成立革委会”？更为奇怪的是，滕在此处提出了东三盟的事情。中央决定将内蒙的东三盟（呼盟、昭盟、哲盟）划归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是1969年7月，两年之后的事情了。滕海清怎么可能在67年就考虑到与东北三省的关系问题？再者，黑龙江省是全国第一个成立革委会的省份（1967年1月），他说的：“都没成立革委会，我们成立不好呀！”，不是睁眼说瞎话吗？事实上，他在成立革委会的事上非常积极的，内蒙古在当时29个省市中是第8个成立革委会的，名列前茅】要求要写一篇文章嘛，写篇文章，中央批准了，我们才能成立。以后组了一个班子写文章，名字叫《巍巍大青山》。写好后，大家讨论通过，我和高锦明两个带着报告到北京来，直接跟总理汇报，成立革委会，什么人当委员等等，都报了。康生也直接管这个事情，主要是总理，康生是顾问，每次开会少不了他。【阿尔楞注：滕故意在这里混淆概念，蒙骗访谈者。康生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不是中央管理地方工作的顾问。按照图们、祝东力著《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书中的记述（p48-49），1967年10月27日下午，康生在钓鱼台召见滕海清和其秘书，谈内蒙的形势。第二天中午，康生在钓鱼台8号楼召见报送成立革委会报告的滕海清和高锦明，告知他们毛和林已批准了报告，同时在场的还有郑维山，两个场合都没有周总理】

王：你和康生直接打过交道吗？

滕：每次都打过交道的。

成立革委会，非要毛主席批准的，毛主席不批准成立不了的。我和高锦明把报告带来，送给总理。总理送给中央，毛主席批了：同意。

康生把我叫到钓鱼台六号楼：“告你好消息，总理报告主席，主席已经批准了。”我说：“总理批的文件让我们带回去吧。”康生讲：“你们成立就是了。”文件不给我们，那要入档案的，不准带。【阿尔楞注：滕海清不懂工作程序。中央对地方报送的文件批准后，会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正式发文，不会将原件发回】。

回去，67年11月11日【阿尔楞注：应为11月1日】成立革委会。革委会一成立，

内蒙不就平稳了吗。接着做下面的工作，包头、赤峰、昭通（盟？）【阿尔楞注：此处疑为访问者听错了，应为昭盟，赤峰即昭盟盟委所在地】相继成立革委会。一个盟一个盟地做工作，把两派都找来，革委会没有保守派不成呀！内蒙的革委会也有保守派，实际是聋子的耳朵——不起作用。【阿尔楞注：滕海清又在胡说，内蒙革委会中根本没有保守派代表】

各地各盟成立革委会。没有保守派参加，说明你们大联合不成功。保守派也是头头，干部，不起作用，权力掌握在造反派手里。

到了春节，我和李树德两个回北京。他原是华北局的，家也在北京。【阿尔楞注：李树德原为华北局财办主任，1966年9月调任内蒙古党委书记处书记】向总理汇报，全省还没完全成立革委会。总理讲：“内蒙的问题总的讲算是基本稳定下来了，这是很大的胜利。内蒙的问题今后要康生来管，我的事情太多。”当时我们对康生的情况也不大了解，我们说凡是中央谁管都可以。从那以后就是康生管了。

那时内蒙解决了，革委会成立了，总理讲：内蒙站出来的干部最多。6个人，5个都是内蒙的，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吴涛，原来都是内蒙的。吴涛是第二把手，副主任，比高锦明高一点。吴涛主要管军队，我管什么呢？那时不是反修正紧张吗？军委在内蒙组织五个师域的防御阵地，国防工程，调了六万多人。我是司令，肖应棠是第一副司令，【阿尔楞注：滕的说法有误，内蒙古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是刘华香】肖应棠在打倒乌兰夫时批判过吴涛，吴涛是蒙族，这样他和吴涛的关系特别紧张，吴涛开会时不指名地骂他。我也跟吴涛做过工作，你不要这样，这个问题在当时那个情况下，乌兰夫是中央发了文件的，定了性，是内蒙最大的走资派，算是敌人啦。当时那种情况人的思想不容易做通的，肖应棠抬不起头来。

内蒙那个地方，草原很复杂呀！从东北算起，边防线有七千公里长，东边沈阳军区管，西边要建五个师域，地形很复杂，平原地区，在哪里守？肖应棠他不敢当家，他那个时候情绪不高，他也害怕负责。每年发上千万、上亿的钱啊！肖应棠就抓住我了，每个工程非

让我去定，我不定，那工程怎么办？我也很着急，内蒙要打起来，我是当司令的，我要负责呀！那时我就跟吴涛讲，军队工作你多管一下，国防工程老肖抓住我不放，我也要负责，不看我也不放心，将来打起仗来怎么办？吴涛讲，你就多抓国防工程，没问题。我俩分了工。

这样很长时间，从67年成立革委会后，一直到69年上半年，差不多大半时间是在外面看阵地。【阿尔楞注：滕的这种说法完全是为自己的错误开脱，69年5月前是打“内人党”的高潮期。作为内蒙革委会和军区的第一把手，不可能大半时间在看阵地。事实上，滕海清一直是内蒙古清理阶级队伍和挖“内人党”的主要领导】看阵地时，家里的工作主要是高锦明负责，【阿尔楞注：事实上，高锦明等人因反对深挖“内人党”之事，从1968年11月至1969年5月被滕海清停职，后在69年5月中央纠正内蒙挖“内人党”扩大化时恢复工作，滕海清在此访谈中只字不提此事】还有其他人，权星垣啊，李质啊，李树德啊，吴涛他们。我也回来，管得少一些是了。这一段时间还比较平稳，还没发生什么大的三（？）问题。

68年3月发生杨余傅事件，4月间，郑维山给我打电话：“这个事件很大，军区党委开常委扩大会，你还是回来一下。”我是常委，不回来，你这个人也太老大了吧。我说好，就回来了。

王：郑维山在电话里告诉你杨余傅事件了吗？

滕：头天晚上，团以上干部到北京开会，林彪讲话，打倒杨余傅，第二天就打电话告诉我了。我回来参加会议，会开得很长，开了一个多月。5月中回去，先到集宁那地方检查工作，蹲了几天，6月10日左右回的呼市。

发生问题是什么时候呢？1968年中央发了个两报一刊社论，后又发了个清理阶级队伍的文件。6月14日，15日，我记不清哪天，核心小组开会【阿尔楞注：中共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于1968年2月13日，滕海清为组长】，就专门讨论搞“内人党”问题。

王：你事先不知道？

滕：以前我不知道，“内人党”我不知道。【阿尔楞注：滕海清此处是撒谎。滕的秘书陈晓庄在回忆中说，“我记得远在68年2月中旬，革委会的专案办公室曾向核心小组作过一次汇报，对内人党从25年起的发展历史作了详细分析”。陈还说，“内人党‘206’案件、统一党问题是67年底就知道了的。”陈还承认，“67年10月乌兰巴干通过内蒙军区原报社的一个科长湖泊交给我两份材料。一份是特古斯的材料，提出特古斯、鲍荫扎布、巴图（内大）等人是四五年‘八一五’后由哈丰阿组织的新内人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还有一份是206案件的那一封信。”又据《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书中说，1968年3月，郭以青（内蒙古革委会常委）就向滕海清汇报过乌兰巴干反映的情况。所以，滕海清称在6月15日之前不知道“内人党”，完全是谎话。

滕的秘书提到的乌兰巴干，“文革”前是作家，“文革”中组织了“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抓“内人党”最积极，主要靠山是滕海清办公室。《康生与“内人党”》书中说，乌兰巴干前后给滕海清办公室先后报送了几十份有关“内人党”的材料，所“发现”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一共有一百多个。此人后来在“内人党”冤案平反时，因捏造“内人党”材料问题，被判刑15年。】

王：刚才护士提醒，时间太长了，今天又谈了两个小时，先谈到这里，正好到“内人党”，下次再接着谈。

滕：好，好，听护士的。

滕：68年6月，核心小组开会，这个会议上提出了“内人党”的问题了。

王：就这个会上提出来的，以前你知道不知道？

滕：以前不知道。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来源呢？1962年中蒙划界之后，有人在内蒙集宁用蒙文向外蒙古大呼拉尔写了一封信【阿尔楞注：信是1963年（不是1962年）2月6日发现的，当时被内蒙古党委和自治区公安厅定名为“206”案件】，我是听他们说的，中蒙划界我们是不赞成的【阿尔楞注：中蒙划界是文革以前的事情，是经过中央批准，不知道为什么滕说

我们不赞成。那封信也没有一句涉及到中蒙划界】，新“内人党”中央委员会向外蒙大呼拉尔写了个报告，我们现在已经发展了有两千多党员，落款是内蒙古新“内人党”中央委员会。【阿尔楞注：此信的落款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委员会”，没有“新”字、也没有“内”字。新“内人党”这个提法是内蒙革委会挖“内人党”时，为了与历史上的“内人党”做区分而设定的名字，那封信根本没有这个提法。】

信是写在一张梅兰芳的招贴画的背面，由内蒙寄到外蒙，被内蒙北边一个叫后旗的检查站检查出来。县的公安机关把信送到内蒙古自治区的公安厅，公安厅一审查，这是个反革命案件，就报告当时的自治区党委，批准破这个案。当反革命案来破。从62年直到68年还没破。68年中央不是提出清理阶级队伍吗，2月间提出来的【阿尔楞注：滕在这里又玩花招！“清理阶级队伍”是1968年5月提出来的，第一次出现在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中，不是1968年2月。滕海清故意将这个时间提前，是为他响应江青的讲话而在内蒙开了大抓阶级敌人的先河的事情，打个“马虎眼”。江青在1967年11月9日和12日两次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讲文艺界的“黑线”问题。《康生与“内人党”》书中说，当时在北京的滕海清得到了一份江青讲话的录音，5天后带回了内蒙。内蒙革委会在11月17日播放了江青的讲话录音，于是内蒙古文艺界的人首先发动了“彻底挖尽乌兰夫在文艺界的残党余孽，肃清乌兰夫在文艺界的流毒的人民战争。”1968年1月6日，滕海清在内蒙古革委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说：“去年11月9日、12日的江青同志讲话下达以后，极大地推动了文艺界的大革命……。把全区的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更加深入的新阶段。”1968年2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康生、江青等人接见汇报工作的滕海清和李树德时说，“我在北京文艺界做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内蒙倒动起来了，……。”，对滕海清提出了表扬。滕海清为了回避这段历史，故意将“清理阶级队伍”的时间提前到2月】这个时候，大概是3月间，我和吴涛到北京军区参加常委扩大会，杨余傅事件。我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常委，没免，在内蒙是军区司令，党委第

一书记。那时内蒙古军区还没归北京军区。头一天吴涛带内蒙军区团以上干部来听林彪那个报告，6月14日，15日，报告就是打倒杨余傅。之后那些人回去，吴涛没回去，就参加这个会了。【阿尔楞注：指北京军区常委扩大会】这个会开了一个多月。之后我去集宁检查工作，6月10日回呼市。

回去后开会传达北京的情况，会上高锦明提出来要破“206案件”，就是内蒙古新“内人党”反革命组织。【阿尔楞注：1968年7月5日至20日，在滕海清主持的内蒙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上，内蒙革委会正式做出了挖“新内人党”的决定。】

内蒙古好几次建过“内人党”，我都搞不清楚，我以前就没有到过内蒙，55年才到石家庄，61年到北京军区，内蒙也不归北京军区管，它是大军区，我也没去过。【阿尔楞注：但挖“内人党”是滕海清主政内蒙古一年多以后的事情，与他以前知道不知道没关系】

（护士来量血压，吃药。）

滕：我们六个人，他们都是原来在内蒙古工作过的，他们介绍，要破这个“206案件”，内容就是新“内人党”。那个时候，说老实话，我脑子里阶级斗争绷得很紧的，又是清理阶级队伍，他们这个反革命案件多少年也没破，先把它破了，他们都同意，当然我也同意了。现在看来如果我不同意，那他们也可能不搞。【阿尔楞注：滕海清根本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題，而是十分积极。前面说过，乌兰巴干搞“内人党”的资料都是首先送交滕办的，滕海清和滕办对挖出“内人党”这个地下组织十分热衷】但是我没那个水平，那个时候，中央叫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内容就包括破反革命案件，你有什么理由不破呢？我也没那个水平。我说那就破吧，问题呢，不要搞得太大了，革委会核心小组不要都去参加这个事情，有一个人负责就成了。【阿尔楞注：滕海清此话完全是撒谎，他从来没有说过“不要搞得太大了”和“革委会核心小组不要都去参加这个事情”的话。事实上，以滕海清为首，核心小组成员和革委会常委全体都参与了挖“内人党”的决策】谁负责呢？革委会会有个政法委员会，管公安这些事情，主任是李树德，山东人，在内蒙工作了很多年，【阿尔楞注：李是1966年9月才到内蒙工作的，滕很清楚。滕本谈话的前面也说过“李树德原

是华北局的、家在北京”，此处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又说李在内蒙工作了很多年】他来负责，组织了个小班子。当时就是这样决定的。

以后呢？好长时间也没研究这个事。以后有人跟我讲，在我没回去开会前，高锦明已经派人秘密审查过这个案件，审查谁个呢？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巴图，蒙古族，还审了一个内蒙医学院的院长莫伦（木伦），其他还审查谁我就知道了，【阿尔楞注：此事是内蒙古大学上报的，不是高锦明布置的（见《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一书，其中有详细描述）。况且，文革时破反革命案件根本也不需秘密进行】审查了什么情况也没跟我讲。他们怀疑这两个人写了这封信，蒙文嘛，大概也没审查出来什么。【阿尔楞注：这个说法更是莫名其妙！内蒙古的任何一个部门对解读蒙文都毫无问题】

一直到68年7月底，8月初吧，我们开了个革委会第四次全会，不是搞“内人党”的，是抓生产的会议。【阿尔楞注：滕海清此处又撒了一个大谎！这与滕前面提到传达杨余傅事件的会议是一个会议，应为第三次全委（扩大）会，1968年7月5日至20日，由滕海清主持。正是在此次会议上，内蒙革委会正式决定开始挖“内人党”。此会通过了两个文件：《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的处理意见》，这是内蒙革委会吹响挖“内人党”号角的会议，哪里是抓生产的会议？】在那个会议上，管抓“内人党”的李树德作了个报告。【阿尔楞注：李树德的报告是对挖“内人党”那两个文件的解释，这是会议的主题】对这个报告没研究，一是不了解，二是不感兴趣，三是有人管，我们管它干什么。【阿尔楞注：会议由滕海清主持，议程、文件和报告内容全部经过第一把手滕海清审查和批准的，滕海清居然说没研究、不了解、不感兴趣，管它干什么？完全在撒谎！没有这次会议，就没有内蒙古挖“内人党”的运动，这个历史事实是无法回避的】

他做了那个报告后，我说你的报告送中央，而且发到开会的盟、市负责人。【阿尔楞注：既然滕说对此报告不感兴趣，那为什么既要求上报中央，又要求下发到盟市呢？事实上，会议按照滕的指示，将《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上报了中央，并

以内革发（351）文件印发到全自治区，正式启动了挖“内人党”的运动】中央没有答复。

【阿尔楞注：滕海清对中央没有回答很着急，十几天后，滕海清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康生，请康生提供关于内蒙敌情的材料，想表现自己。康生对滕给他个人写信很不高兴，没有回信。在筹备十月阅兵的一次会议上，康生当面批评滕给他个人写信的事，江青也批评滕不懂党内工作原则。连林彪也插话了，林彪说滕海清是：“集体观念薄弱，个人观念强烈”】什么时候记不清了，李树德、吴涛他们到北京来，当面向康生报告了。康生讲：“你们内蒙的领导同志脑子里面无敌情，我讲过多次，你们内蒙敌情多得很，有日本的特务，有伪满洲国的特务，有蒙修的特务，有苏修的特务，有国民党的特务，还有傅作义的坏人，内蒙里面还有乌兰夫的坏人。”这么一讲，内蒙还有什么好人呢！（笑）康生这么讲，不是光跟我一个人讲的，【阿尔楞注：前面说是对李树德、吴涛讲的，现在说是对他讲的】，跟其他人也都讲过，还传达过的。“内人党”他没讲。康生还说：“现在你们提出这样一个反革命的组织，那还要报告什么中央呢？你们为什么不搞呢？”【阿尔楞注：康生说的“提出这样一个反革命的组织”，就是指“内人党”，滕却说，“内人党”康生没有讲，自相矛盾】。意思是你们不用报告中央，你们搞就是了。“有多少抓多少，越多越好，开始可能快点，没关系，以后可以清查嘛。”

他们回去后在核心小组会讲了这个问题，也不是专门讲这个问题。

康生虽只讲了这几句话，这几句话可很关劲呀！他那时是什么人呢？他是中央的第四号人物呀。【阿尔楞注：当时党内的第四号人物应是陈伯达】他有权呢。这样我们革委会，李树德那个报告送到中央了，中央虽没有文字批复，康生口头答复了。

虽然这样，还没动，还没挖，就是组织个小机构。【阿尔楞注：完全是胡说！第三次全会后，全自治区基本上都开始挖“内人党”，并且出现了刑讯逼供、致死致残的恶性事件，这才引出了当年9月份内蒙革委会领导之间对挖“内人党”的分歧。

《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一书介绍（p147），1968年9月13日，在滕海清主持的内蒙古革委会常委会议上，讨论了挖“新内人党”出现的严重问题，需要立即刹车，滕也

表示同意。后滕去北京开会，常委们意见趋于一致，决定挖“新内人党”的工作刹车，转入斗批改的整党阶段。9月25日，在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高锦明代表常委会讲话，讲了停止“挖肃”（清理阶级队伍），并说“再挖就挖塌了，再挖就挖到自己人头上了”、“就是真正的反动路线了”。滕海清在北京参加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时（此会通过了刘少奇的处理决议），滕海清觉得内蒙有些右倾了，没紧跟党中央，认为在内蒙还是要继续深挖“内人党”。全会尚未结束，他就急召滕办主任李德臣进京，推翻了自己同意“挖肃”刹车的态度。10月30日，李德臣返回内蒙古，在已经开始的整建党会议上，传达了滕（海清）、吴（涛）首长10月23日和25日对内蒙工作的指示，提出内蒙的工作要反右。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滕海清返回内蒙，于11月3日主持召开了内蒙革委会直属机关干部会议，传达十二中全会精神和对刘少奇的处理，并在讲话狠批内蒙工作出现了右倾，并当场宣布停止高锦明的工作。会后，布置了全内蒙反右倾的工作，也停止了锡盟革委会主任高万宝扎布等人的工作，开始抓大小高锦明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滕海清用党内路线斗争的办法，压制了不同意见，将挖“内人党”运动推向了高潮。《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一书说：“内蒙的人都知道，正是从扳到高锦明之后，挖‘内人党’的运动才突然进入了高潮”】。

到什么时候呢？到68年12月间。我们11月间到中央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十二中全会两个问题，一个批判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二是研究九大筹备问题。走时九大各省的名单已分下来，条件也分下来。我们回去就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传达以后，12月我就回北京了，干什么呢？那时过年了嘛。那时李树德在家，他就用政法委员会的名义发了一个对新“内人党”的限期登记的公告。那个公告一发糟糕了，限期登记呀，你登记了没事，不登，以后抓到了就难办了。是指新“内人党”，不是历史上的“内人党”。谁去登呢？一个人也没有。

李树德当时没有估计到派性，两派表面上解决了，实际上没解决。你的人少，我的人多，你就可以乘机抓我的“内人党”。派性和这个东西搅在一起了。这样，汉人，他

是什么“内人党”，一些汉人也弄进去了。【阿尔楞注：滕海清在此次访谈中，前后几次用派性问题来解释挖“内人党”，完全是在掩盖自己推行极左政策的本质】

这事坏在什么地方呢？通告也没经过核心小组讨论，【阿尔楞注：滕海清又在撒谎。这个公告是经过常委会和滕海清批准的】就用政法委员会的名义发了。发下去以后就发生逼供信。【阿尔楞注：逼供信从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就有了，不是通告之后才有的。滕这样说，将逼供信的责任都推给了李树德】那里面大派整小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坏人钻进去了，浑水摸鱼了，搞了一些好人。【阿尔楞注：滕海清还是不承认挖“内人党”的错误。全区受害者达34万人之多的冤案，能这么说成“浑水摸鱼了，搞了一些好人”吗？】

实际上新“内人党”到底有没有？有多少？那封信讲了有两千多党员【阿尔楞注：指“206”案件的那封信】。到底什么人写的也没搞清楚。那时脑子里以阶级斗争为纲啊，绷得很紧，公安厅一听这是个反革命事件啊！62年乌兰夫是管事的，都没破案。

挖“内人党”，我的问题错在什么地方？我要不同意他们挖，就没事了。【阿尔楞注：滕海清此话太可笑了！他是最想挖“内人党”的，最想挖“内人党”来立功的，并且在中央批评内蒙挖“内人党”扩大化错误后，他是抵触情绪最大的内蒙领导】

王：你当时有这么大的力量吗？你不同意他们就不搞了？

滕：那时我没那个力量，清理阶级队伍就包括汉奸、特务什么的，他们破了几年没破了，清理阶级队伍，可以理解他们想破了。

我没那个水平，没考虑到文化大革命派性的严重，【阿尔楞注：又拿派性说事，这只与极左政策有关，与派性无关】。同意他们这么搞。我要负责任就负领导责任。

他们报了中央了，【阿尔楞注：不是“他们报了中央”，滕在前面自己说过，是他本人要求报中央的】中央没有文字批示，但康生是讲了话的。他们都知道。

68年12月间，69年1月间，2月间，3月间，三个多月的时间吧，就发现逼供信。【阿尔楞注：挖“内人党”的逼供信和严刑拷打，远早于这个时间，只是在这三个月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军队里也搞逼供信，内蒙的骑兵5师。吴涛分管军队，派了一个工作组，由

副司令 XXX 带队，到骑 5 师蹲点，在骑 5 师搞出“内人党”来了。吴涛就把这个事向革委会汇报，认为他搞出成绩来了。【阿尔楞注：骑 5 师挖“内人党”与吴涛无关，是骑五师师长武尚志挖的。据《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书中介绍，滕海清本人非常重视军区挖“内人党”的工作，并将军区政治部作为他挖“内人党”的实验田，其本人曾专门听取政治部挖“内人党”的经验，并指示内蒙军区党委印发了 1969 第 20 号文件，向各部队推广此经验。】

问题还是李树德那个公告出去以后，开始逼供信。逼供信并不全是内蒙啊！【阿尔楞注：对，逼供信全国都有，但滕海清在内蒙古搞的“内人党”冤案，是全国集团冤案的人数最多的，达 34 万 6 千多人，而当时内蒙的中共党员总人数才 28 万，还没有挖出的“内人党”人数多。当年滕海清在一次会议中遇到江西革委会主任程世清，程说江西清队挖了 40 多万，滕还认为内蒙落后了】

67 年 1 月毛主席号召夺权，一夺权呢，那牧区的牧主、王爷、喇嘛都还保存着呢，乌兰夫要保存这些人，中央给他定罪，这是一条啊。穷苦牧民，一听中央要夺权，谁也管不了他。还有上海来的大学生，下放的一部分学生，在学生的领导下，在贫下中牧的发动下，杀掉了一部分王爷、喇嘛，过去压迫他们的富牧。到底杀掉多少搞不清楚。67 年夺权时杀的，他并不报告你呀。那时革委会还没成立。

67 年到底死了多少搞不清楚。革委会成立以后，我们派了一个工作组到锡盟调查了一下，回来报告，相当一部分富牧、喇嘛、王爷被杀了，但到底多少不清楚。他杀人的人并不报告你。逼供信那个东西，以后内蒙的阵线乱了，搞不清楚了。【阿尔楞注：这哪里像主管一省工作的高级干部讲的话？】

到 1969 年 3 月，九大开预备会，【阿尔楞注：3 月 9 日至 27 日】我、李树德、吴涛到中央来了。走之前，听北京军区张南生的报告反应，革委会常委之间有些反应，就发了个电报，把挖“内人党”停止下来，不能搞了。在内蒙发的，发了之后才到北京来的。发给底下的，那个电报起没起作用那很难讲。那个派性，他不一定听你的。【阿尔楞注：滕

海清又在这里隐瞒真相，张南生是在北京与他谈的话，不是在他赴京之前，赴京之前还发什么电报？张南生介入此事的缘由是：滕海清在八届十二中全会（1968年11月）后，掀起了挖“内人党”的高潮，内蒙古军区很多受到迫害的干部和战士向上级单位北京军区发出申述信和求救信。北京军区党委感到事态严重，于12月委派军区副政委张南生和干部部部长曹振东组成的调查小组到内蒙古军区进行实地调查。经过20多天的调查，小组认为：内蒙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打击面已经宽了，发生了“左”的倾向，正式向北京军区党委写了报告。这是张南生报告的由来。小组的正副组长张南生和曹振东曾亲自到滕海清在北京的家中向他当面谈了报告内容，但滕海清表示不能接受这个调查结论，认为是运动中的支流。《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书中说，滕海清在此后还几次打电话和捎信给内蒙，认为北京军区党委的决定是右倾的表现。在张南生报告之后的1969年1月17日，内蒙革委会又发出《关于当前清理阶级队伍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错误地要求必须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把清理阶级队伍抓紧抓紧再抓紧，只是将主要目标改成了打击“内人党”首要分子】

开九大预备会，我、吴涛、李树德，还带了核心小组办公室组长李德臣，他是我带去的，原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阿尔楞注：“带去”是指带到内蒙工作，任滕海清办公室主任。李在离休前曾任北京军区军训部部长】。我们在那就写了个报告，我们内蒙犯了路线错误，搞了逼供信。【阿尔楞注：滕海清这里承认在九大预备会议期间就写了检查，为什么写检查呢？一个事实是，九大预备会的第一天，康生就向滕海清和吴涛打了招呼，说内蒙清队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错误。另一个事实是，在九大预备会期间，周恩来曾委托谢富治和温玉成召见滕海清，谈了内蒙清队扩大化的错误。这是滕海清写检查的由来。】

逼供信不光挖“内人党”，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都有逼供信。清理阶级队伍，地富反坏右都包括在里面。搞“内人党”少数坏人乘机浑水摸鱼，一部分人夺权，小派夺大派的权，发现问题，不就扩大化了嘛。【阿尔楞注：滕海清此处的说法有三大错误：1、清理阶级队伍都有逼供信，挖“内人党”有逼供信也就不足为奇了；2、搞“内人党”没错，但被少数

坏人乘机浑水摸鱼了；3、扩大化是派性斗争，小派夺大派的权而造成的。对于自己所犯的极左错误，毫无反思。】

王：什么时候定的扩大化？

滕：扩大化是总理给定的，【阿尔楞注：扩大化不是总理定的，是毛泽东的批示，不知道滕海清为什么这么说。在内蒙挖“内人党”事情上，中央领导中是周恩来首先发现问题的，其中包括他在内蒙古插队的侄女周秉建写信所反映的情况。周秉建写信一事，广为流传，此处不赘。】这是九大以后了。九大没提这个事，【阿尔楞注：前面滕还说九大预备会就写了检查，此处又说九大没提这个事，如何自圆其说？况且，滕在访谈的后面说，九大开会的第三天，康生到内蒙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已经扩大化了”，怎么能说扩大化是总理给定的，怎么能说是九大没提、九大以后才提的呢？】我们来了，家里都很平静，虽然有一些逼供信，我们发了电报后还是起了一些作用。【阿尔楞注：当时内蒙古正是挖“内人党”的顶峰，不是“虽然有些逼供信”，受害群众向中央写信告状或上访的很多，一点儿也不平静，滕海清又在撒谎。受到中央批评后，1969年3月17日，滕、吴才发电报给内蒙古，着重谈了对“内人党”要区别对待和政策问题。3月21日，滕、吴联名给内蒙古去信，强调挖“内人党”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不再搞揭发登记了”。这都是受到中央批评后，滕海清、吴涛所做的改正措施。】

什么时候发现严重问题、不安定了、内蒙乱了起来了？4月20日左右，九大选举候选人名单，我们内蒙九大代表18个人，选代表名单送上去了【阿尔楞注：九大在4月1日就正式召开了，怎么会在4月20日送选代表名单？】，候选嘛，我们的意见嘛。20日，十点左右，康生给我打来电话：“我问你，为什么高锦明不能当九大代表？”我说：“我当面问过你，你说不能当。另外我们九大筹备小组向中央有报告，中央通知高锦明不当九大代表。这些事你都知道的嘛！”他说：“我不相信，谢富治讲高锦明很好的。”我说：“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们，既然很好嘛，你早告诉我们，我们就……”他就发脾气了：“你骄傲了！你听不进中央的话！”说完电话就放下了。从这个时候就乱起来了。【阿尔楞注：滕

海清的这段话看似平常，与他下面将内蒙是如何乱起来的话，是经过深思熟虑、苦心编织的谎话。内蒙古乱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几十万人受挖“内人党”的迫害、1万多人冤死而造成的，与谁当九大代表毫无关系。】

王：高锦明为什么没当上九大代表？

滕：我现在给你讲，高锦明是满族，辽宁人，在北京上大学，早入党了，芦（卢）沟桥事变后在北京蹲不住了，他就带着党的文件往南跑。当然不是他一个人。跑到济南，被国民党特务抓住了，把他关了几个月，又出来了，没做结论。【阿尔楞注：高在1936年9月就被调到西安做地下工作了，不存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在北京蹲不住、带着文件往南跑的事情。高在济南被捕也没关几个月，十几天后即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事后，周恩来代表北方局给予高锦明以党内“口头警告”的处分（原因是在同一个地点连续几天开会而遭被捕，违反了党内秘密工作的原则），并将高调至北方局军委工作，不存在没有结论的事情。】

就这个事情，成立革委会的时候，我和吴涛两个到中央来请示，革委会的人选问题怎么怎么，哪个选，哪个不选。康生知道高锦明这个问题，他说你们两个到组织部去看看你们那些干部的档案。他就批了个条子，我们就去组织部看档案。一看档案，高锦明确实有这个事情，就是关了几个月放出来，没结论，出来时也没写什么。不是只看高锦明一个人，干部都要看。【阿尔楞注：既然那时候就知道高锦明有历史问题，为什么还要让他当革委会副主任？】

回来后就向康生汇报了，同时还有一个人，叫特古斯，蒙族人，那个人加入了复兴社，也是造反派，也是干部。两个人都向康生汇报了。特古斯那个人加入复兴社，我们认为不能当常委，康生同意了。【阿尔楞注：滕海清又在胡编！特古斯是1924年生人，复兴社是1938年取消的，那年特古斯才14岁，怎么可能成为复兴社这种谍报机构的成员呢？特古斯在文革初期被打倒，成为革委会委员后又被打倒，被打成“内人党”首要分子，但从未有人提过特古斯有“复兴社”的历史问题，此类问题在文革中是不会被放过的。再者，如

果特古斯有加入过“复兴社”的历史问题，怎么会当了革委会委员的？滕海清是怎么审查的？事实上，在内蒙报送革委会常委的名单中，根本没有特古斯的名字。进常委的“三结合”老干部要求是原来的自治区党委常委，而特古斯以前不是常委。但是，滕海清这样编假话是有缘由的。江青表扬内蒙古文艺界在她讲话后动起来了，指的就是乌兰巴干带头揪出了内蒙古革委会委员、文教组组长的特古斯，而乌兰巴干的后台就是滕办。后来特古斯被打成“内人党”首要分子，滕海清这样胡编，就是想尽管特古斯这类人打成“内人党”不对，但还是有历史问题的，搞他没有错。】高锦明没有结论，乌兰夫时就是常务书记，他现又是造反派，革委会不选他不行，所以高锦明是革委会常务副主任。

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分配名额，九大代表的条件什么政治清白呀，什么思想……那一套要求。看了这个东西以后，我和吴涛就找了康生，在京西宾馆六楼会议室，散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散会了，问了一下康生，高锦明那样的人能不能当九大代表。康生讲：“你按照中央规定的九大代表的条件办，我看高锦明是不能当九大代表的。”那时还没有什么扩大化这个事情呢。

之后成立九大筹备小组，吴涛当组长。每一个人的历史都要经过考查的。我告诉吴涛，18个代表，每个人都不要做结论，要把高锦明在济南被捕、出来后没有结论写上，清白不清白，不要讲这个事情，中央会审查的。

那个时候吴涛发了个电报，中央没有文字答复，九大筹备组电话告诉了一下，叫高锦明不要当九大代表。这样高锦明就没有当上九大代表。【阿尔楞注：滕海清又在胡编。内蒙成立九大筹备组是1968年12月，但高锦明已于1968年11月3日被滕海清停职了。况且按照滕海清前面的说法，康生已经明确高锦明不能当九大代表了，所以内蒙向中央九大筹备组报送的18名代表中，根本没有高锦明的名字。所谓九大筹备组的电话回答，是滕海清在胡编。】

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当然就没有他了。送上去以后，谢富治看见了。抗战时高锦明在谢富治那个部队当独立团的政委，后高锦明到地方工作，他们关系很好。

康生讲：“谢富治讲高锦明是很好的。”那个名单是谢富治提出意见。【阿尔楞注：滕海清又在撒谎。高锦明不是九大代表，自然不会成为中央委员候选人，谢富治不至于连这个都不懂，谢富治主动提意见的事情，完全是滕瞎编的（况且谢富治也不负责九大华北组的工作）。康生确实与滕有过这段对话，是在毛泽东批评内蒙扩大化后，中央知道高锦明被滕海清停职后，康生确实问过滕海清“高锦明为什么不能当九大代表？”并说过，“我问过谢富治同志，高锦明是个很好的同志。”可见，不是谢提出的，而是康生问的谢。】

那晚接到电话，我马上找吴涛、刘（李）树德讲：“怎么办？他发脾气了，讲我骄傲了，听不进中央的话。这个事讲得很严重啊！怎么办呢？”高锦明在内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人物，选九大代表时就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为什么没选高锦明，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连夜我就把这个情况传达下去，我们代表就住在京西宾馆的几个房间里，九大代表说那不行，事先请示过，正式文字也请示过，答复不能当代表，为什么现在又提出这个问题呢？那不行，还得按原来的。代表们不同意，没办法。以后我们没向康生反映，最后定的名单还是没有高锦明，他不是代表就没他。【阿尔楞注：滕海清又在混淆时空和瞎编。康生问话时，已经是九大会议后期了，不可能再补代表了。况且，某人是否能当代表，并不是由其他代表决定的，不存在其他代表同意与否的问题】

从这点就得罪了康生，当然谢富治也不高兴。（笑）复杂就复杂在这儿了。他妈的！

提的名单上没有，第三天康生就到我们代表团来了，很严肃地说：“今天，我告诉你们一下子，毛主席讲，你们内蒙扩大化了。”就讲了这么一句就走了。【阿尔楞注：滕海清又在搅乱时空，颠倒事实经过。按照滕自己的说法，康生是4月20日就中央委员候补名单的事情给滕打的电话，如果是此事后的第三天，即4月23日康生来内蒙组传达毛的批评，完全是胡说（九大在24日就闭幕了）。实际上，康生是在4月13日以九大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内蒙组的小组会议，并传达了毛的批评，不是讲了一句就走了，谁敢这样传达毛的指示呢？内蒙古九大代表高树华在他的书中（《内蒙文革风雷》）对康生来内蒙组讲话的情形，有详细的描述，抄录如下：

“那天，康生进小组后坐在我身边，边讲边吸一种包装平常的熊猫烟……。康生讲到文革和挖内人党时，说内人党问题扩大化了，必须接受教训，做好收尾工作。

滕海清在小组会上对一意孤行做了检查，吴涛、李树德也相继检查……。代表们对挖肃、挖内人党的情况深有体会，纷纷利用‘九大’，批判滕海清的严重错误”。】

王：是不是第一次讲扩大化了？

滕：我们给中央的检讨报告，是逼供信，还没这个词。【阿尔楞注：滕海清在撒谎！康生传达毛泽东的批评中，毛就是用的“扩大化”这个词。传达后，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人代表内蒙革委会给中央写了份检查，题目是《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同志的检查》，开头是这样的：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扩大化的错误，……”

此检讨写了五个方面的错误，第一个错误的原文是：

“一、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在挖‘内人党’的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当年的文件犹在，滕海清却对来访者说，检讨报告是逼供信不是扩大化，真是弥天大谎！】。

怎么传达呢？毛主席的东西马上就要传达呀！我们几个人研究，我说光这一句话，回去怎么传达？

高锦明在家主持工作，【阿尔楞注：高锦明在九大期间还没有恢复工作，滕海清又在撒谎！滕、吴、李在九大写的检查（4月19日）中说：“四、在全区范围内错误地批判高锦明，并停止他的工作”。】他本来就对没当上代表不满意。康生直接和高锦明通了电话，【阿尔楞注：当时内蒙古的主要领导都在北京，康生为什么要打电话到内蒙找高锦明？】一通以后，高锦明就找了个造反派头头郝广德，他们研究以后，内蒙就乱了起来，下面就上访啦。

我们还没传达，高锦明怎么知道了，当然是康生传达的。【阿尔楞注：“当然”一词

用的就显然是在瞎编。从党内工作常识上讲，像高锦明这样被停职的人，根本没有接触红机子（中央专线）的条件。事实上，为解决内蒙扩大化的问题，1969年5月，中央将内蒙党政军的负责人召到北京，并点名让被停职的高锦明也来了。5月13日和16日，中央领导在京西宾馆两次接见了他们。会上，周恩来批评滕海清：“你是老同志、老红军，咱们以前在苏区打改组派，在鄂豫皖打AB团，你怎么不接受教训呢？”（滕参加过打改组派和打AB团，周恩来没有直接说出）。周恩来又问滕海清：“你把高锦明同志停职，向中央报告了吗？同级干部怎么能停职？经过中央的批准吗？”

周恩来又对高锦明说：“你发不了电报，为什么不写封信反映情况？”可见，周恩来知道，被停职的人是无法给中央通话和发电报的。高锦明被停职后，曾有过向中央写信的念头，但滕办主任李德臣说，滕吴首长刚从北京八届十二中全会回来，能不经中央同意？可谁都没有想到，滕海清办事是不懂也不顾党内工作原则的。

此外，康生在此次会上，批评了对滕海清后，对高锦明说：“高锦明同志，我原来就感觉你有点右”。但周恩来接着说：“滕海清同志，如果你听了高锦明同志的话，犯的错误可能小小一些。”可见，康生当时的态度时还是袒护滕海清的。

中央对滕海清的批评传回内蒙后，滕被内蒙群众形象地称为“左滕中将”】。

我们在北京就听到内蒙有人上访了，就开始乱起来。【阿尔楞注：“内人党”受害者到呼市和北京上访，在68年底就开多起来了，这不是“乱”，是伸冤。】

我们代表团回去，呼市车站上访的人都满了。晚上就不行了，上访的人就来了，围攻。是高锦明通过郝广德内蒙古师范学院造反派头头，通过他联络，上访的。【阿尔楞注：胡说，九大代表团会呼市是4月底，中央还没有正式下文件说内蒙古扩大化了，谁敢围攻滕海清？高锦明也在停职，哪里还敢发动围攻。】

回去后无法工作，九大无法传达，5月1日，2日，3日4日，5日，不能传达就报告了中央。【阿尔楞注：九大会议是照常传达了，但上访人数过多，内蒙只好报告中央。】5日总理打电话，叫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离职，四个人到中央汇报。【阿尔楞注：滕又

在玩花招，在此处使用了“离职”一词。既然是到中央汇报工作，总理怎么会让这四个人“离职”呢？“离职”意味着出问题了，这是滕海清故意混淆事实的说法。他没有说出名字的第四个人应该是李质（内蒙革委会常委）。当时，高锦明处于被滕海清停职的状态，权星垣、李质也因为不同意深挖“内人党”而基本处于靠边站的状态。滕说周恩来将此四人“离职”，完全是为自己开脱，好像这四个人要为扩大化负责。

九届一中全会（4月28日）上，中央决定纠正内蒙清队扩大化的问题，后于5月5日通知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和内蒙古军区常委到京开会（作为中央委员的滕海清、吴涛已在京）。5月7日，革委会常委权星垣、李质和军区副司令员刘华香、肖应棠，副政委王弼臣、参谋长宋中和、政治部主任郭云昆到京。5月8日，通知被停职的高锦明到京参会。根本也通知权星垣、李树德、李质“离职”一事。中央关于纠正内蒙扩大化问题的会议从5月13日开始到5月19日结束，滕海清全程参加了】。5月14日（13日）汇报的，他们有点害怕，在中央面前作了检查，扩大化情节比较严重【阿尔楞注：“他们有点害怕”，更说明滕在蒙蔽访谈者，意思是别人要对扩大化负责，没有他的事情。5月13日的会议上，内蒙有的领导接受了中央的批评，做了口头检查。但滕海清想不通，一言不发。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对吴涛、高锦明、权星垣等人交代：“你们要帮助帮助他”（指滕海清）。】滕海清同志对情况不了解，我们多负责，中央指示后，我们回去好好工作。总理讲了话，讲我们党里面犯过若干次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中央从来把这个问题作为工作问题，没有提到路线问题上。造反派反映滕海清在内蒙犯了路线错误，这是造反派的看法，总理知道这个情况，总理跟他们四个人讲话讲到这个问题，【阿尔楞注：滕海清又在胡说，总理从来没有单独接见过这四个人】是工作错误，历史上肃反，改组派……中央从来没把它上升到路线错误，是工作上的问题。【阿尔楞注：总理说不要上升的路线错误，不是在此次会议上讲的。此话是针对滕海清后来做书面检查时，给自己上纲上线，称“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周恩来说中央没有讲是路线错误，你不要上升到路线错误。】

讲了这个问题后，他们四个人表现还是不错的，当天晚上秘书打电话说他们检讨很好，

总理也很高兴。【阿尔楞注：这也太可笑了，滕海清自己参加了5月13日的接见，还要秘书打电话吗？谎话太多了！】问题复杂在什么地方呢？康生在背后搞一套。【阿尔楞注：康生在背后搞的一套是什么？】他们来的四个人住八大处，北京军区，他们15日晚上检查的，检查不错。【阿尔楞注：应该是16日，并且是滕海清本人首先做的检查，然后是吴涛、李树德做的检查。所谓的那四个人中，其余三人，高锦明、权星垣、李质根本没有做检查发言，只是表态支持中央决定。滕海清也太能瞎编了！】16日下午郑维山请他们吃饭，【阿尔楞注：郑维山从来没有请这四个人吃过饭，这四个人也不是一派。高锦明、权星垣、李质是反对滕海清的，李树德是支持滕海清的。无论从组织关系上和派别观点上，郑维山都不可能请这四个人吃饭】郑维山讲：“你们几个同志昨天晚上表示很好，你们承担责任，当然是很好的，我很担心你们承担得了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我看滕海清是犯了路线错误。”郑维山也参加了昨晚的接见，中央接见都是集体的，叫碰头会。【阿尔楞注：滕海清瞎讲。“碰头会”是当时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开会或共同开会时产生的一个名词和会议形式，用于对一些议题交换意见。中央领导接见下级，不能叫“碰头会”。从5月13日到19日，中央解决内蒙扩大化的会议是正式工作会议，不是交换意见的会议。滕海清这里偷换概念，想降低内蒙清队扩大化问题的严重性。】

他这样一讲，这就了不得了。他们很敏感呀，就要求总理再接见一次。郑维山报告了总理，总理说那好，再接见一次。就把我和吴涛叫来。我和吴涛16日来的，坐在飞机上我就想，15日晚上接见的，不错，今又接见，什么意思？【阿尔楞注：滕海清这个谎话编得太大了！前面说过，滕海清和吴涛作为内蒙古党政军的一、二把手，全程参加了从5月13日到5月19日的中央纠正内蒙清队扩大化的会议，根本不是5月16日才开始参会的，这都是有档案记录和文件的，滕海清这样蒙骗访谈者也过于简单了】吴涛也搞不清楚。一到那里，郑维山的暗示已经传起来了。【阿尔楞注：更是瞎编，郑也不是中央领导，暗示或明示都不起作用。滕海清说他和吴涛是16日来京的，而郑维山是16日晚饭请所谓四个人吃的饭。如果“一到那里，郑维山的暗示已经传起来了”，那么应该是吃晚饭在前，也就

是说，滕、吴是16日夜里坐飞机来的，当时根本不可能夜航。实际上，滕海清是5月13日至19日全程参加了中央的会议，说16日到北京是谎话！】

5月16日晚上中央再次接见【阿尔楞注：中央领导接见是5月13日和16日，没有滕海清说的15日接见一事，】。办事组组长李德臣首先发言，意思就是挖“内人党”、搞那些东西，他们核心小组根本就不同意，【阿尔楞注：滕海清是核心小组组长，哪里有“他们核心小组”？况且，李德臣只是办事组组长，不可能代表核心小组说话。】是我独断专行，听不进他们的意见，讲了很多事情。他是我带来的人，又是办事组组长，他这么一讲，总理很相信啊！以后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发言，说我独断专行，他们怎样怎样……

王：你感觉很突然吧？

滕：当然突然。事先挖“内人党”、逼供信的错误我是知道的，不知道他们把一切问题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我当时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这集体领导这个事，怎么推到我一个人身上呢？组长是我带去的，又是北京军区的，他一讲，总理当然相信了。【阿尔楞注：按滕的这个说法，周恩来的水平也太低了吧？】

他们都讲了，我说我也讲一讲吧。康生不叫我讲。这次除总理外，康生、陈伯达、郑维山都在。我要讲，康生说：“你，海清同志，你要按毛主席教导，好话坏话要让人家讲完。”那意思就是不让我讲啊！让人家讲完嘛！他们讲了好几个钟头，8点开始的，都到12点了。

几次我说你们都讲了，不准我讲一讲吗？康生说：“哎呀，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啊！好话坏话，毛主席讲了，天塌不下来嘛，听听人家讲嘛！”

问题就是，难就难在这个地方。让我当面讲，我会讲清楚的，什么什么我独断专行，你们都不同意啊，我可把这经过讲清楚嘛！【阿尔楞注：前面已经说过，滕海清在5月13日的会上想不通，一言不发，不存在任何人阻止他发言的事情，所以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对吴涛等人说，要帮助滕】

王：你始终没讲？

滕：我始终没讲。【阿尔楞注：滕海清又在说谎和玩弄时空混淆的手法。5月13日，滕没有发言，但在5月16日的会议上，滕海清首先带头做了口头检讨，并且事后滕海清还以个人名义给周恩来写了一份书面检查】总理最后讲：“李德臣，你讲得不错嘛。”表扬了他。

王：总理对你的态度呢？

滕：他这一讲，总理有点怀疑了。如果让我讲，我会把问题讲清楚。我的办公室主任那样讲就很有说服力了。

王：这个会最后怎么办呢？

滕：17日我们自己开会了，你怎么讲得清楚呢？总理来了几次，说你们代中央写个东西。

王：你还没讲清楚，怎么写呢？

滕：是核心小组起草的，那就不讲什么道理了，就是扩大化追究责任的问题。写这个东西总理没让康生参加。【阿尔楞注：“这个东西”指的是中央会议后，5月19日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给中央写的报告，名称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这是内蒙核心小组写报告，当然不需要康生参加，不是总理没让康生参加。滕的这个说法，不知是什么用意。】最后结论，内蒙古肃反（？）扩大化了【阿尔楞注：内蒙清队扩大化，是毛泽东和中央的结论，不是内蒙古核心小组的结论，也不是这个时候做出的结论，是一个多月前九大期间中央就做出的结论】，滕海清负主要责任，核心小组其他人都要负责任。当然还写了以后回去如何落实政策等等。文件叫中发24号文件，69年。毛主席5月22日批示：照办。【阿尔楞注：中发（69）24号文件是毛主席批准转发上面提到的5月19日内蒙核心小组写的报告。此报告开始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和十六日中央找我们来，对内蒙当前形势做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报告下面的第一署名人就是滕海清，说得很清楚，5月13日中央找我们来，滕海清说他是5月16日才到北京，并且来干什么也不知道，又是弥天大谎！

此报告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按照惯例，说内蒙古的文革的大好形势是运动的主流和本质，并且说“滕海清同志从一九六七年四月到内蒙后，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了大量工作，是立了新功的。”然后，检讨了清队中的扩大化错误，内容基本上还是4月中旬《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同志的检查》的内容。第二部分提出了纠正前一段扩大化错误的工作方针。第三部分是一些表决心的话。】

王：16日晚上还发生了什么事？总理跟你说话没有？

滕：总理没跟我说话。到12点就散会了。我没讲【阿尔楞注：5月13日会上，滕不认错，未发言。5月16日的会上。滕海清带头做了检查的，有会议记录。“我没讲”是胡说】，以后就没有接见了。不叫你讲呀！【阿尔楞注：会议在16日结束了，滕海清也做了检查，当然以后就没有接见了，怎么说成不叫讲呢？】

16日晚的会是在人大大会堂开的，都坐在沙发上，没按次序。那晚郑维山啊，黄永胜啊，吴法宪啊，军委办事组的都参加了。也不叫什么会议，就叫碰头会，【阿尔楞注：上面滕海清牵头写的报告中，说是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的会议，现在滕又说不是叫什么会议，是碰头会。内蒙的省级领导，怎么可能与周恩来、康生等中央常委开碰头会呢？此处，滕故意不提周、康等人，而只说郑维山等人，就是想圆他的“碰头会”假话！小把戏太多了】有些人参加，有些人没参加。

哎，这个文件！

5月23日（应为21日）晚上我们就走了，坐直达火车到包头。【阿尔楞注：没去包头，回了呼和浩特（内蒙古首府），并且不是直达，周恩来让他们在集宁市做了停留，并与滕海清通了电话。不知滕此处为什么说成是直达包头。】离开北京前我写了个准备回去检讨的东西，交给总理的秘书了。秘书晚上就交给总理了。总理一看，说这不行。我们临走时总理就讲：“那个文件是主席批的照办，你们内蒙现在是反修前线，很紧张，不能乱，

因此滕海清回去在适当的小型会议上做自我批评，不能开大会。”【阿尔楞注：中央和周恩来从来没有指示内蒙不能开大会。传达毛主席的“5·22”批示和中央24号文件，纠正内蒙清队扩大化是全自治区的大事，不可能不开大会。事实上，5月22日晚，内蒙古革委会召开了有线广播大会，主会场在内蒙革委会礼堂，另设了四个分会场。会上，吴涛传达了中央24号文件，滕海清宣读了《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同志的检查》全文，并自己说“我的检查要单独来检查，主要是我来负责”。可见，中央没有滕海清不能在大会上检查的指示。】另外讲这个错误是工作上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他们有些人非要上到路线错误上。犯了路线错误在中央是不能改的，这不就完了！（笑）【阿尔楞注：滕海清此处的说法又与事实不符。中央给内蒙开会后，滕海清很紧张，自己单独写了份检查交给了周恩来的秘书，检查中将自己的错误上纲为“机会主义错误”。周恩来对滕海清的乱上纲，很不满意，等于改变中央的意见，所以在与滕的集宁通话时说（不是在滕离京前说的），告诉过你不要写犯了路线错误，你在检查中怎么写“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不要按这个检查。这次通电话，是周恩来用专线电话打到了集宁车站站长办公室，批评了内蒙核心小组没有向中央打招呼就走了，并且谈了滕海清留下的检查。此事在当年流传很广，不知滕为什么对集宁电话一事只字不提，并将通话内容改为离京前，还说是直达包头？不明其意图】

这是总理走之前跟整个代表团讲的。开会接见，你们回去怎样传达落实呀，怎么检查呀，不能乱呀等等。

内蒙已经乱起来了，上访呀……我回去以后，没办法，高锦明调工人，一天24小时轮流昼夜围攻。【阿尔楞注：当年内蒙古的受害群众滕海清恨之入骨（现在也是如此），找滕海清算账的人很多，根本不用高锦明调人。当时死伤者的家属群情激奋，为了保护滕海清，高锦明还将滕接到自己家里住，因估计没人能想到滕海清会藏到高锦明家。滕此处反说高调工人围攻他，什么人品？！后来因为到高锦明家告状和上访的人多，滕海清怕暴露自己，偷偷转到军区肖应棠家中，当时高锦明很紧张，以为滕被人抓走了。滕从肖应棠家中打电话给高，说自己转移到肖家了。肖后将滕转移到军区的防空洞中，结果反而被军

区的受害群众给发现了。】

王：怎么围攻呢？

滕：光围我一个人，其他人走了，没围攻，你说怪不怪！光找我。康生是插了手的。

【阿尔楞注：康生这样一个人物，怎么插手布置围攻滕海清？滕海清此处有些高抬自己。康生想整滕海清，用的着这么费劲吗？需要用找人围攻的办法吗？有关康生和滕海清之间的关系变化，后面再讲】

我回去就不能检查什么了，我就不能工作了，他们不安排我检查。他们向总理报告我不愿意检查。那个时候总理打电话说：滕海清同志，还是我告诉你的怎么怎么样，在小型会议上检查一下就行了，不能乱了。

电话不是我接的，不是吴涛接，就是高锦明接。

汪：你怎么不接呢？

滕：不找我接。找我，我不好传达，讲我的事。

康生也打电话，也是给他们打电话：你们内蒙是反修前线不能乱啊！你们要狠狠地批滕啊！把两派批到一起啊！

那个时候就有个保滕派和反滕派，保滕派就叫522派，按中央文件办，毛主席5月22日批的。康生支持的高锦明那派，叫批滕派。【阿尔楞注：当时“内人党”一案的受害者和同意清队扩大化的人是“批滕派”，挖“内人党”的积极分子和不同意清队扩大化的人是“保滕派”。】康生就这样讲：批滕啊，要把两派批到一起。和总理讲话不是两条线嘛。总理讲话他们不传达，只对常委传达一下，在外面不传达。康生讲话，他们向常委传达，也向党委全体传达。（笑）【阿尔楞注：滕海清又是在瞎编了，好像周恩来与康生对内蒙问题是两派似的】

王：那时你是不是被架空了？

滕：当然架空了，秘书都调走了。我有四个秘书，一个是参谋，管边防的，军队和地方都瘫痪了，边防线那么长，不管怎么成呢。一个管信件，每天上千封信，专门搞这个东

西都搞不赢。一个管办事组。还有一个专管接电话。四个秘书。

康生讲：“你一个人四个秘书，你搞秘书战争。”康生指示郑维山以北京军区的名义把四个秘书调走，送到蓟县办学习班，批斗了半年。【阿尔楞注：“滕海清办公室（滕办）”是个值得一提的事情，当年在内蒙，甚至在全国都是一个怪象！滕海清文化低，秘书多不足为怪，但拥有四个专职秘书（还有一般工作人员）并直接称为个人“办公室”的，在文革中的省市第一把手中，滕海清可能是是全国独一份。更为出格的是，“滕办”的权力很大，当时任内蒙革委会常委、政治部副主任的高树华后来回忆说：“滕办的意见和革委会的意见，甚至核心小组的意见同样有效，能使一些人立时登天，另一些人堕入深渊”（见高树华、程铁军合著《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p391）。本来应是一个秘书小组，结果成为了一个权倾一时的权力机构，并且在内蒙清队运动中，起了很坏的作用，使当时内蒙的干部和群众对滕办的意见很大。批内蒙扩大化，江青还说过滕海清，大意是：你搞个办公室，秘书比我们还多，你什么时候见过江青办公室、康生办公室对下面搞指挥？总理办公室实际上是国务院办公厅，但也不发号施令，你太不懂党内工作了。

1969年5月吴涛在内蒙传达中央(69)24号文件时，也传达了中央领导批评滕海清“搞秘书专政”。后北京军区撤换了滕的秘书，将原来的秘书调回北京军区办学习班做检查。】

我是怎么得罪了康生呢？就是在选九大代表时得罪了他，高锦明没当上代表嘛。高锦明当然不服，他不生气吗？造反派头头郝广德也没当上九大代表，他两个联合起来，当然就乱起来了。【阿尔楞注：这里说说康生与滕海清的关系。滕海清在前面说过，当年中央是由康生分管内蒙古工作，所以滕海清在清队、挖“内人党”问题上得到康生的支持和鼓励的，滕的极左思想和作风也是得到康生赏识的。内蒙古“内人党”冤案与康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曾任军委法制局局长的图们将军在写“内人党”案件一书时，将书名就定名为《康生与“内人党”冤案》。当年的滕海清是张口“康老指示”、闭口“康老指示”，很以康生对他的赏识为荣。周恩来曾经提醒过滕海清的这种工作作风，说“你们不要将我们中央文革某些人的讲话，当做中央指示来执行。”但滕海清不解周恩来此话的含义，反

而回答：“对中央的指示，我们就是要坚决照办的。”

在毛主席批评内蒙清队扩大化之后，惯于见风使舵的康生来了个大转弯，对“内人党”冤案不但不承担自己的责任，也否认了滕海清传达的康生的一些话，使得滕海清感到非常窝囊。毛泽东“5·22”批示后，江青和谢富治也否认过滕海清传达过的一些讲话。江青曾经说过，你（指滕海清）常常是一个人来见我们，不像是我们在接见你，倒像是你在接见我们。你文化水平低，记录有问题。

这里，显然有些事和话是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在事后推卸自己的责任，但也有滕海清文化低，理解有问题的一面，还有滕喜欢自己发挥和编造假话的老毛病。2015年，权延赤在其父亲权星垣的告别仪式上的讲话中，讲了一件滕海清出尔反尔的事情：滕在开完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对权星垣讲，康老说高锦明有历史问题。1969年5月底，中央给高锦明恢复工作后，权星垣又问滕海清，“你不是说康老说高锦明有历史问题吗？”滕海清却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

权星垣当年对滕海清也是几次提过不同意见的，1968年12月，滕海清主持起草了一份向中央表功的报告——《关于“内人党”问题的汇报提纲》，在常委会讨论这个提纲时，权星垣提出问题：“说乌兰夫是总头目，有什么根据？”滕海清反问：“你有什么根据说他不是‘内人党’总头目？”这种讲话逻辑使权再无法发言。滕还警告权：不要学高锦明（意即小心被停职）。】

搞了半年，总理知道了，这个不行。以后我们都上唐山学习班，一万多人。到69年12月间，那个时候已经平静下来，文件还是起了作用，做工作后内蒙上访的都没有了，起了作用了。【阿尔楞注：又在瞎说，69年12月，正是挖“内人党”的巅峰，哪里来的平静？当时内蒙到京上访的人不是没有了，是越来越多了。此处他说的文件，是指九大期间滕、吴发回去的电报和信，怎么会对四个月之前的内蒙起到作用呢？事实上，1969年2月，滕海清在北京的解放饭店还召开了一次各盟市负责人的会议，主题就是继续反右，扩大“挖肃”成果。权星垣在会上提出“内人党”是否挖的面过宽了的问题，令滕十分恼火，问权：

“你是‘内人党’的总书记吗？”权被问懵了，滕接着说：“你要不是总书记，你怎么知道‘内人党’有多少人？你无非想说我‘左’了。要是哪个单位有五百个‘内人党’，我打了一千，你说出来，我就承认搞错了。”权星垣无奈，事后说了一句河北的土话：老滕这是高粱地里耍大刀呀！（即乱砍乱伐的意思）。滕的“五百”与“一千”的这个说法，当年在内蒙很出名。】

什么情况呢？郑维山到内蒙看地形，那时已经把内蒙划归北京军区了，他去看地形，我陪他去。他讲老滕啊，你们的生产很不好。主要是煤啊，炼钢厂啊什么的，他没讲别的。

他回来不久，中央下命令了，内蒙分区军管。怎么叫分区呢？69年12月中央下命令把东三盟划归沈阳军区管了，不归北京军区管了，西边归北京军区管，实行军管。【阿尔楞注：滕在这里忘了自己前面说的，67年他就想到东三盟划分的事情了。】

军管当然是毛主席批准的了，实际上也是康生他们搞的。【阿尔楞注：又在瞎说。康生没有下令对一个省军管的权力，更没有调动几个军的权力。此事是经过毛、林、周和中央政治局批准的。】他一军管我就该下台了，他就带了几个军来，【阿尔楞注：“他”指郑维山。1969年12月19日，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实行全面军管的决定（中发[69]85号文件）》，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棠、张正光组成北京军区前线指挥所，负责内蒙的军管。】27军，65军，63军，带了三个军的几千个干部，把公社一级的干部全换掉了，换成军人了嘛。【阿尔楞注：没有换公社一级的干部。】换下来的干部有三万人，其中一万人到唐山办学习班。

把吴涛留在家里，我们就走了，先到北京空军学院办学习班，这是小班，十几个人，核心小组和革委会的都在这里，由28军抽的师级干部负责。【阿尔楞注：空军学院的内蒙学习班包括内蒙革委会和盟市的负责人，共30多人，不止十几个人。1970年1月20日正式开班，由空军学院教育长白云负责，上面由总参谋长黄永胜负责。】我就是这么离开内蒙的。

那时目标主要是对着我的。28军的干部反映滕海清同志在这里学习很好，康生一听就

不高兴了，说小班解决不了问题，这样就把我们也送到唐山的大班去了。（笑）【阿尔楞注：滕海清又在瞎编。内蒙小班开班后，中央领导于70年3月3日第一次接见了全体学员。会议中，周恩来又想起一件事，问滕海清：“68年国庆节前，我让郑维山同志给你转信，你收到没有？”滕答：“收到了”，周恩来接着说：“收到了还这样做，挖‘内人党’挖到蒙古包里，这不是和中央唱对台戏吗？！你真是情况不明，决心很大。”滕海清回答：“我有罪。”1970年6月6日，中央再次接见内蒙小班，周恩来讲话说，领导单独学习，下面广大干部有意见，要求你们同大班合并，接受广大基层干部的帮助。这是小班解散，成员到唐山大班继续学习的由来。中办学习班的总负责是陈伯达，与康生无关。】

在唐山办了一年半的学习班，一万多人。

王：都什么人？

滕：自治区机关的，各个盟、市革委会的干部。唐山是24军办。另外在张家口也有一个班，65军办的。

王：那一共有多少人？

滕：一共是三万人。光是西边的几个盟啊！东边的三个盟没办。学习班办了一年半，搞什么？一是批我，当时重点批我。批了以后没有批的了，大概到了70年的7月份，从小班到大班两三个月，中央接见内蒙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领导人，是24军的，军管的，领导学习班的，说滕海清主要的错误是到内蒙没有很好地批判乌兰夫。

乌兰夫我也不了解，我也没办法批。陈志（音）要批，我支持他批，没阻止。那是借题发挥，莫须有的事嘛。他们回来就传达了。批乌兰夫又批了半年，批到71年了。

71年时，不是两派吗？保滕派和反滕派，也有人哪派也不是，都办学习班，一锅端嘛。

最后要我做检查，做检查，康生出的题目，一条是我反毛泽东思想，一条是我不听中央的话，还有其它的一些，他就不管了。【阿尔楞注：滕海清又在瞎编。唐山学习班不归康生管，更不会直接给滕出题目。唐山学习班要滕海清承认的主要错误包括没有认真批乌兰夫和内蒙的第一个扩大化（即“清队扩大化”），第二个扩大化的错误（即“平反扩大

化”或“平反一风吹”由高锦明负责。没有说过他反毛泽东思想，当年反毛泽东思想就成了敌我矛盾了。】

这两条我当然不接受了，我怎么反毛泽东思想？他抓反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毛主席说扩大化了，我没有马上回去传达，开完会才传达。这就是反毛泽东思想。我不听中央的话？我不知道，我一切事都是按中央办的。实际上是他那晚发脾气，我没听他的话。

他定这两条，我说没办法检讨，要打倒就打倒，我干了几十年，几次没打死，现在你枪毙也没什么关系，无所谓。我就顶到底。我那时没自由的，和反对我的两个人住一个房间，唐山铁道学院的房子，三个人一屋，他们是反滕派，也无所谓，我们还挺好。

以后两派的群众都跑来做我的工作，滕司令员，你还是检查算了吧，你不检查，我们都回不去呀！（笑）一万多人都回不去呀！一年半啦。他们说，我们知道的，什么反毛泽东思想，什么不听中央的话，你就检查，我们知道的，没有关系。

以后考虑大家的意见，一年半了，在那地方也没事了，怎么办呢？最后我们那个组写了个材料，反正所有的错误我都包下来了，这样做了检查。共做了三场检查，一万多人嘛。

检查以后，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没意见，还有少部分人有意见，百分之百的同意也不可能。这样那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领导人，24军的，空军的，向总理报告检查通过了。

学习班解散了，总理还让我回内蒙去。那个时候李德生当了北京军区司令，纪登奎是政委，第一政委谢富治癌症，已经不成了。李德生就跟总理讲，不要我回去，回北京军区。李德生我们两个很熟呀，他想让我当他的助手。他提出，纪登奎也同意。总理讲，那好吧，回北京军区工作吧！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那时我不知道。【阿尔楞注：又是在瞎编。学习班结束时，当时的内蒙第一把手是尤太忠，曾建议将滕放到南京军区，不要回内蒙。军委同意了一半，不回内蒙，但回北京军区，并通知了李德生。没有李德生向总理提出当他的助手一事（李曾是滕的部下）。当时滕算是犯了错误的人，李德生不会提出让这样的人当助手。实际上，滕回北京军区后，一段时间没有分配具体工作，后来调到济南军区。】

就这样，哎！（一声长叹）71年的六月初，学习班解散，我就回北京军区了。

在内蒙古那个时期，如果我不得罪康生，可能不会乱。因为三月间我们已经发现问题了，发现问题后，已经发了电报了。【阿尔楞注：挖“内人党”的冤案是抹不掉的，康生是大力支持挖“内人党”的。哪里是“我们已经发现问题了”？68年底，张南生调查报告说内蒙清队左倾，滕还认为是北京军区右倾。相反，在69年4月毛泽东和中央批评内蒙清队扩大化后，滕海清开始还不承认错误。】

高锦明跟中央讲死了三十万人啊，【阿尔楞注：三十万是说被打成“内人党”的人数，滕海清在这里故意篡改成死了三十多万。1980年中央给“内人党”平反时，认定的受害人数是34万6千多人，受迫害致死的人数为16222人】扩大了，讲不清楚啊！死在哪里了？是死了人的，内蒙军区办学习班，是死了几个人，我是知道的【阿尔楞注：内蒙军区被打成“内人党”的共3千5百多人，死亡人数不详，但肯定不是滕说的几个人。后来平反时，内蒙军区颁发的残废证共497个】。整个内蒙机关一万多人，死了几个？我批了谁个？斗了谁个？你可以查嘛！

以后什么病死的、好几年前死的、以后死的都算在这里面了，反正搞不清了。

67年夺权时杀的人，都算在里面了，实际他也搞不清楚。

以后审四人帮的起诉书，内蒙死了一万六千人。开始三十万，后二十万，十几万……搞不清楚，他要说多少就是多少。死是死人了，不光是“内人党”，地富反坏右都有。【阿尔楞注：中央审定的“内人党”冤案的死亡人数16222人，其中有牵连“地富反坏右”问题的，但是，地富反坏右就该死吗？】

哲盟分区政委阿格达莫（音）（阿古达目）肝癌死的，死的还早。【阿尔楞注：阿古达目就是死在打“内人党”期间（1969年2月），怎么叫更早？1969年2月8日，原哲盟开鲁县武装部科长田万余以军分区机关“挖内人党领导小组”成员的身份，领导专案组对阿古达目采取捆绑吊打的审讯手段，造成阿的严重内外伤，死于1969年2月28日。】那个检察长图门（们），他认为是打死的。不是就不是吧。（笑）

死多少人，现在没法去整这个事情了。内蒙XXX死了，什么时候死的，你搞不清。他

打死人的人，他不会报告的。那个糊涂账。【阿尔楞注：这是一个高级干部该说的话吗？一个人是怎么死的，怎么能是糊涂账呢？】

内蒙挖“内人党”，党委提的要破案【阿尔楞注：哪个党委？但是滕海清是内蒙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哪个党委？】，那是你搞出来的，与我根本无关。【阿尔楞注：这句话是本质：滕海清根本不承认“内人党”是冤案，根本不承认自己对挖“内人党”犯有严重的错误或罪行！】

王：乌兰夫平反后，对你有气啊！

滕：乌兰夫并不了解情况，有几个人反映情况，他被打倒了，他有气，他要找人出出气，可找我出什么气呢！这个事情老同志不同意嘛，华国锋也不同意嘛。【阿尔楞注：华国锋不同意什么了？正是华国锋在1978年4月20日批准了给“内人党”冤案彻底平反的报告。】

我回到北京军区，从71年到75年，很顺利嘛。75年调到济南，还是正常工作。

王：你和乌兰夫见过面没有？

滕：我们两个人从来没见过面。他被打倒前没见过面，出来后也没见过面，他死了我在电视里见过。（笑）实际上他不认识我。

我说乌兰夫不管你怎样，我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我何必要批你呢？！78年我在济南时，他派两个人来，【阿尔楞注：乌兰夫不可能派人去找滕海清。】一男一女，一蒙一汉，也是唐山学习班的，我都认识。他们拿着内蒙党委向中央报告我的提纲让我看，我说这个我不看，你要向中央报告，你要把全文写出来让我看，我同意我签字，不同意我不签字，你拿个提纲来我看什么呀！他提了两个问题，一个你到内蒙来为什么批乌兰夫？我说你们不清楚？你们比我清楚，你找67年中央31号文件看一看，定的乌兰夫是内蒙古最大走资派。批乌兰夫是中央定的，我们到了唐山学习班还批了半年，还说我不批呢。（笑）和我什么关系啊！这是一条。

第二条，你怎么到内蒙制造了一个“内人党”？我没到过内蒙，文革后才到内蒙，“内

人党”也不是文革后发展起来的，怎么是我制造的？62年你们就开始破案嘛，我怎么知道这事。如果说挖“内人党”扩大化了，我负有领导责任，【阿尔楞注：前面滕还说内蒙挖“内人党”与他无关呢？怎么现在又说要负领导责任了？】这可以，你提这个问题没道理。

从唐山学习班回来后，除这两个同志问过我以外，中央、总政、任何人都没问过，一直到现在，没人找过我。【阿尔楞注：1980年，滕海清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被免职，没有人谈话吗？】

王：高锦明后来怎么样了？

滕：高锦明没让他回内蒙，【阿尔楞注：1972年，周恩来安排高锦明到301医院治病。1973年，当时内蒙的领导人尤太忠、吴涛曾先后找过高锦明谈话，要他回内蒙工作，高锦明没有同意】他就是搞阴谋诡计，又搞男女关系，中央抓住这个事情，要送他到煤矿去劳动，【阿尔楞注：滕海清又在编瞎话。高锦明没有工作，能搞什么阴谋诡计、男女关系？文革中中央从来没有安排过任何老干部下煤矿去劳动。】这时谢富治死了，谢富治的老婆给他讲了情，到洛阳哪个车间当副主任。【阿尔楞注：这个瞎话编的更离谱。唐山学习班是71年6月结束的，谢富治死于72年3月。高去洛阳是1975年，距谢去世已过三年。况且，谢的爱人刘湘屏时任卫生部长，如果一个部长讲情，高才当了个车间副主任的话，还需要讲情吗？反正康生和谢富治都是被否定了的人，滕就胡编乱造高锦明和康、谢的关系。】时间不长，回北京好几年了，写东北联军历史。现在到哪知道了，可能还在北京。

吴涛没去唐山学习班，他是康生指定留在家【阿尔楞注：又是康生！吴涛是军队干部，工作去向根本与康生无关。】。李质还是回内蒙了，李树德也回内蒙了。李德臣，我们办学习班，他在家升了官的。■

2016年4月 根据录音整理

【述 往】

关于挖“内人党”的片断

陈晓庄

五连三排十五班资料之第十

关于“内人党”的扩大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只看到和听到的一些侧面，这些侧面是否完全准确，也还（须）（需）要多方面揭露才行。这里我想讲两个问题，一是“内人党”是怎么挖起来的；二是怎么扩大化的。不讲怎么挖起来的，就很难说明扩大化，我想说的这两个问题，由于各方面的局限性，难免有错误，望同志们批评。

中央首长指出：“内人党有没有？有，是有根子的，只是没有那么多，”“有旧的，有新的……内人党是同外蒙接触的，是反革命。反对这个东西，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做法不好，打击面大了，伤害人多了，扩大化了。”同时中央首长对滕海清同志说：“根子，扩大化这件事在你那里，更远的根子在乌兰夫。”

中央首长这些英明正确的指示，是符合内蒙阶级斗争的实际的，也是我们今天揭第一个扩大化内幕的立足点，离开这些英明的指示，是不对的。现将我接触到的一些侧面作如下的揭发交代：

一个疑问

内蒙的内人党扩大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怎么搞起来的？特别是滕海清同志的头脑在内人党问题上是什么时候开始扩大化的呢？当然这些问题只有滕自己（作）（做）出回答。不过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十二中全会之前，我没有见过滕公开动员搞内人党，似乎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在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滕的讲话（68.11.18）和“会议纪要”两个文件的今后任务部分也只字未提挖内人党问题，如果在当时已经认为

内人党是所谓内蒙的“主要矛盾”，那些讲话和纪要中非提出来不可。可是到了11月27日，滕海清、李树德两同志给大学校连以上干部会上讲话中，把内人党问题提到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而且认为是内蒙最大的特务组织，等等。这说明滕海清头脑形成这个非常突出的概念，时间不是很长，而是很短的。这一点滕海清同志必须做出交待。

人们知道内蒙从68年初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清队以来，阻力很大，曲折很多，为什么挖内人党却一哄而起，从68年12月到69年1月基本上铸成内人党扩大化的局面，而且问题（扩大化）又偏偏出在滕海清同志从12月23日离开呼市到北京，69年2月8日返回呼市的近50天内，这又是什么问题呢？

扩大化的根子是滕海清同志的“左”倾错误思想，更远的根子在乌兰夫。滕海清同志的“左”倾思想，一直反右，“内人党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就一哄而起，不了解情况还那样胆大”，瞎指挥。敌人总是通过领导的错误起作用的。中央首长指出：“更远的根子在乌兰夫”，乌兰夫已经不掌权了，他又怎么起作用的呢？

乌兰巴干与内人党

大规模挖内人党是在68年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后，挖内人党已有人了。群众组织有当时的“揪叛联络站”的乌兰巴干。大约在67年底68年初，在社会上，他打着滕海清同志、“滕办”的旗号招摇撞骗，到处做报告，大讲“内人党”的发展历史等等。从今天看，虽然乌兰巴干搞内人党较早，而且主要是搞内人党，但大造舆论，夸大内人党的影响等方面，起了极坏的作用。但据68年3月常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郝广德告诉我：乌兰巴干搞内人党只搞老的，不搞新的。后来据说“揪叛联络站”到东北调查王再天问题，碰到高锦明的历史问题，引起领导的注意，于是在68年上半年撤消了“揪黑手”、“揪叛”两个联络部，他们所得材料统统交给常委会“专办”。此后我们再也不听说乌兰巴干搞什么内人党问题了。我到学习班来后，有人说滕海清挖内人党是根据乌兰巴干提出的两千多人的名单挖的，

从此越挖越大，而且李树德同志也相信了这个材料，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些说法是否真正有据，只有主管挖内人党的滕海清、李树德、李德臣同志，以及大学校管挖内人党的权星垣同志做出明确的回答。

专案办公室内入党专案组

乌兰巴干搞内入党，是属于群众组织的性质。我记得远在 68 年 2 月中旬，革委会的专案办公室曾向核心小组作过一次汇报，对内入党从 25 年起的发展历史作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下述重要问题：

1. 46 年“四三”会议后，受外蒙指使转入地下，组织“新内入党”，乌哈¹合流，乌兰夫将内入党头目拉入共产党内。

2. 47 年“五一”大会后，还发展了“内入党”员“三旧变新”（旧官僚、旧军队、旧党都变成新的）。

3. 直至现在阴魂不散，内蒙曾出现的兴蒙党、真理党……是内入党的变种。

4. 多种叛国案与该党有关。

5. 内入党的数量，哈丰阿说有三千，有人说有两三万。

6. 从 25 年到现在，看不出有进步性。

我记得在这次汇报中，也提到文艺界通福、李淑君在 64 年文艺整风时交待的统一党问题，也还提到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交待的军内内入党的名单。当时滕海清、吴涛都认为不可靠，不可信，说李淑君是个坏女人，不要上当，不要让它们把水搅混了。

这些材料的汇报人是专案办公室内入党专案组宋光才同志，请问内入党专案组：这些材料从哪里来的？请问李树德同志：你领导的专办，你对这些材料、这些结论怎么看？

¹ 乌哈，即乌兰夫、哈丰阿。

滕海清同志在自治区专案会议上的一次讲话

这次会议是在68年初开的，但内人党“206”案件、统一党问题是67年底就知道了的。67年11月12日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界的讲话后，在内蒙古文艺界开始兴起揪坏人运动，滕在11月17日指出“文艺界要大乱”。11月19日又提出“内蒙公检法的盖子必须揭开”。11月揪出特古斯。68年1月揪出王再天。在文艺界一乱，又提出了统一党的问题。公检法一揭盖子，揪出了滕和。在王再天和滕和的问题中，就有一个包庇206案件的问题，而206案件就是“新内人党”问题。在这以前，郝广德和公安厅丁振声（是二办管内人党的）向滕海清汇报了公安厅严重的敌情问题，也说了63年乌盟发表的206案件和四十三会议问题。比这更早一些，67年10月乌兰巴干通过内蒙军区原报社的一个科长湖泊交给我两份材料。一份是特古斯的材料，提出特古斯、鲍荫扎布、巴图（内大）等人是四五年“八一五”后由哈丰阿组织的新内人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还有一份是206案件的那一封信（乌兰巴干怎么搞到的，没有过问）。这两份材料我分别交给了滕、高、康等领导人，但他们都没有表示过什么，也未引起我的重视。

内人党和206案件问题，革委会办公室做过汇报，高、权、李、李是否向滕作过介绍，我不清楚。

但在68年滕在一次专案会议上讲话，可以看出滕当时的态度。

- 一、 揪三线（即乌、哈、傅、董），归根到底是乌兰夫黑线。
- 二、 要研究内人党的历史分若干阶段。四六年三月承德会议（中央电令撤销内人党）后，再活动是反革命。“四三”会议后没有活动，要区别对待。
- 三、 抓重点，找出突破口，抓主要就可以了，面宽了容易出毛病。
- 四、 材料要整理，整理要有事实，不要设想，落实正式材料，不要搞虚构，设想不能定案，只凭口供不能定案，诱供更易虚假。如“四十三”委员会、206案件，只要线索抓准，骨干搞清就行了，下面党员怎么搞得清？

语委很复杂，要防止敌人捣乱。

这就是当时滕海清的看法，后来是怎么发展的呢？

一次形势座谈会

内革委会二次全委会前后，由于揪出和揭了特古斯、王再天、文艺界和公检法的盖子，对过去由乌、王再天包庇的叛国案、苏修问题、内人党、统一党、兴蒙党等逐步暴露出来，就是对乌兰夫民族分裂总暴露。因此，这一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如何看待阶级斗争的实质和动向，内蒙清队应该抓什么？怎么抓？针对这些问题，革委会领导于1月份召开了形势座谈会。现将这次会议，一些领导人讲话的）有关部分摘要如下，供同志们分析。

李汝德（当时主持公检法）：二次全委会后，政法界的盖子揭开了，也推动了全区，主要矛头对准乌哈黑线……一是那些民族党如内人党、民族统一党、兴蒙党，还有情报员等，还缺乏分析，没有区别对待，没有一套政策，（须）（需）要划杠杠，（须）（需）要（介）（解）决，内青团涉及面很大。二是叛国，逃蒙是集团性的，少则几十，多则几百个，民族情绪加社会关系，也确有里通外国的，也必须区别对待，要讲斗争策略。三是旧军人（（付）（傅）董¹势力）有的是起义的，要按公安六条办，连以上是历史反革命，有现行活动的抓，混入造反派而无现行活动（的）清除。

郭以青：这次运动对学生震动很大，内蒙内大两派起来了。“八五”打我被动，“七三”主动。内大有个叛国集团，背后有人，牙（汉）（含）章、白燕（沙梯的老婆），好多是沙梯搞的，沙和特古斯关系密切。

内大——军区——白燕串连活动频繁。师院高树华说：“师院权被夺了，要二次革命。”力沙克去上海，师院有人同意的。师院看来稳定，但很紧张，不知谁紧张谁，可能有比较

¹ 傅董，即傅作义、董其武。

严密的防线，//不定出个小集团。他们的那些活动手法，完全像搞地下工作一样。民族统一党是反党的，不是一般的，是现行反革命，不（知）（止）一个，刚刚揭。王再天知道，巴图、特木尔巴根、特古斯是骨干，头头是王再天，一旦上街，首先是高等院校。他们（指特、王）把高等院校作为自己力量，总要出点子。内大研究所所长、（付）（副）所长（那顺）是跟去的，机器是总参搞的，可以收发报，是通过孔飞搞来的。我看过一份文件，“关于外蒙人民革命党历史”后又偷偷运回。这件事很不平常，怕有个专门搞情报的组织。

权星垣：运动来后，政策要讲，但还要揭一段，不怕乱，不怕乱自己，反特、王捂了一下，压了一下，可以激闹了一些人。王每天有活动，下边有特那顺巴雅尔、白彦太有联系，教育厅、卫生厅、医学院都有他的手。王再天以东部蒙古人的头目自居，有人告过他，告他的是乌兰夫的嫡系。64年乌兰夫讲，不让他当书记，王对乌不满，许多案子没有处理，也按乌的意图办的，要进一步揭。

高锦明：革委会成立两个月，内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新的形势。这个新形势从打倒哈丰阿、特古斯开始，这一条线内容丰富，以东部蒙古人为主，以文教口为多。但目前点火不旺，有邪火，表面平稳，背后紧张。不久曾还有人保戈瓦（语委）、斯荣（师院），究竟是什么人？究竟跟谁作斗争？第二把火抓了王再天，这个人历史不太清楚，现实活动知道一些，拿现有材料，不要说落实全部，一部分，也就说明了什么线上的人物？是哈线上的人，把哈的势力一部分人拉过来当作自己势力，同乌兰夫争。五四年王撤掉了军区（付）（副）司令，五八年进入书记处，过了几年，乌夺王的政法权。毕力格巴图尔不行，云世英是云丽文最感兴趣的。

四十三人委员会，“奎璧是人民革命党（内人党），此事要到特古斯身上，把乌兰夫洗白。王再天有野心，拉拢一批，一为东盟领袖，进而为内蒙领袖。嘎入布（曾）（僧）格，王一伦、鲁志浩打嘎，王再天保嘎，曾庆波（王的秘书）写罢乌兰夫的官，搞签名目的是树王再天。”乌兰夫的嫡系在六四年告王再天，正说明这个矛盾。王拉哈基本势力在政法系统，哈的势力在文教口，王与哈不同，哈是伪//官吏，王有老革命、老干部的牌子，

迷惑一部分人。

不能忽视文艺界，鲍音扎布、阿思根又动了军队，军、地是相连的。

藏在造反派内部〔的〕是什么人？①乌兰夫分子，②叛、特人物，重大嫌疑人物，也是反动的国民党线上的。矛盾对准乌哈黑线，不要怕面宽，不要怕乱，不要怕触动民族问题。内人团（估计有两万来人）部队几千，要研究。

有一位同志说，民族问题，现在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时候了。

对于上面这部分材料，我想说明内人党问题与形势分析、敌情估计、矛头指向、民族问题都有重大关系。后来的内人党扩大化并非偶然，也非孤立的。

请同志们特别注意一下，郭以青以及高、权、李等人的有关发言到底说明了什么。

把批乌兰夫纲丢了

68年第二次扩大会议，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就是滕对内蒙问题已有基本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内蒙革命委员会其他领导人介绍的三条线（三股势力），就是①乌嫡系势力，有老的，还有原来的少壮派；②哈、特势力，包括王再天嫡系势力，其主要势力在公检法和文教界；③（付）〔傅〕、董国民党势力。最主要的是上面两股，当时的精力又集中到第二股。这里最突出的有民族问题、民族分裂问题。从此时起，走资派的总概念，被乌兰夫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等概念所代替。乌兰夫内蒙最大的走资派这个概念没有了，只剩下民族分裂这一条。因为把主要矛头指向哈、特势力，他就是高说的那个暗班子了，所以“内人党”问题也突出起来，因为哈、特势力上层分子中大多数有“内人党”（有老有新）问题。看看滕于68年初与呼三司负责人的一次谈话就清楚了。“内蒙三股势力，实质是一样反革命势力，不论美蒋日特都勾结在一起，成为内外勾结的反革命集团，这些反革命势力遍及全内蒙，主要在呼市。呼市主要在公检法和文教界，以及党政机关，一部分倒了，或

//者有的人靠边了，问题未揭露，另一部分未倒，王、特才揭出来。王是什么人，实际是哈集团的人。哈是什么人，特务双料货，朋¹是双料货，王、特线上还有人的，他们包庇了一部分人，为什么公检法、文教界火烧不起来，就是这些人在起作用，特别是人民革命党（内人党）是一问题，但不尽然，46年组织起来的是反革命，46年前的也不是革命的，后来出现的这个党那个党，都是改头换面，王、特是什么关系，一路货，这股力量一直到各大学，内大、师院都有反革命集团，他保了特、义²、木³、嘎日布（曾）〔僧〕格……”请看滕这一段话与前面谈到的、一些人的敌情分析，矛（盾）〔头〕所向，何等相似。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乌的“民族矛盾为主论”在原内蒙党委站出来的一些领导人身上腐烂、发臭，而且开始侵袭滕的躯体。

1968年2月4日中央首长接见滕、李树德时指出：你们没有搞大批判，没有批乌，乌闲着呢。（大意）滕没有坚决贯彻中央首长指示，没有抓批乌这个纲，全内蒙站出来的主要领导人由于他们过去和乌沾（的）〔得〕很紧，因//此在滕去内蒙之前就丢掉了这个纲。清队一开始揪出特古斯、王再天，一下钻到三股势力中的一股，即哈、特、王那股〔势〕力去了，乌成了虚的，从此不断出偏，犯错误，一会搞乌的旁系，一会搞乌的嫡系，一会搞明班子，一会搞暗班子，把批乌这个纲丢到九霄云外，只抓了一些目，纲不举，目不张，乌的二十走资派问题没有人说，成了虚的，总是犯错误。内人党扩大化错误，与丢掉批乌这个纲是紧密联系的。

一张时间表

68年3月27日，滕、吴、高呼回京，参加北京军区扩大会议，一直到5月25日才到乌盟集宁，月底才回呼市。6月5日又去边防看地形，到6月下旬才回呼，参加第三次扩大会议。会一结束，即7月25日又出发第二次看边防地形，8月1日回呼。8月31日又出发

¹ 朋，即朋斯克。

² 义，即义特嘎苏荣。

³ 木，即木伦，内蒙古医学院院长。

第三次看边防地形，9月8日回呼。9月13日又去北京，一直到11月3日开完八届十二中全会，才回到呼市。开完第四次全委会以后不久，于12月12日又到中央汇报，在北京一等近五十天，1969年2月8日才返回呼市。只在呼市呆了一个月，3月8日中央指示派滕、吴进京，参加九大（矛）〔预〕备会议。开完九大，//到69年5月6日才返回呼市。

这笔流水账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滕在68年3月到69年5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有九个月离开呼市，处在内蒙阶级斗争异常复杂的时刻，作为第一把手，在许多情况下擅离职守，来去于京呼之间，靠会议、汇报、电话过日子，不深入实际，不深入群众，不作调查研究，掌握情况不明，瞎指挥，必然要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错误。加上思想上左倾，内人党是什么东西不了解，一轰而起，那样大胆，长期不在呼市，没有可能不让敌人钻空子，敌人牵鼻子走，不可能不让敌人利用滕的弱点而阴谋得逞。

一只黑手

反革命两面派郭以青就是一个。68年4.13内蒙发出第二号公告，向阶级敌人发起全面进攻的时候，呼市地区形势出现了一个复杂局面。

在当时起重（用）〔要〕作用的、极坏作用的郭以青，在四月常委会上表现十分充分，以反倾向为名，大（正）〔整〕高树华、白彦太、那顺巴雅尔，要大树高锦明的正确路线代表，同时也黑手//伸进内大、师院党委机关，插手了两个包围圈：一个是以其短计划搞师院的什么反革命小集团，以搞七人黑信为名，出动大量宣传工具，大张旗鼓（正）〔整〕一些犯错误的革命小将，利用派性，煽动群众斗群众。在内大抓什么右派学生、地富子弟战斗队，把矛头向下，打击一部分小将，分裂革命队伍，捂住内大阶级斗争盖子，保护自己过关。另一个包围圈是当时党委红旗利用他们一些错误，进行围攻，目的仍然在于分裂内蒙革委会的领导，因为对于党委红旗的支持是经过滕、吴、高、权、李（树德）等领导同志集体讨论并同意。与此〔同〕时，郭还就自制定大批判第一战役计划，提出了以批判

联社入手批乌，以土旗和呼市为重点，开展全区批判，打击乌嫡系势力，以批联社代替批乌，搞什么旁系嫡系，打混战。可是跳（的）〔得〕越高，暴露（的）〔得〕越充分，看他关键时的政治态度，支持谁反对谁，以及他的严重历史问题。不久，终于在他这个变化不定的态度中抓了这只黑手，固然是个胜利，但 1968 年 4.13 后，向敌人的全面进攻让他捣乱和破坏了。对这一点，七月初，高一次□□说□□4.13 后□□□□给扭了一下，他当时还作了个扭的手式。对郭这个人，权、康当面对郭作过评价，权、康说郭：“你要是个敌人，一定是个很狡猾的敌人。”郭说：“是呀！我是很狡猾的。”

内人党是乌兰夫暗班子一说的来历

上面说了人所共知的郭以青这只黑手，就是这只黑手，一方面伸进了大专院校和其他一些单位，把矛头指向群众，分裂革命领导和革命群众，在对敌斗争上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说什么：抓十个（既是）〔即使〕九个抓错了，一个对了，成绩也是伟大的，可以向九个人磕头道歉（大意），伪装积极，欺骗领导。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远在二、三月间，郭（一）〔以〕青这只黑手伸进了军区鲍音扎布专案组，同内大的巴图的内人党联系起来，在四月间向革委会汇报。后来李德臣同志根据汇报材料提出了内人党是乌兰夫的暗班子的问题。当时高锦明同志同意了这个结论，并认为是一大收获，说挖肃以来搞了乌兰夫的明班子，这次又搞清了乌兰夫的暗班子，这很好。其实暗〔班〕子之说在李德臣同志提出之前就有了，李不过把他接到内人党头上，与乌兰夫联系起来，同时得到高锦明同志的肯定，后来又写入七月内蒙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滕海清同志的讲话在会议纪要并更加体现出了是乌兰夫指挥的暗班子。从此这个概念（流）〔留〕在滕海清的头脑里，通过滕的讲话和纪要流行全内蒙古。李德臣同志最近关于第一个扩大化的大字报中提出了高锦明同志对挖肃即清队向来不积极，而为什么对内人党问题如此感（性）〔兴〕趣的疑问。这也引起我的回忆，早在 1968 年 2 月中旬革命委员会专案办公室汇报到军区鲍音扎布交待的一

大堆名单以及文艺界的通福、李淑君交待的统一党的名单时，滕、吴、高等领导同志却认为不可靠、不可信，不要上当。为什么四、五月间对鲍音扎布、巴图交待的内入党问题又感（性）（兴）趣，不仅不可靠、不相信的疑问不见了，而且肯定了内入党是乌兰夫的暗班子，搞清了这个主要矛盾，还认为是一大收获呢？

还有几件事，在七月内蒙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期间，根据高锦明同志对内入党问题几个阶段的分析和李树德同志关于内入党问题的讲话，制定了关于内入党、内人团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内入党在1925年以前到1936年为第一阶段，是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性的，1936年到1947年五一大会以前是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党；1947年五一大会以后属于反革命政党。为什么要以47年五一大会为界，而不以46年4月5日承德会议中央电令停止内入党活动组织共产党为界线呢？即使是以47年五一大会为界，还是肯定47年五一大会后有内入党，否则你们划这条杠杠有什么用处？另外我还记得1969年1月高锦明同志向大学校做书面检查时说什么：“革命群众围歼内入党及其变种组织的积极性在我压制之下处于奄奄一息的状况，……我犯下了严重罪行。”等到了69年五·二二后，积极组织否定内入党的存在，认为滕海清同志搞了内入党是没有根据的。为什么如此多变，目的何在？

其实高锦明同志对内入党问题了，早在1957年在包头市委会议上说（说）过：包头建立内党组织比民盟更有条件，包头已经有不少人原来是东部区老内入党成员，有的加入了共产党，有的还没有，可以考虑组织内入党作为民族主义的政党。//

206号案件与内入党登记

从郭插手内大巴图、军区鲍音扎布专案，经过李德臣同志的判断结论，最后高锦明同志作了肯定。此后，李树德和李德臣二同志制定一个从包、特古斯、巴图、木伦、（土）（特）布信、乌力吉那仁、赛兴阿、赛音巴雅尔（哲盟）、旺丹（乌盟）等人的突破方案，

并确定去乌盟抓 206 号案件的破案工作。如何突破，破案情况如何？我没有印象，这一点二李是清楚的。

7 月，革委会三次全委会对内入党问题作了决定，并决定在内蒙进行内入党登记。7 月底我们经过乌盟集宁市时，只见大街上有破 206 号案件的大字标语，但由于当时盟革委会正在处理两派的问题，206 号案件并未下力量去搞，在盟革委会领导人的汇报和谈话中均未提到这些问题。可是当我们滕办几个人在 69 年 3 月底去乌盟了解内入党问题时，问题就突出了，扩大化早就开始了。乌盟是怎么搞起来的呢？我先从基层谈起。集宁肉厂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挖内入党是从 68 年 9 月 21 日到 10 月 21 日的内入党登记月开始的。开始无人登记，上面又着急要数字，10 月 17（日）根据市里检举材料，首先挖出一个人事科长孟福庭，搞了逼供信，咬了一大堆。又来了一个鸡生蛋、蛋孵鸡，逐渐扩大为上反右，又未敢怀疑，结果是一千三百万人中挖了九十多。

集宁市是怎么挖起来的呢？也是从内入党登记和侦破 206 案件开始的。开始时只有盟里转来的三个人名单，即三个头，一个是公检法的，一个是武装部的，一个是市委的，于是在公检法和市委××系统、原四清总团分团系统开始挖，并根据他们的交待（公检法那一个交待了七十多，市委的那一个交待了五十多）办起了集宁市学习班，唯一的材料是“名单”，斗争的办法“口头”（以后又有各种逼供办法）。这样又是鸡生蛋、蛋孵鸡，//逐步扩大，直到把大部分党团员和干部打成内入党。于是“共产党支部就是内入党支部”、“共产党边防站就是内入党边防站”、“四清骨干都是内入党分子”、“集宁市委是乌兰夫黑窝子”。在凉城县有人说，内入党（象）〔像〕大青山上的石头，踢一脚就是一个。一股反革命极左思潮从此掀起，流向别的地区，从乌盟逐渐刮向呼市。

但集宁原不是根子，乌盟是怎样挖起来的？乌盟一些领导人对我说：“乌盟挖内入党，是内蒙革委会布置让突破旺丹和 206 号案件开始的。如何突破旺丹呢？从民中校长斯文（说是旺丹指使他写给外蒙一封信）那里开始的。后来又发展达瓦身上，交待了一大堆。文教口又抓了个特格希，说 65 年发展了 4 名内入党。从这一大堆名单中又往下发展，直到旗县

公社，这样就扩大化了。”乌盟军分区的负责人对我说：“乌盟挖内人党，从206号案件开始，九月底至十月底一个月搞内人党登记，这是内蒙革委会指示叫搞的。九月没重视，但上面一直催促突破206号案件和旺丹问题，所以十月廿日乌盟召开了围歼内人党大会，全盟就这样起来了。十一月形成高潮。集宁挖内人党不仅在地方搞，部队也很严重，军、地结合起来了。”

由此可见，乌盟挖内人党也是从上边来的，一个是206号案件，一个是搞内人党普遍登记，这两件事起了极坏作用。但当时我随滕从68年9.13离呼一直至11.3开完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回呼，这五十天间我就不知有个内人党登记。在呼市也贴了布告，广播车也上街大喊大叫，到处设内人党登记站，这些全然不知。只是在十月二十三日李德臣同志到京西宾馆向滕、吴汇报，在说到全区专案工作时提到这个问题。李说：“乌盟的重点是挖内人党，从民中校长斯文突破的，斯文交待了，旺丹曾威胁文、玉宝（民中教员、主义兵的头）”那封信是旺丹指使让写的。

特古斯有突破，承认是乌兰夫的暗班子，参加共产党是哈丰阿指使的，内人党从//未停止过活动，承认特是个头，还有暴彦巴图、木伦、巴图、贡嘎、巴图巴根。又突破了木伦，是打进来的，第二次交待名单时，有高万宝扎布，60年至64年，有活动有集会（在贡嘎、特古斯、戈×夫等人家里）。呼盟民族统一党成员等36人。

就我个人说，确不知道内蒙李树德等同志是怎么部署挖内人党登记，怎么突破206号案件，但从乌盟的基层到上层是怎么挖起来的，从乌盟领导人对我讲的即李德臣向滕、吴的汇报内容看，内人党是怎样挖起来的，是可以看出一些线索的。

据我看，问题起于军区鲍音扎布和内大巴图专案（他们两人在军队相处很久，曾同为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军分区政委、内蒙军区副主任）以及扩大到各盟市的人头专案（即突破十个人）尔后，由他们再逐渐扩大。这里郭以青那只黑手起了极坏的作用。关于内人党是乌兰夫的暗班子的判断，是内蒙内人党扩大化在认识上的起点，206号案件和十个人头专案逐步发展是扩大化的实际起点，而内人党登记和围歼内人党口号的提出，使内人党

发展到群众中去了。这样就是人头专案与群众性登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1968年10月以前，已经摆好了内人党扩大化的架势，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左了，十一月一反右，打开了扩大化的闸门。

反右倾与内人党扩大化

反右倾与内人党扩大化有直接联系的。

内蒙在党的十二届全会前，不仅清队工作搞得并不好，阵线不是很清楚的，尤其是农村、牧区城镇街道，还没有怎么搞，西部地区有八十万人口没有搞土改，内蒙有一些坏人混进革委会里。中央首长指出坏人钻进你们心脏里来了。这些事实证明要停止清队是错误的。中央首长说，有右当然反右，但是滕海清同志没有正确处理这个问题。不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反右的，是向左反右，尤其是展开全区性的反右，这样像内人党问题本来就左了（乌盟），一反右就更左了。这个反右的恶果，从领导来看，最主要的来源比较左的领导，以为自己完全正确了。以自己左倾错误思想代替毛泽东思想，一些原来比较正确的领导也跟着搞左倾，原来比较右的领导就更不用说了，在许多地方出现人人怕说右倾的局面，全面性反右批高是否一定要出现内人党扩大化呢？不一定，但事实已经出现了，那么有些什么条件把领导的精力吸引到搞内人党这方面去的呢？

主要×右论的出现

我前面已经提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滕信里公开动员挖内人党问题，内蒙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与滕的讲话和会议纪要中也未提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后滕头脑里逐渐对内人党问题突出起来了呢？而且把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偏了呢？

上面已经提〔到〕在十二届全会前已经搞了内人党登记，已经有左的问题，乌盟正在扩大化了，这些问题一定要反映到核心中来，如果说滕头脑里都是无产阶级思想，肯定能排除左右倾干扰，但事实不是这样，那时滕海清同志头脑膨胀了，批判了高锦明同志，

以为自己都正确了，事实上把内蒙的敌情扩大化了，乌兰夫黑线变得很粗很长了，左得很，当然不仅不能发现下边的左，而且容易接受来自左的方面的侵蚀。由于内人党登记的发展，在我们那个地方也有不少议论，什么乌盟×旗××公社农民成群结队（的）（地）去登记，什么呼市有人到×登记站转了好几天，思想矛盾很尖锐。甚至有人说人委办公厅某青年是一九六八年被发展为内人党员的，等等，总之被一股议论内人党的气氛包围着。

六八年十一月廿三日滕海清、李树德同志给大学校连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李树德同志主要讲了内人党问题，说什么内人党是大规模的隐藏很深的国际间谍组织，指挥部就在大学校等等。滕海清同志也同意这个看法，说什么内人党是最大的特务组织等等，脑子膨胀了，扩大化了。

请问：滕李二同志凭什么讲成这样一个判断呢？

还有一次李树德同志突然提出一个观点，说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在内蒙反映为共产党与内人党的斗争。滕海清同志也表示同意，而且还说过这样的话，这样就以内人党代替国民党，上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这样内人党是乌兰夫暗班子之说也突出起来，以抓内人党代替抓乌兰夫。当时有的同志向滕海清同志提出：把内人党放在那样突出地位是错误的，这样把全区的力量引向挖内人党方面，同时还会放弃其他叛特反的清理，应当搞全区清队。后来，滕海清同志虽然不这样讲了，但内人党的突出地位并没有改变，这就是扩大化的祸根。

一张大字报

在说到内人党问题是主要矛盾时，使我联想〔到〕郝广德同志的一张大字报，68年12月7日，郝广德同志发表了一张题为：“高锦明之流镇压呼和浩特坚持挖肃革命造反派铁证如山”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贴到呼市第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当时也有把这张大字报铅印发到呼市、内蒙等单位和群众手里。这张大字报关于高锦明同志本身的问题谈得不多，

又着重吹捧了马伯岩同志，同时还谈到高锦明之流利用职权插进黑手，千方百计地搞垮“揪叛”、“揪黑手”联络站，派出臭名昭著的消防队和高锦明的老班底组织在一起，四面呼应，八方串连，拼命攻击乌兰巴干、孙玲玲等革命群众。

郝广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指出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因为这个问题与挖内入党有点关系，所以摘抄如下：

“我区各级革委会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按照毛主席路线斗争交给群众的教导，把高锦明同志揪出来进行严肃的揭发批判和斗争，又清除或正在清除隐藏很深的、蒙蔽群众较深的敌人，击溃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右倾翻案的逆流，还×了当前一派轰轰烈烈的大好革命局面，挖肃斗争向纵深发展，使我区文化大革命的步骤迅猛加速。乌兰夫暗班子（内入党势力）正处〔在〕四面楚歌，全军覆没之中，为夺取我区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铺平道路，这些日子呼市革委会召开了第五次全委扩大会议，进行着呼市地区两条路线的艰苦斗争，阻力很大，斗争曲折迂回，狡猾的敌人利用各种社会势力，实行多种出击，企图搅混水，妄想把革命派打下去，也还有我们的一些糊涂同志看不清方向，识别不出敌人，甚至对高锦明个人抱有幻想，犹豫徘徊，很可能被敌人利用。因此将我所了解的呼市问题，向呼市革委会第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和广大革命群众公开的揭露，为这一场斗争烈火加一把干柴。”

上面说的是形势问题，大字报最后指出：

“当前就是抓住两条路线斗争不放，把高锦明之流盘据在呼市地区的势力彻底打垮，死死盯住乌兰夫的暗班子（内入党）不放，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揪出来，抓住这个主要矛盾，穷追猛打，毫不放松，直至全胜。”一个“主要矛盾”，两个“抓住不放”就是郝广德同志在呼市斗争烈火上加上的把干柴，可是到五二二后，总认为内入党是莫须有的，否定内入党存在的情况，相比较矛盾太大了。

这张大字报所起的作用，目前呼市学习班定会（作）〔做〕出评价的。我记得69年5月8日（当时内蒙局势已开始乱了），我在内蒙常委扩大会议上碰到郝广德同志，我说起

了这张大字报，郝说“这张大字报我在骂人，当时就准备作检查的。”当时有人曾说滕海清同志内蒙问题三个月后，毛主席、林副主席会说话的。据说当时滕海清同志很恼火，三个月后蒋介石回来了吗？这句话反毛泽东思想的。但在当时却有人知道滕海清同志在犯错误。

乌盟汇报

滕海清同志头脑膨胀的客观因素中，还有乌盟革委会的汇报。滕、吴二同志于68年12月16日听取了乌盟革委会周发言、吴志尚、贺春棋三位领导人的汇报，其发言摘要如下：

周发言：在汇报挖出内人党员数量和分析内人党的情况后，说有人说，乌兰夫搞政变，内人党是核心，军队不少，地方也有。

武尚志：内人党肯定有，不仅各级政权机构有，而且工厂农村也有，有人反映内人党是搞政变的，以共产党为合法的保护。在共产党支部党委中搞内人党，纪律很严，一人供出，全家受难。四清是大发展时期。政策要宽大再宽大。决心要大，肯定有，特别是呼市。

滕海清：挖内人党是清队的一部分，不要放过其他，一要充分发动群众，二要讲政策，要相信毛主席思想，要改造人，内人党要交待政策，区别对待，抓头头，抓骨干，是共产党支部又是内人党支部，那怎么行？一般成员是否办学习班交待就行了。宣传政策不要收兵，搞错了不怕，没有定性可以纠正。

吴涛：要注意政策，打击首要，争取胁从，感化无知，政策攻心。

请看这二位领导人对于汇报人的错误言论，看来是相信的，起码相信一部分的。而且还记得滕还表扬了周发言对四清发展内人党的分析。这几位领导人脑子大大地都膨胀了。

在乌盟挖内人党问题上，我们办公室的同志虽有些看法的，曾几次给周发言同志打电话，重点要突出，而且要控制，让他们搞几条政策时曾向滕海清建议要限制在旗县以上，公社以下不要搞下去，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基本分析，心里没有底，更无法

提出系统的东西，左倾思想又是一致的，内人党扩大化我们有严重责任。

十二月汇报提纲的出笼

这个提纲是李德臣同志写的，他已经写了大字报，我由这里再说几句。

1968年12月滕海清同志准备回京向中央汇报，让李德臣同志准备关于内人党的汇报材料，如何交待的我不清楚，他是根据鲍音扎布、巴图等人的口供写成，其基本内容：

（一）乌兰夫是内人党的总头目。是否是总头目现在也还不清楚，但实践中的恶果是以搞内人党代替了乌兰夫的整个问题，把问题搞颠倒了，也就是说把内人党问题上升到主要矛盾方面，这在68年4月以前就有乌兰夫的明暗两个班子之说，到了68年4月间，李德臣同志提出，又经高锦明肯定，认为内人党是乌兰夫的暗班子。到68年7月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时，核心小组办事组在为滕海清同志起草讲话稿时，就写成为乌兰夫直接指挥的暗班子，后来到起草这个内人党汇报提纲时，演变为乌兰夫是内人党的总头目，这个演变过程就是乌兰夫的暗班子（指哈、特势力），内人党是乌兰夫的暗班子，——是乌兰夫直接指挥的暗班子。乌兰夫是内人党的总头目，内人党问题的地位就这样一步一步突出来的，在滕海清同志讲来，乌兰夫问题是什么东西？内蒙主要的矛盾是什么？思想是混乱的，也是始终没有认识清楚的，把纲丢了，乌兰夫成了虚的，这就总出偏差犯错误。

（二）既然乌兰夫是总头目，那就把乌兰夫搞的民族分裂那一套，例如散发三五宣言，搞三不两利反动政策，鼓吹成吉思汗，搞黑代常委、五大委，乌兰夫1947年施政纲领等，都写入了这个提纲，内人党确是要搞民族分裂的，但把乌兰夫的整个民族分裂问题写到内人党头上这就（跨）（夸）大了，另一方面搞内人党成了搞民族分裂问题，退一步说，就算乌兰夫是个总头目，民族分裂也只是乌兰夫问题中的一条，其基本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按提纲的写法就进一步把纲丢了。

（三）内人党有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系统的组织机构，提纲的附表中列了一个五十多人

中央委员名单，这五十多人像是鸡到处下蛋，必然要搞扩大化的。

（四）提纲认为从1960年后内人党有个大发展时期，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大约有3万人，这样一写，内人党扩大化，不但在干部队伍中，而且也发展到群众中去了。

（五）提纲对内人党作了错误的结论，这就是内人党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间谍组织，从上而下点，必然会得出这个错误的结论的。我认为内人党是国际间谍组织并不错，中央首长提出内人党是同外蒙接触的，是反革命，但错在庞大二字，这也就是说内人党是有的，错误在于扩大化。

这个提纲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要说明内蒙革委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和提纲作者，对内蒙问题的认识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从内蒙三股势力、嫡系、旁系的分析开始，到明暗两套班子的提法，一直发展到一个主要矛盾，一个党（内人党）为止，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丢纲的过程，是一个上乌兰夫民族主义当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群众的革命精神逐步引偏的过程。滕海清同志的严重错误是犯在民族主义这块资产阶级最后的阵地上。中央首长提出，第一个扩大化的根子在滕海清，更远的根子是乌兰夫。中央首长还批评滕海清同志不懂民族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同志们把乌兰夫的十七年与四年文化大革命问题联系起来看，把四年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和两个扩大化联系起来看，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我这个很不成熟的想法，提供同志们参考。

现在再谈谈这个提纲的影响。滕海清同志回到北京后，据我的印象，对于这个提纲反复阅读，在这本提纲上，红黑杠杠是划得不少的，影响很大。也就是说，原来滕海清同志头脑中的各种片断概念，由这本提纲串起来了，问题的严重就在这里。看一看1969年1月初周发言、陶季藩二同志和北京军区的一位部长谈话就可以看出滕海清同志对内人党的看法和提纲的严重影响。在这以前，滕海清同志还没有完整地谈过内人党问题。滕海清同志对那位部队首长说，这次不这样搞不行，否则许多权仍在乌兰夫的暗班子手里，乌兰夫搞分裂、叛国时间很久，不暴露不得了，有些人参加内人党并非偶然，有些人又是共产党又是内人党，双重党，借水养鱼，这是个里通外国的组织。有人对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出

现那么大的反革命集团不理解，不了解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廿年，就不了解内人党的发展历史。68年2、3月军区鲍音扎布交待了内入党问题，当时我不相信，随着运动的深入，必然暴露出来，内入党从47年到60年组织未解散，但没有什么发展，63年至65年有个发展高潮。

滕海清同志还对周发言说，内入党有没有值得研究，理解这个问题必须调查乌兰夫在内蒙廿年干了些什么，乌兰夫在内蒙廿年是反党叛国反毛泽东思想的廿年，这样大的组织长期没有发现，更证明乌兰夫罪恶铁证如山，内入党的总头目是乌兰夫打着共产党招牌，三里五界都有他的人，还有实权，搞出来是很大胜利，如果不全挖出来，不能说是全面胜利。上面这两段话可以说是这本提纲的作用，上面这些话证明滕海清同志完全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完全靠主观臆断，对内入党下了结论，他从不相信军区鲍音扎布的交待，从开始的一小撮到后来的庞大的国际间谍组织，从特古斯当头到乌兰夫是总头目，从开始同意由专案搞到后来的公开大搞，一直到最后扩大化。这从滕海清同志方面讲，是他进入内蒙以来，特别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对敌情的夸大估计，宁左勿右，左比右好，左倾错误思想，继续反右，骄傲自满，好大喜功，脱离实际，不听中央话的必然结果。正在滕海清同志忘乎所以的时候，也正是鬼扣门的时候，这本提纲就是其中一个，里面有乌兰夫的灵魂，思想一乱，行动必乱，思想扩大化，行动必扩大化，比如滕海清同志对乌盟讲话，周发言同志回去大挖了一阵，结果从城市到农村，越来越扩大，越挖越严重。

举棋不定坏了大事

滕海清同志于12月24日到北京后，也听到一些关于挖“内入党”逼供信武斗情况，因而于12月30日同报社同志谈了五条政策，要求他们向李树德同志报告，也听取了我关于地质局挖“内入党”逼供信武斗情况的反映，内蒙日报还反映了一些类似的情况。这个阶段，在我看来，滕海清同志的思想是摇摆的，一方面感到“内入党”存在，而且还是一

个“庞大的国际性的间谍组织”，另一方面有多少没有底，加上武斗逼供信情况，感到有些问题。因此于1月初，除了讲八条政策，以核心小组名义下发以外，曾给在呼市办公室的申献公同志打过一次电话，要求他报告吴涛同志、李树德同志“内人党”问题是否可以刹车，向他们征求意见。申向他们二位报告后，他们二位都不同意，吴涛同志当时说：不要刹车嘛，武斗逼供信主要是讲政策，正面引导注意，这样才决定下发政策，并由吴涛同志在呼市讲一讲政策。

在内蒙古犯了扩大化错误，我常常想，要是那时刹车就好了，从实际情况看是不可能的。滕海清同志虽然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不坚决，思想是摇摆的，基本方面还是“左倾”在头脑里还是那个庞大的国际间谍组织，内人党的地位非常突出，我们当时又在北京，不了解情况，“左倾”的恶果还未充分暴露，认识不到，因此刹车是不可能的。当然领导思想上这种举棋不定的情况，必然要坏大事的，实践不证明了这一点吗？

吴涛同志1月10日讲了政策后，曾向滕写了一封信，信中也是提到讲政策后，武斗逼供信基本制止了，形势很好。我也问过乌盟武斗的情况，也好多了。这样滕海清同志也就麻痹疏忽起来，以为出不了大问题。因此他在2月初向黄总长汇报时，黄总长问滕：“有逼供信没有？”滕答：“去年12月有，1月讲了政策，基本上停止了。”实际上，就在滕海清同志汇报“基本上停止”的时候，呼市、乌盟农村等地区逼供信扩大化的严重情况正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继续反右火上加油

原来为了研究内人党问题，于1969年1月25日至2月6日召开了汇报会议。这个会议一共研究了三个问题：一是1969年工作安排问题；二是内人党问题；三是一元化领导问题。先是各盟市汇报了情况，中间研究了几个文件。关于内人党问题，会议上李德臣同志根据那个“十二月汇报提纲”，从25年讲起，一直讲到文化大革命，作了一次系统发言，

在会上特别提到：有人说内人党有六万，不符合事实，我看三万差不多。这个会议主要的错误，是提出继续反右。这一点上我有严重错误。当时会议上各盟市负责人发言中有几种反映，一种认为右倾翻案，夸大了支流，如锡盟认为敌人搞右倾翻案，主要手法：形“左”实右，搞扩大化。高锦明、高万宝扎布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相当深；呼盟也认为突出是形“左”实右搅混水，高锦明九·二五报告后，敌人公开翻案，批高后，又以新的手段搞形“左”实右；巴盟也认为当前主要是右，用右的极“左”两种手段交错使用，破坏清队，因此，主要倾向是右。另一种认为现在有“左”，有的地方宽一些，武斗逼供信有发展，认为讲政策就是右，忽视支流等等。为了给滕起草讲话稿，我根据这些问题，向滕海清提出了：“既要反右，又要防“左”，重点是反右，特别要警惕形“左”实右。但不能笼统地反右，否则不能迅速克服我们工作中“左”的倾向；又不能笼统地反形“左”实右，否则不能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这样一个混乱的、自相矛盾的“左”倾指导思想，经滕同意写入滕的讲话稿，在北京会议上继续反右，我出了坏主意，起了坏作用。

滕海清同志当时的思想情况还主要是“左”的，同意会上发言人说主要是反右的说法，在会上讲了“左”是支流，“左”好克服，“右”不好克服，“左”要革命，“右”不革命等错误思想。另一方面对武斗逼供信问题，由于怕伤害群众积极性而一般轻描淡写地讲了一下，比较突出地则是说：“死几个人不要怕，不要手软”之类的左倾言论。这样就在原来已经扩大化的火头又加了油，使扩大化更加严重起来。

在这次会议上，呼盟李锋同志告诉我：“原来我对内人党问题还有点动摇、犹豫，后来司令员对我说了一件事，我通了。滕司令员说：三反打老虎，开始也是一大堆，最后才几只老虎。我又听了李德臣同志对内人党问题的系统的发言，这就更加坚定了。”会议结束后，呼盟挖得更厉害，伤害的群众更多，这就可以看出滕的左的指导思想和李德臣同志的内人党问题发言的严重恶果。二月北京汇报会议完全错了，继续反右我是火上加油，继续扩大化。

这次会议结束时，中央首长接见了滕海清同志，滕只是一般地传达了一下，没有让盟

市干部坐下学习、领会和贯彻中央首长指示。周总理指示的：“内蒙问题很复杂，敌情严重，全部解决内蒙问题，要一个时间，别的地方怕他们慢了，你们那里就怕搞快、搞急了。”

（大意）张春桥在指出内蒙工作成绩时，也说到工作中有支流；黄总长在另一次接见中指出：清队面是否宽了些，要警惕。毛主席批了清华大学的文件，赞成五条。广东××万元。主席说：占人口千分之一，形势就好了……，不要逼供信，要作细致调查研究。对于这些重要指示，没有认真研究，是个严重错误。特别是高锦明同志的问题和内人党问题，滕海清同志都有一些错误的理解，发动继续反右，完全违背中央首长的指示，对中央首长的指示听不进去，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这是二月后继续犯“左”倾扩大化错误的根子。

2月8日回内蒙后，同样不严肃认真地贯彻中央指示，在常委扩大会上继续发表反右讲话。刘树春、申辙向滕建议：中央首长说不要搞快了，是不是不要再反右了。滕回答说：快一点有什么不好。把中央首长指示置于脑后，拒绝正确意见，竟到蛮横无理的程度。

不久，滕海清同志又召开了军区司、政、后挖内人党的经验交流会，继续散布左倾观点，继续夸大乌兰夫势力，党的政策观念没有了，百分之九十五的观念没有了。这样，滕海清同志在内人党问题上越陷越深，简直难以自拔。这样在已经扩大化的烈火上又加了油。军区司令部最后一批五十多个干部就是在这次会后送进学习班的。由于这次会议呼市大学校的单位参加了，所以这些单位的错误更加严重起来，一直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吴涛同志在这次会上头脑发热，调子很高，把搞不搞内人党问题提到革命不革命、革命反革命的高度。这种极高调与五·二二后的极低调相比，是极不相称的。

肯定与否定

在这里我插一段高锦明同志69年1月3日给大学校的一个书面检查，也许对认识内人党问题有所帮助，也反映一下一个在内蒙廿年的领导同志对内人党问题的看法。

高锦明同志说：“自治区革委会第三次全委会决定把挖肃斗争引向深挖深批的阶段，

并对内人党的变种组织规定了具体政策，这是正确的，及时的，而我在这个时期中大肆宣扬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极力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歪曲和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挖肃斗争下了收兵的命令。这一段我在家主持日常工作，对于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只发下去有关文件，和听了革命群众关于内人党首脑人物的一部分情况汇报。我并没有主持讨论过如何发动群众，具体组织这场战斗，反而将大批干部一哄而下，脱离阶级斗争，如筹建生产建设兵团和搞抽掉阶级斗争纲的（正）（整）党建党、教育革命、精简机构等工作。革命群众围歼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积极性，在我的压制下，处于奄奄一息的状况。我是保护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使他们有时间、有力量进行破坏反扑，使他们得以苟延残喘，拖延他们全面（复）（覆）灭的时间。我是犯下了严重罪行的，加之我过去包庇乌兰夫死党分子，现在查明有些人就是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首要人物和骨干，这样联系起来看，我的罪行就更加严重。

今春我的办公室失火，烧毁办公桌上桌内一部份文件，其中有一件关于内人党的起（缘）（源）的档案资料，我还没有看，就在其中烧掉了。这是我记忆中最重要文件。

我到昭盟去，说过雷代夫同志不是内人党员，抵制过林西某群众组织头头，不要把权星垣、雷代夫、周明等同志说成是内人党徒，这是别有用心的。此外，我记不起昭盟群众何时来揪雷代夫同志，我进行抵制情况，请允许我进一步回忆。”

这一部份书面检查说明了什么？是有“新内人党”，第三次全委会（作）（做）出决定要正确的、及时的；二是高锦明同志压制了群众的积极性，使挖内人党活动处于奄奄一息状态；三是高锦明同志办公室烧了部分很重要的关于内人党起（缘）（源）的材料；四是保过权、雷、周，说他们不是内人党的成员，对群众进行了压制活动。这些问题都是很有意思的。其实高锦明同志对挖内人党活动并没有压制过，在他的9·25报告前，乌盟突破206案件，和内人党登记正在进行，9·25报告后，特古斯、木伦、巴图等内人党专案均有进展。十月下旬，在呼市地区又（发）表了登记内人党的第一号通告，并不是什么“奄奄一息”，而是在发展之中。上面这些问题，不知为什么这样说。

这与高锦明同志在1969年12月13日战备会议上的讲话相比较，出入就太大了。

高锦明同志说：“扩大化从去年七月三次全委扩大会开始，三全会有原则错误，无根据或根据不充（份）〔分〕，肯定了新内入党，还规定了支委骨干以上，清队扩大化主要是挖新内入党，三全会决定没有根据。”前面那一段话，联系高锦明同志肯定“内入党与乌兰夫暗班子”之说，对新内入党都是肯定的。可是5·22后否定了，否定内入党，并从基层起逐一加以否定的，这是造成第二个扩大化的根据。

那么要问高锦明同志，你肯定了内入党，而且还作了书面检查，其目的是什么？这个书面检查，在大学校起过什么作用，大学校的一些负责人是会知道的。

应引起沉痛来

总起来，前面讲了四个问题。一是“内入党”是如何挖起来的；二是“内入党”是怎样扩大化的；扩大化的原因很多，就一个单位来讲，除领导思想左倾之外，还有本单位的两条路线斗争、派性、阶级敌人的破坏等原因。至于像锡盟的许明扬（群众组织头头，革委会副主任）那样，“叫我挖我就挖，挖出问题你坐腊；谁坐腊？滕海清、李大麻。”这样搞形“左”实右，故意破坏的，也不单是一个许明扬，但主要的是滕海清同志的左倾，而敌人利用左倾搞破坏。

滕海清同志的责任是主要的，在滕周围工作的同志可以推御自己的责任吗？不能，绝对不能。比如我个人在内入党扩大化问题是起了坏作用的。在已经左的情况下，《内蒙古（古）日报》私自发表“狠为基础”的反动观点，在北京会议上提出了继续反右的左倾错误意见，在扩大化的日子里，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调查研究，对许多严重问题只作个别处理，不能提出有说服力的建议。我给滕海清同志帮了很大的倒忙，有罪于内蒙古人民。

你李德臣同志是怎样呢？我不说你如何给高锦明同志上纲，也不说你在中央首长面前又如何给滕上纲，单说你在扩大化的日子里，内蒙第一个系统化、理论化内入党问题的“十

二月汇报提纲”是你写的。1968年12月（在）北京军区张南生副政委面前说：“快把我调回北京军区吧，不然也要被打成内人了。”当我们办公室申辙同志向你提出：“你是办公室主任，要注意掌握情况，内人党问题出了大事，你也有责任啊。”当时你火冒三（仗）（丈），说什么：“我有什么责任？我还要杀回马枪呢。”当革命小将郭四海在北京回来向你传达滕海清同志关于几条政策的意见，当他念到挖内人党只在旗县以上，公社以下不要挖的时候，你忽然哈哈大笑，笑得很不自在，你是不是看笑话，看着人家犯错误。在北京汇报会上，你的系统发言，也是火上加油，引起恶果的。我不愿意再写下去，我们犯错误都很痛心，问题主要不在于个人责任，而在给内蒙人民带来那样大的损失，就我们两个讲，就是向内蒙人民道一千次歉，认一万次罪，也不足以赎罪于万一，现在的问题就是端出真正的灵魂。

李树德同志，你是不是更加沉痛些？挖“内人党”扩大化的具体指挥，你是主要的。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在内蒙表现的內人党（于）（与）共产党的斗争，这就是内人党主要矛盾之说，这是你提出来的。还有1968年12月27日给大学校连以上干部讲内人党问题，你的调子高得很，大学校的扩大化，是从此逐步发展起来的。再一件事，1968年10月，清队的其它方面都停止，大会战早就熄火，为什么在10月23日你批准发出呼市内人党登记的第一号通令？在高锦（明）同志的问题上，先是你同李德臣同志说：内蒙搞宗派排挤你。1968年12月22日晚，滕海清同志问你：高锦明同志的问题是什么性质的？你回答：就是历史问题搞不清，也是敌我性质的。“五·二二”后，你又反咬一口，就在你回答这个问题的前几天，你主动要求同我们几个秘书谈一谈，我们从没有要求你谈过什么思想。你应当沉痛，同时也要端出真正的灵魂。

老权，你在北京上班时，你说怎么挖内人党你不知道，这能说明过去吗？凡是讲到内人党问题，只要你在家的，哪一次没有你参加？你说过反对意见吗？那时好像你并没有发觉内人党扩大化。你竟说出那样的话，多没劲！

老高，你能说没有一点责任吗？■

【封面】

折翼

以沙漠风暴中的草原为背景，将内蒙古疆域置于风暴的中心。在侧立士兵的目光注视之下，虚化其左右两翼，应和60年代末，内蒙古被肢解的历史——为了平息因“新内人党”冤案造成的动乱，毛泽东的中共中央对内蒙实行全面军管，将内蒙的七盟二市中的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三盟分别划归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将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三旗分别划归宁夏和甘肃。自治区折翼十年，直至1979年5月30日，这三盟三旗才重新划回内蒙古自治区。（邹行）■

【编读往来】

1. 周家琮正误

《记忆》208期中，署名“川文”的清华727一书序言，乃敝人拙作。其中言及撰序始末，有“卿本佳人，奈何有序”句，被阁下误读，遂改“有”为“无”。有无之别，似不可不察，倘无不便，请予更正。■（对不起，周先生，这是责编的失误。——编者）■

2. 赵晖谈215期“红色文化”

《记忆》215期收到，启之先生对于红色文化的见解，个人深为赞同，如高华先生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后记中所言，“予生也晚，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20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共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史家对于红色文化的研究分析，亦复如是。■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封面设计：邹行